

西泠藝叢

XILING ACADEMIC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专题·封泥研究

- 闽越国封泥的启示与释文之问
- 「泥封」「封泥」称谓辨
- 构建「秦封泥学」的探索与思考

学术研究

○ 横空惊艳之书坛奇珍

——王羲之妻、献之母郗氏墓识



拾貳 | 二〇一九年
总第六十期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
总局认定
学术期刊

目录

Contents



◎ 楚大祝印 土山汉墓出土

专题·封泥研究 / Zhuan Ti · Feng Ni Yan Jiu

- 闽越国封泥的启示与释文之问 文/孙慰祖 02
- “泥封”“封泥”称谓辨 文/周晓陆 05
- 构建“秦封泥学”的探索与思考 文/庞任隆 09
- 近十年来秦泥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崔璨 15
- 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同一封泥重复著录问题 文/施谢捷 21
- 从南北朝官印文字看中国古代泥封的衰落 文/杨逸云 31
-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研究 文/张书慧 36
- 徐州博物馆展厅新见土山汉墓出土封泥述要 文/吕健 46

学术研究 / Xue Shu Yan Jiu

- 横空惊艳之书坛奇珍——王羲之妻、献之母郗氏墓识 文/林乾良 55
- 对汪新士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提供几条佐证 文/昌少军 58

西泠掇英 / Xi Ling Duo Yi

- 一位被低估的大家——重新认识陆维钊 文/卢忻 61
- 追忆恩师周昌谷 文/黄镇中 68
- 肯与花王相近侍，笑它倾国是何人
——从《一池春水》看陆抑非先生的艺术与人生态度 文/张伟民 71

社刊总目 / She Kan Zhong Mu

- 《西泠艺丛》2016年第1期至第12期目录索引 73

艺丛信息 / Yi Cong Xin Xi

孤山捐献实录

- “中国印学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特展——戎壹轩藏秦系陶文专题展”
在杭州举办 78
- “回向西泠——郑朝阳肖形印作品展”在杭州举办 78

- 艺丛信息 78

封三：窈窕独殿春 陆抑非 1962年 浙江美术馆藏
封底：气结 闽越国陶瓦文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闽越国封泥的启示与释文之间

文 / 孙慰祖

闽越为古百越族群之一部分，秦曾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置闽中郡。汉初又封无诸为闽越王，复为闽越国。福建崇安城村遗址为汉闽越国故城，已被确认为王城所在。^[1]公元前 111 年为汉武帝所遣四路大军翦灭，城同时火焚。从无诸受封复国算起，闽越存国 92 年。这也是城村遗址出土封泥的时间下限。出土的三件封泥，其中一件全残，二枚保存完好（图 1）。^[2]

两泥的文字，研究者有几种不同释读。杨琮先生分别释为“位”和“蜚氏”。^[3]在我看来，两印文中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构“𠂇”。这个结构或者符号，是秦汉文字中所未见的。如果前者隶定为“人”旁，则后者又必须从之，这就产生了前后矛盾。以两印文字的结构、笔画来看，显然是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了的汉字，目前的几种释读，似乎都未尽圆通。不过我认为，这并不影响对两件封泥性质的判断和隐含信息的探讨。

两封泥以下性质可以确定：

（一）封泥为私印钤出，成熟的形态启示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二）封泥分别为 A、B 两型^[4]，即前者为自然圆形，泥边无阻隔；后者泥块上下受限，左右开放，是分别施用在平检和凹检的特征。

（三）印文存有界栏，与南越私印封泥一样（图 2），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封泥 A 型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封泥 B 型

◎ 图 1 西汉闽越国私印封泥

为秦私印形式的遗风。

(四) 印文参入鸟书笔形，有别于秦文字，而且吸收了汉私印的某些元素，但又不类于西汉鸟虫书结构。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两封泥可以定性为闽越国一度存在或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印文书体。

有人提出，封泥不同于印章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流动的印迹，发现地不一定是持印者所在地。那么，我们还需要更明确地排除它来源于闽越以外印章所抑的可能性。

首先，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两件封泥的特殊性在于印文体态虽近于汉字，但结构不属于中原风格体系，据



结 南越王墓出土

衍 南越王墓出土

◎ 图2 西汉南越国私印封泥



乾官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官黄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居口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气结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结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陶文

◎ 图3 闽越国陶瓦文



官茅 南越官署遗址出土

赖 南越官署遗址出土

气 南越官署遗址出土

长秋居室 广州淘金坑出土

◎ 图4 南越国陶文

此否定了它们来自汉郡。而这一点正是城村封泥的特殊意义所在。

其次，印文风格也不同于与之存在地缘政治联系的南越国印文体系。在整个西汉时期印章文字遗存中，这两件私印文字风格是孤立的存在。因此，考虑到遗址的王城性质，将这两件封泥定性为来自闽越国内部某地上行文书或物件上的封缄标志，是恰当的。

我认为，城村遗址所出两封泥隐含下列信息：

其一，闽越国虽然长期与中原王朝处于割据、游离状态，但在其文物中又显著地表现出吸收、效法中原典制文化的特征，也反映出其文化渊源的多向度。除了本地的越文化以外，秦汉元素更为突出。城村故城遗址的建筑即属于汉代风格，出土的铁器器形也与中原汉式相似。筒瓦上出现许多汉字人名戳记^[5]，有的与南越国陶印文或封泥文字颇为相似。（图3、图4）

A、B两型封泥的发现，表明闽越国封检制度的演进与西汉前期中原流行的封检形式完全同步，也与城村遗址的存续年代相吻合。所抑封泥印文中，我已指出秦与汉的两种元素并存，也符合西汉闽越国文字文化的直接来源。

这些足以表明，闽越国与中原之间以及与南越国之间文字交流互相影响的存在。封检形制与中原的同步流行尤其表明了至少在相当时期内，闽越在典制建设方面对秦汉模式的承接。

其二，陶器、瓦文上的汉字戳记表明了一般器物生产中的汉字应用。印章的使用则只有在社会群体特别是上层社会认同的制度环境中才具有凭信效力。由此可见，汉代闽越国曾经存在有规模地使用汉字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来源和身份，值得进一步探讨。

问题再回到印文结构形态的认识上来。闽越国的族群并不单一。战国时期为楚所占的吴越故地的余部进入当地，构成闽越国族群的重要部分。吴越青铜器的文字，即有与中原不同的鸟书形态，城村封泥印文的屈曲诡异，是否与其遗风有关？

西汉闽越国故城出土的封泥见于报道已经几十年过去，它们的存在似并未为近世介入封泥研究的学人进一步关注，有些隐含的信息和细节也就未引起综合性的探讨。我将几点未必成熟的思考提出来，一并在此就教于当世方家。

【注释】

[1] 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同上。

[3] 同[1]。

[4] 关于秦汉封泥形态分型，可参见拙撰《封泥的断代与辨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崇安城村汉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孙慰祖：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泥封” “封泥” 称谓辨

文 / 周晓陆

现在大多数的考古学、文物学及书法印章学著作中，把东周到秦汉时期的一种重要文物——印章打在胶泥上，用于封缄文件、钱币和财物等形成的泥块，称作“封泥”。本人曾经从众，也长期采用过“封泥”这一称谓^[1]，但近年来渐渐觉得这一称谓是不妥当的，应当以“泥封”称呼为宜。文物制度之研究，“必也正名乎”是基础性的工作，因此，提供愚见于下。

《汉语大词典》中对“泥封”的解释是：“古人封缄书函多用‘封泥’封住绳端打结处，盖上印章称‘泥封’。”^[2]从其中可以看出，“封泥”是未加盖印章的待用的胶泥，而加盖印章后称“泥封”，这样的解释是不错的。《汉语大词典》中“封泥”的含义解说则有两种，其一是作动词用，“谓用泥封缄文书”^[3]；第二种为引申意：“谓守关如封泥，后因以‘封泥’喻据守雄关。”^[4]

用“泥封”称呼加盖印章后的封缄胶泥更为合适，可以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考察。

一、秦汉以来史料中有关“封泥”与“泥封”的记载

秦汉时期相关文献中对“封泥”和“泥封”的称谓比较具体，它们的区分比较明确。所谓“泥封”，“泥”为质地，“封”是动词，指物时动词名词化，它是因为使用而产生的专门名称。如《东观汉记·邓训传》中“（黎阳营故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雒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犢，至上谷遗训”^[5]，用青泥封书，动词化地确立了二者的词序。

后来人将“泥封”误称为“封泥”，可能的来源是《后

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6]其中讲到守宫令掌管的文具系列中有“封泥”，比较明确。于是许多研究者误以为“封泥”就是“泥封”，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守宫令本身职官级别并不太高，负责掌管文书文化用品。而抑印过的公私“泥封”是用过之物，严格来说是当时查验并处理文件、财物之后，解下、敲落所遗留的“废物、垃圾”，不会属于当时一切职官包括守宫令搜集、掌管的范围。《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所掌的“封泥”，应当是指准备用印做“泥封”的胶泥。《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中有记载：“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7]《淮南子·齐俗训》中亦有记载：“若玺之抑埴。”^[8]《东观汉记·隗嚣传》记载：“（王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9]其中的“涂”“埴”“丸泥”，指的都是将要被抑印的“封泥”。

从记载来看，“封泥”的胶泥土质种类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青泥”外，还有“紫泥”。《西京杂记》记载：“书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绋其上。”^[10]《汉官六种·汉官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11]这些文献记载说明，至迟到汉代，已有朝廷专门颁发的泥，这就叫“封泥”。反过来说，“封泥”确实有其文物，但不是有文字或图样在上的“泥封”。

“泥封”是指在“封泥”之泥上面加盖了印章后的，表面有文字或图样以供审验的泥块。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

州郡。”^[12]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嗇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嗇夫及离邑仓佐主粟者，各一户，以气，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13]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文献也好，或者大量传世秦汉文献也好，都讲“封书”“……封”，这应当是很清楚的，所以应当称抑印后的胶泥为“泥封”为宜。

秦汉时期“封泥”和“泥封”的明确区分，反映了当时完整的泥封制度程序，即：采封泥—藏封泥—取封泥—用封泥封护简牍或财货—在封泥上抑印以及做成泥封—简牍或财货到达之后敲落泥封—读取简牍或财货。汉晋以后，由于纸张应用的普及，传统的竹帛简牍渐渐地被取代，用于封缄简牍财货的泥封用法逐渐消失，泥封制度也趋向衰微；唐代在大明宫遗址所见的“泥封”，与东周秦汉用法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能正是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封泥”和“泥封”的概念开始发生混淆。如唐代李林甫《嵩阳观圣德感应颂》：“目对封泥，手连印署。”^[14]以及罗隐《秋晓寄友人》：“手中彩笔夸题凤，天上泥封奖狎鸥。”^[15]这两首诗中的“封泥”和“泥封”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从以上分析可知，“封泥”和“泥封”的区别，实际上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没有什么讹错。如果说后来把“泥封”称作“封泥”的话，不仅对“泥封”是一种误读，而且忽略了真正的“封泥”的存在，忽略了另一种文物。

二、清季泥封文物出土以来的研究命名

最早有关古代泥封文物的出土记录，可见于清代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该书中记载了“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16]，还收录了“刚甌右尉”等泥封的摹本，一共有六枚。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泥封的真正用途，而将这些泥封误认为是“印范子”。^[17]

最早在研究中对这类遗物提出命名为“封泥”的是刘喜海。根据对《后汉书·百官志》中“守宫令”注的不准确认识读法，他将这些文物认定为“封泥”，虽然比“印范子”之谓贴谱了一些，但仍然不尽合适。于是，“封泥”的说法流传开来，在此之后，“泥封”和“封泥”两种称法长期并用，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都是“封泥”这一称谓。

如陈介祺、吴式芬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编著的《封泥考略》，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古泥封的重要著作。书中收录了战国至汉代公私泥封共 849 件，是书采用“封泥”的称谓。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也称之为“封泥”：“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18]在此之后的如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吴幼潜《封泥汇编》、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封泥存真》、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等一系列著录以及研究文论中，大多使用“封泥”的称谓。

其间，也有部分学者坚持“泥封”的说法，如刘鹗《铁云藏陶》中提道：“泥封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封背麻丝黏着，往往可见。”^[19]先师陈直先生也曾称其为泥封，如先生在《汉书新证·百官公卿表》“中尉”条下例举毛子静所藏“备盗贼尉”泥封。即使如此，“封泥”的称谓依然成为主流，并被长期误用。

除此之外，“泥封”和“封泥”，常常被当作是同一种古代遗物，即有抑印痕迹的封缄胶泥。如陈介祺《簠斋藏古封泥》《陈簠斋泥封考略》，将“封泥”和“泥封”混为一谈。此外韩天衡先生给《封泥汇编》所作序中认为：

“封泥，亦名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门户和包裹封口的凭记。”^[20]《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认为封泥“亦称‘泥封’‘芝泥’”^[21]。实际将“封泥”和“泥封”看作一类遗物，还是指向泥封，并不是指的封泥。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拓展、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真正封泥的发现，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受到了挑战。如果在研究中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么准备做泥封的胶泥又该如何命名呢？如前面所提到的，“封泥”和“泥封”的区别，与秦汉之际的泥封制度有关，所以区分“泥封”和“封泥”，可以保证泥封制度和相关文物研究的针对性、准确性。

通过对前人研究中对泥封文物的命名分析可以看出，清季以来有关“封泥”的读法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对泥封的误读。同样，将“封泥”和“泥封”混为一谈，也无益于泥封制度及文物的研究。

三、文物考古资料中的“封泥”与“泥封”之辨

从文物考古资料来看，真正的“封泥”已经发现了。

可以先看看“封泥筒”。它从东周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发现，就是存放封泥的筒。最华丽的一件封泥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1），材质是青铜错金银。从自铭为“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筒”可以看出，它的作用非常清楚，就是盛放封泥或者说盛放泥巴黏土胶泥的“泥筒”。但它的亮点还不止于此。它上面记载的纪年为“升平十三年”，这是十六国的纪年。十六国时期，在中原早已是秦汉泥封制度大势已去的时候，西北却还有如此华丽的“泥筒”，这是十分少见的。

小型封泥筒（图2），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出土比较多，一般直径有3厘米左右，长度在20厘米之内。顶部带盖，盖沿有的有企口，只有转到一定角度才能打开；有的附有三足，有的带圈足，有的为平底。盖子的内里面往往有阳起的反字，这些字都较为简单，例如“千万”二字，这是用来试抑胶泥即“封泥”的质量和用泥效果的。有的封泥筒还附有小铜匕（图3），以方便取封泥、填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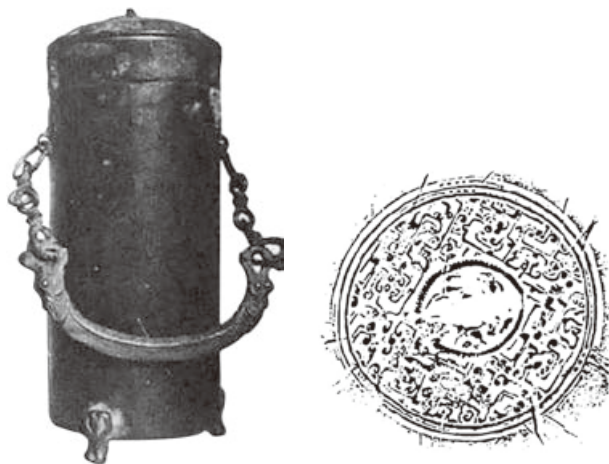
现在再看看考古出土的残存在封泥筒中的真正的“封泥”。它们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散装，一层一层沉淀在封泥筒里面。如河北望都二号汉墓中出土的封泥筒，其中有杏红色棒状物九段，应为干裂后的封泥。^[22]此外还有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出土封泥筒，其中装有暗红色封泥，出土时仍然柔软可塑。^[23]这些封泥均没有用过，泥质非常细腻。另外一种呈丸状或者颗粒状的，即文献上见到的“丸泥”，做成丸状是为了便于携带。从两京地区到各州郡县，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半岛出土的汉代中央政权颁发的封泥或者说胶泥泥巴的色泽、细腻程度是非常一致的，说明由中央，甚或就是经“守宫令”统一发放。这是汉代封泥的特点，东周、秦代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些有关封泥的新发现与研究，也要求从名称上将“封泥”和“泥封”二者进行区分，在研究中不至于将二者名物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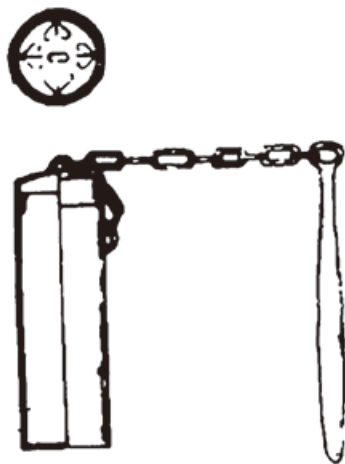
在古代印章，起码从汉印中可以看到有“××印封”字样，比如“周隐印封”。这颗印显然是在泥封上使用的，即周隐用的私印，再用此印抑成为泥封。同例还有汉公印“御府杂封”。此外还见到汉私印“范金封、李封、周封、韩封”等。可能有的研究者认为“封”是人名，但笔者认为“姓+封”模式。更宽泛一些的例子，见汉印多字印（总



◎ 图1 “升平十三年”封泥筒及铭文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 图2 陕西清涧出土封泥筒及盖上纹饰



◎ 图3 陕西华阴刘崎家族墓出土封泥筒示意图

印)的句例,如“××唯君自发封完印信”“××印完封发之”“原君自发印信封完”“封完请发”“封完印信”“封信原君自发”“封印长乐”等。^[24]在这些例子中,如将其中“封”字换成“泥”字,将显得荒唐不词。另一方面,在印文之后缀以“封”字,这个传统一直沿用到元、明、清时期。由印例、印用、抑印遗存本物、沿袭传统等方面也可知,称用过印的胶泥为“泥封”为宜。

四、余论

顺便提及,一些木质、金属质的,原本被大多数研究者称为“封泥匣”的文物,它们不是用来存储封泥的,而是用于固定、防护已经抑印的泥封,因此也应当称作“泥封匣”为宜。

本文主张对于有关文物去“封泥”的说法,而使用“泥封”来称呼有抑印痕迹的封缄胶泥。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习惯使然,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已经叫了近两百年,就“约定俗成”从众吧。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所掌的“封泥”,在考古工作中已经明确发现了,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吻合极好,这真正的“封泥”又应当叫作什么?

封泥、泥封,一前一后,一无文图一有文图,二者具体诠释了古代泥封制度。笔者认为,研究者不应当再“将错就错”了,尤其是在古代“泥封”的历史价值、古文献价值凸显,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之际,应当秉持正确的称谓。

本文重申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点:首先,“封泥”“泥封”二者在秦汉文献记载中的区别是比较明确的,是秦汉泥封制度两个不同的要素;其次,清季泥封文物出土之后,过往研究中“封泥”的说法从一开始大多是采用了误称,现在应当予以改正;第三,从考古资料看,“封泥”确有其文物,是准备制作“泥封”的胶泥,是备料,其上不会有抑印表现,抑印之后就叫作“泥封”了;第四,中国古代文物的常用称谓词组,如商代青铜爵、唐三彩陶俑、宋龙泉瓷盆等,大多是“质地加功用及外形”的模式,因此,此类文物也是命名“泥封”为宜。明确“泥封”的称谓,也便于将“封泥”用以称呼真正的“封泥”,使“用‘封泥’制成‘泥封’”的古代泥封制度得到更为准确的表达。

【注释】

[1] 例如笔者在《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中使用了“封泥”的称谓,在《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华书局2010年版)中则尝试纠正过去的误读。

[2]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五卷上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6页。

[3]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二卷下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4页。

[4] 同上。

[5]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九《邓训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6] 司马彪:《续汉书·志·百官》,《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2页。

[7] 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九《离俗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28页。

[8] 刘安:《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7页。

[9]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九《隗嚣传》,第870页。

[10] 葛洪:《西京杂记》卷四,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11] 孙星衍:《汉官六种·汉官旧仪》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2页。

[12] 蔡邕:《独断》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3] 张政娘、日知:《云梦竹简2·秦律十八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14]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7页。

[15] 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12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4879页。

[16] 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海吴氏家刻本。

[17] 同上。

[18] 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卷第十五,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页。

[19] 刘鹗:《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影印本,第97页。

[20] 韩天衡:《封泥概说》,吴幼潜《封泥汇编》,上海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1页。

[21] 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2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23] 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考古》1988年第5期,第445页。

[24] 康殷:《印典·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691—2693页。

【作者简介】

周晓陆: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构建“秦封泥学”的探索与思考

文 / 庞任隆

【摘要】

2018年12月20日，西泠印社集团、西安美术学院在古都西安举办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古代封泥学术研讨会。2019年3月14日，《美术报》以“封泥——和秦兵马俑同样重要发现”为题，摘要发表了王辉、庞任隆、刘瑞等六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次研讨会释放的一个特别信号，就是把“封泥的发现”提升到与“秦兵马俑的发现”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研究，可谓高屋建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秦封泥，当是中国古代封泥的佼佼者。本文通过秦封泥与秦兵马俑、秦简牍的比较研究，揭示秦封泥对中华文明的六大贡献，同时，对进一步构建“秦封泥学”做一些梳理和思考。

【关键词】 秦封泥学 构建 探索思考

在秦岭绵延横贯其中的三秦大地上，被誉为秦文化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发现，其中两大发现即秦兵马俑与秦封泥都在陕西。秦兵马俑与秦封泥，撑起了以“秦”为简称的陕西历史文明的一片蓝天，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秦封泥与秦兵马俑

秦封泥与秦兵马俑的相同之处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时代上都形成于2200年前的大秦帝国；二是质地上都是用秦代的泥土作成；三是内容上再现的都是秦代的文官武官；四是形式上都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性；五是价值上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秦封泥与秦兵马俑，共同记录了大秦帝国的文明，共同谱写了一曲大秦的高歌。

秦封泥与秦兵马俑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发现时间不同：秦兵马俑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

期；秦封泥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隔20余年。

二是出土地点不同：秦兵马俑出土于被誉为华夏源脉的临潼秦始皇帝陵东侧的西杨村，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的；秦封泥出土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的相家巷村（当年秦始皇办公的地方），是当地农民在挖粪坑时发现。

三是所用的泥土不同：秦兵马俑的制作用的泥，全是著名风景区骊山脚下的“骊山泥”，土质细，黏性好；秦封泥用的泥，不仅来源于秦都咸阳内史郡所属县，而且有秦代全国各地郡县的泥土，由于要封缄文书，所以要经过挑选、审批后才能使用。

四是再现的颜色不同：多彩的秦兵马俑，既有“骊山泥”的本色，又有人为的彩绘（图1），如“朱红”“粉红”“中黄”“粉绿”等，都是矿物质，其艺术性突出；多姿的秦封泥，五彩缤纷，是各郡县泥土的汇聚，如有“青泥”“黄泥”“紫泥”，都是各地自然的泥丸，其艺术性鲜明。

五是制作的方式不同：秦兵马俑要经过丸泥、形象塑造、雕刻、烧制等程序，是秦代雕塑史上的精粹；秦封泥仅

仅经过丸制，由于所肩负的“以检奸萌”的特殊使命，所以使用过程不能烧制，是秦代文书封缄制度的结晶。

六是反映的内容不同：秦兵马俑不仅有军士俑，还有立射俑、跪射俑、武士俑、军吏俑、骑兵俑、驭手俑、马俑等，最高级别是将军俑，每个形象都不一样；秦封泥不仅有“三公九卿”的官员，而且有郡县亭里的职官，如御史、奉常、郎中令、卫士、太仆、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将作少府、中尉、詹士和郡守、郡丞等，最多的是县丞，最高级别的是左丞相和右丞相，大部分都是孤品。（图2）



彩绘粉红脸俑

彩绘绿脸俑

◎ 图1 彩绘秦俑



西盐

咸阳市丞

夷舆丞印

右丞相印

◎ 图2 秦封泥职官

七是体现的价值不同：秦兵马俑以秦人高大形象的原真性和秦代人物雕塑艺术的原真性的双重身份，见证了大秦帝国“秦王扫六合”的雄心气魄和阵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秦封泥，同样以秦代文字书法的原真性和秦代篆刻艺术的原真性的双重身份，见证了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原补充了秦代历史地理的诸多空白，被誉为“秦人用泥土塑就的一部美学史诗”。

秦封泥与秦兵马俑，都凝结着秦人丰富的想象和智慧，都是中国古代艺术苑地里的一朵奇葩。它们的文明感召力、艺术影响力和独有的创造精神，尤其所形成的“大秦雄风”，将引领时代，昭示未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二、秦封泥与秦简牍

论起秦封泥和秦简牍，两者的关系最为密切。在秦代，秦封泥和秦简牍都是与文书封缄制度有关的重要载体，是一套完整的封缄系统，秦封泥封的就是秦简牍。今天人们认识、了解、利用秦简，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这让我们这一代人大饱眼福，享用不尽。

自1974年春陕西西安临潼西杨村农民在打井时发现秦俑之后，1975年冬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首次发现出土了1100余枚秦简^[1]，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460枚秦简^[2]，1993年湖北荆州市关沮县周家台秦墓出土秦简387枚^[3]；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2002年5月湖南省龙山里耶战国古城中清理出秦简牍36000余枚，刷新了秦简数量和内容的新纪录。^[4]这期间，即1995年夏天，大量的秦封泥在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农民挖粪坑时惊现，成就了20世纪秦文化发展史的三次重大发现。

由于出土的地域不同，陕西的秦封泥具体封的既不是湖北的秦简牍，也不是湖南的秦简牍，更不是甘肃的秦简牍。秦封泥出土地章台宫是当年的皇宫，是秦始皇办公的地方，秦封泥上反映的内容均为三公九卿、郡县亭里和宫殿苑囿的官印（图3）和地名，级别最高的是“左丞相印”和“右丞相印”，是上报秦中央官府的文书。湖北秦简的内容以书籍为主，主要有《为吏之道》《日书》《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封珍式》《法律问

答》《编年记》等，没有经过封缄程序；甘肃秦简的内容大部分为“日书”，极少篇为“志怪故事”等，应该也没有经过封缄程序；而湖南里耶的秦简牍（图4），主要内容则是县一级文书档案，有行政文书、吏籍、兵器簿、乘法口诀、纪事、邮程记录和封缄等，其中至少“行政文书”是经过封缄的。

那秦封泥封的秦简牍都到哪里去了呢？陕西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土秦简牍？在十多年前的一次秦俑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烧了一部分；第二是秦末项羽的大火烧了一部分；第三是陕西半干半湿的土壤氧化了一大部分。我的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5]以后陕西可否发现和出土秦简牍，我们期待。

在秦封泥和秦简牍的关系中，还有十分重要的“文字”这一点更值得关注。秦封泥文字再现的是秦小篆，来源是经过颁布的正在使用中的秦官印文字，当官印在履行“以检奸萌”的使命时，印文文字由“阴文”（白文）变为“阳文”（朱文），成为今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挺拔秀美的秦小篆。这是秦官印文字书法艺术的再创造，尤其墨拓品的线条与虚实迷离的边框所表现的大秦气象更为突出。

秦简牍文字都是较为典型的“秦隶”，即从小篆向隶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古隶体，其字体构造多保留篆书的结构，当用笔较方，笔道劲健，与秦权的书风一脉相承。秦简牍文字都是人工手写的，尽管字体尚有篆意，但从舒展的线条和疏朗的布局，尤其从收尾的长捺和长撇，即可看出其书写者任意挥洒、行笔自如的精神风貌。史载出生于内史下邳（今陕西省渭南市北）狱吏程邈，就是秦隶书的创造者，被誉为“秦朝书法家”，汉代蔡邕称其“删古立隶文”；唐代张怀瓘《书断》称：“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三、秦封泥的六大贡献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秦封泥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贡献，是其他文明无法代替的。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在文字学方面，堪称“秦统一文字的记录仪”。



任城丞印



相丞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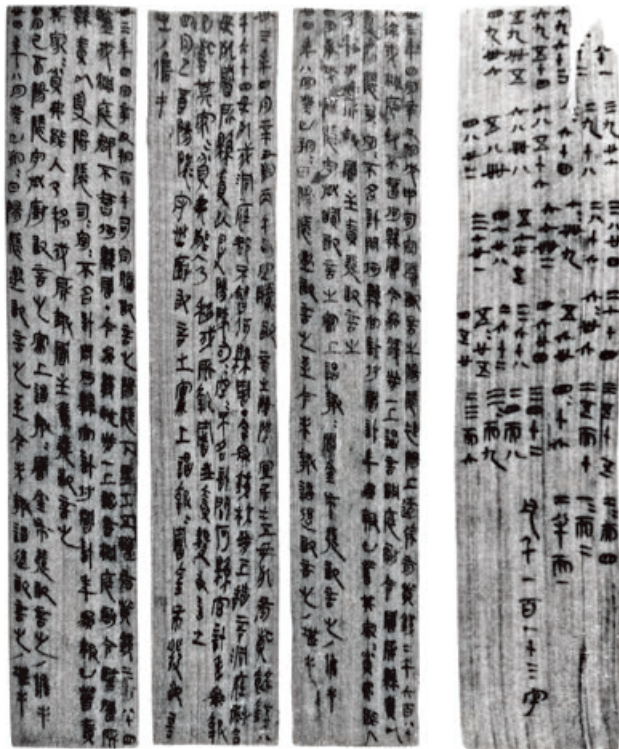


新城父丞



左司空丞

◎ 图3 秦封泥官印内容



◎ 图4 湖南湘西里耶秦简牍 里耶秦简牍博物馆藏

秦统一文字是秦始皇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是记录中华大秦文明的重要载体。除已知的秦陶文、秦诏版、秦量器、秦砖瓦、秦刻石和秦简牍上的文字外，目前体现文字最多、最规范、最系统、最有影响力的，就数秦封泥。据笔者不完

全统计，仅在已公布的封泥资料中就有一千多个单字，如“正”“泰”“宗”“少”“室”“府”“尉”“西”“左”“右”等，最多的是“丞”和“印”。从结体、形态和线条上，秦封泥都把秦时全国统一的文字之美、程序之美，再现得淋漓尽致，并开启了文字艺术的曙光。（图5）

第二，在书法学方面，堪称“秦小篆书法的传播器”。书法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从甲骨文开始，每一个字体，都有它的法则，都可形成一门学问。秦封泥文字，以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标准文字和秦统一后称为“小篆”（与秦统一前“大篆”相对）书法的双重身份，再现了秦代文字书法的艺术之美，尽管“统一化”，但也再现出“匀称美”，况且一些细微奥秘的变化，如文字与边栏的虚实迷离，创造出一种佳境，难能可贵，其代表作有“泾下家马”“乐府丞印”“官司空丞”“谒者之印”等。（图6）

第三，在篆刻学方面，堪称“秦代官印的集录谱”。在秦封泥发现之前，秦代印章发现传世的极少，为世人所见的也不过百余枚。大量秦封泥的出土，尽管不是原印（是秦印艺术的再创造），但毕竟经过官方正式颁布。正是由于其用途的“特殊身份”和“以检奸萌”的使命，才为后世留下了这极其宝贵的财富。让我们看到秦代系列、规整的带有“田”和“日”字格明显标志的官印；也有少数无格的，如“顺”“宗正”“祝印”“章台”“外乐”“中谒者”等，成为经典中的极品。（图7）

第四，在历史学方面，堪称“秦三公九卿的活字典”。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说：“这批秦封泥内涵丰富多彩，是研究秦史秦文化的珍贵资料。”从“三公”中的“左丞相”“右丞相”“御史”到“九卿”中的“奉常”“郎中”“廷尉”“太仆”“宗正”“卫士”“治粟内史”“少府”，再到“列卿”中的“将作少府”“中尉”“詹士”“典属国”“内史”等，还有所属的管职，诸如“宫廐丞”“章廐丞”“内官丞”“都水丞”约200多个品种，简直就是一部“秦志”，有好多枚谱写了秦代官职官制的序曲。（图8）

第五，在地理学方面，堪称“秦郡县亭里的指南盘”。秦封泥不仅在“三公九卿”方面列阵，在“郡县亭里”和“宫殿苑囿”方面更是一张鲜活的“秦地图”。仅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就有100多枚郡所属县的地名，诸如秦都咸阳所属“内史郡”的“云阳”“蓝田”“高陵”“栎阳”，北地郡的“安武”“彭阳”“西共”，泗水郡的“四川”“符



中车府丞

少府幹丞



左丞相印

杜南苑丞

◎ 图5



泾下家马

乐府丞印



秦官丞印

下邳丞印

◎ 图6



◎ 图 7



◎ 图 8



◎ 图 9



◎ 图 10

离”，三川郡的“女阳”“卢氏”，陈郡的“南顿”“新蔡”等，其中“略阳”“游阳”“般阳”“东武”“徐无”“寿陵”等，填补了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空白。（图9）

第六，在文书学方面，堪称“秦中央机关的档案库”。在这批封泥中有以藏文书、财货为主的“府印”，有掌文书、簿籍为主的“御史之印”，有协助天子掌国法国令的

“内史之印”，有掌其治令的“诏事之印”“诏事丞印”，这是目前我国文书档案史上所见到重要的考古资料。秦中央官署上报文书者，一般是正职，亦有副职封缄的，或者是正副职同时封缄，三者并存；秦郡县上报文书一般由副职“丞”封缄。可以说，秦封泥是文书封缄制度的结晶，秦代的文书程式成就了秦封泥的辉煌。（图10）

四、秦封泥学的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土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的秦封泥，被誉为继秦俑、秦简牍之后，秦文化发展史上第三个重大发现。它以秦代文字书法的原真性和秦代篆刻艺术的原真性双重身份，见证了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原补充了秦代历史地理的诸多空白。其多彩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科学信息，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研究，因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封泥形成于2200年以前，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文明的六大贡献十分重要，是基于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起到了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秦代郡县制的成功经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今天我们还在沿用，秦封泥无疑是这一历史文明的重要见证；“印宗秦汉”是几千年来印学家学习篆刻所奉行的宗旨，秦封泥补充了面世秦印的不足，大量、完整、系统地再现了秦印的模式和风范，是极其珍贵地文化遗产。

秦俑学，经过四十多年来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体系基本形成，初具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简牍学，从1901年王国维先生著《简牍检署考》及其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到1970年“简牍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被正式命名，其后该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时至今日已成为当代“显学”，并有《简牍学大辞典》出版^[7]；秦封泥集中发现才24年，人们对它的认识和了解仅仅是个开始，创建秦封泥学，方兴未艾，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加盟。

有人要问，秦封泥能成为一个学科吗？我认为：能。因为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2017年10月由国内一批知名的秦文化专家学者发起倡议的“秦文化研究会秦封泥专业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委员会成立后推出了首批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标志着秦封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个学科是否能成立，取决于它本身的文化内涵和理论价值。这两点秦封泥都具备了。秦封泥的唯一性、丰富性和新颖性三大特点，是秦封泥学创立的基础和生命力延伸的重要标志；秦封泥对文字学、书法学、篆刻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书学的传承和补证，是秦封泥学构建的优势和专长。

秦封泥学的历史，秦封泥学的社会功能，秦

封泥学的特点和研究对象，秦封泥学的理论和资料，秦封泥学研究的方法，秦封泥学和秦文化研究，秦封泥学和其他学科，秦封泥学研究者的素养，秦封泥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等等这些，都是秦封泥学今后需要关注和回答的重要课题。

著名考古学家、被誉为“秦俑学之父”的袁仲一先生，对秦封泥研究寄予厚望。22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秦封泥时，就非常高兴地对学界说：“这是秦汉历史、考古学及中国古代职官、地理研究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其中大量的问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2019年5月10日，袁先生考察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秦封泥特展”时又说，秦封泥是秦人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巨大财富，并即兴题词：“这批秦封泥内涵丰富多彩，是研究秦史秦文化的珍贵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从秦封泥与秦兵马俑、秦简牍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华文明的六大贡献对比研究中，欣喜地看到秦封泥学的前景和曙光；秦封泥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昭然彰显，已为秦封泥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我们期待有更多像秦封泥学院、秦封泥文化研究院和秦封泥艺术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诞生，为秦封泥学的创立、形成和发展，导夫先路，做出贡献！

【注释】

[1] 西林昭一、陈松长：《新中国出土书迹》，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2页。

[2] 同上，第67—68页。

[3] 同[1]，第72页。

[4] 同[1]，第73—76页。

[5] 鹿任隆：《关中秦时大量的竹简木牍哪里去了？》，《说古说今》1999年12月第4期（总第23期），第35—36页。

[6] 张文立：《秦俑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7] 胡平生、马月华：《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鹿任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秦文化研究会秦封泥专业委员会主任。

近十年来秦泥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 / 崔 璨

【摘 要】

自 20 世纪秦泥封被发现以来，与秦泥封有关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近十年来对秦泥封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笔者主要对近十年来的秦泥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将其大致分为内容考释、秦泥封文字与艺术探究、秦职官地理研究、秦泥封分期断代、流传著录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总结。同时，笔者也在文末简要阐述了个人对今后秦泥封研究的些许展望。

【关键词】 秦泥封 研究回顾 展望

关于泥封，世人较晚才对其有明确的认知。清末，四川等地出土的泥封被误认为“汉世印范子”^[1]。之后，《泥封印古录》胡琨序中提到，刘喜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始正这类遗物名为“封泥”。刘鹗《铁云藏陶》自序中亦说：“泥封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2]自清末泥封为世人所知后，不少收藏家广罗出土的泥封，有些如集古印谱一般被收在谱录中。然而，对泥封时代的精确判断并非一蹴而就，对秦泥封的认识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起先，人们并不知道秦泥封的存在，甚至在早期的泥封谱录中，将一些秦泥封归入汉一代。

20 世纪 90 年代秦泥封的大批量出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它们补充和完善了秦职官与地理制度，泥封作为秦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证史、补史、纠史等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关于秦泥封的论文与著

作，大部分以资料披露和内容考释为主，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打好了基本的框架。近十年来，秦泥封被大量发现后的热潮有所减退，但相关探索依旧从未停歇，私人藏家所藏秦泥封有零散公布，有关秦泥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亦有不少新成果出现。

下面，笔者按研究内容对近十年来秦泥封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分类、概述与回顾，并简述个人对秦泥封研究的展望。

一、相关著录与著作

近十年来收录秦泥封的书籍主要有《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新出封泥汇编》《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玺印封泥选》《中国封泥大系》，有关秦泥封研究的著作主要是《秦西汉印章研究》与《秦玺

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下面按照出版时间顺序对以上著录与著作进行简要叙述。

2010年，周晓陆主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秦泥封584种，个别秦泥封的类别有标误之处，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西安出土，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封泥考略》等著录。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是泥封资料的专门谱录，收录西安相家巷出土秦泥封272种1224枚，西安六村堡出土秦泥封270种1032枚，西安高陵出土秦泥封63种192枚，平舆古城村出土秦泥封15种72枚；所收录秦泥封资料较为全面，且有音序索引表，对其中涉及的地名、职官名也作了音序索引，另外还对2010年以前的有关泥封的文献一一列出，此书资料价值极大。

2011年，许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著录鉴印山房所藏战国至汉代古泥封311枚，其中有相家巷秦泥封28枚，平舆所出秦泥封9枚及未名出土地域秦泥封3枚。书中除了泥面拓本之外，还有彩色照片，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泥封本身情况。

2012年，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主体为作者博士后研究报告，涉及秦汉印章制度、印文释读、内容考证、印文形制等多方面内容。

2014年，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当时为止收集秦玺印泥封资料最全、研究最为系统的著作。其中对秦玺印泥封的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对新出土的秦泥封资料搜集得比较全面，根据秦代玺印与泥封内容对当时的职官与地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重点在于将秦玺印泥封中所见职官或地名还原到秦代职官系统与行政区划中去，并注意到了泥封表面划痕原因与残碎泥封价值等较少人关注的问题。该书同时采用了列表和图示的方法，形象地展示职官体制的源流演变和地名的分布，及其与相关资料的对应关系。

2018年，许静洪、许云华主编《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玺印封泥选》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收录张小东先生捐赠的玺印101件，泥封102件，其中秦泥封有“橘府”“廷府”“御府丞印”“阳周丞印”四枚，均有彩色照片，印刷清晰。同年，任红雨《中国封泥大系》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根据2017年6月之前的相关著录及材料

63种，辑录泥封6347种，拓片共15177件，其中，秦泥封拓片有5727件，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泥封资料汇编。

以上著录中的秦泥封资料大多以印面拓本为主，而涉及秦泥封泥背与泥面痕迹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较少，这也是一直以来关于泥封谱录类书籍所欠缺的地方。

二、内容考释

在20世纪90年代秦泥封大批量发现后，对秦泥封的考释一直是学界内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章更是层出不穷。

近十年来，虽然新见秦泥封品种减少，相关研究热度有所降低，但也有文章对新见秦泥封进行披露并考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晓捷、周晓陆《北京文雅堂藏秦封泥选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王辉、王巧英《释文雅堂藏几枚与府有关的秦封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21辑，2014年），王伟《文雅堂藏新品秦封泥考释（二十则）》（《中国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与《新见秦地名封泥选释（十五则）》（《出土文献》2017年第1期）等。这几篇文章对当时所新见到的秦泥封进行了考释，论述有详有略，且有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互佐证。

另外，曹锦炎《谈秦封泥“永巷”“永巷丞印”札记》（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主要从文字学角度讨论了“巷”字构形并对永巷作了简要考证；王伟《秦文字札记（五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第3辑，2013年）一文对秦泥封中个别释文与职官、地名进行探讨，其《秦文字释读笥记（四则）》（《出土文献》第五辑，2014年）对《新出封泥汇编》与《新出陶文封泥选编》中著录的三例秦泥封的字形与内容进行了考释；朱晨、吴红松《秦封泥文字考释二则》（《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从古文字角度对两例私印秦泥封的释文重新进行了考订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张传官《秦汉封泥试缀三则》（《中国文字研究》2018年第2期）对《新出封泥汇编》中的六枚残缺泥封进行拼缀，并得出秦“客事之玺”“南顿丞印”与汉“齐食官丞”各一。

还有一些文章对已有秦泥封内容进行了新的论述，如

陈晓捷《秦汉封泥铭刻五例新解——兼论昌平君昌文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第4辑，2014年）、陈治国《“阴御弄印”与“阳御弄印”封泥考释》（《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贾丽英《“代马丞印”小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又如李振洲《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秦代封泥鉴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2期），对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秦泥封20品作了简单的说明，均为已见品种。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学界内不仅对以往秦泥封的考释成果有所补充并有一定的纠正，而且有一定的新资料陆续公布。同时，相关考释工作也随着其他文字资料的出土、公布进一步深入。

三、文字与艺术研究

秦泥封的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秦职官与地理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文字及其艺术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材料。

近十年来，有不少文章利用秦泥封材料来探讨秦文字构形、特征与艺术。比如，周晓陆、崔璨《略谈秦泥封文字与艺术》（《书法》2017年第10期）系统地论述了秦泥封文字的特征与艺术；张炜羽《从相家巷秦封泥看摹印篆的文字特征与演变过程》（《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通过相家巷出土秦泥封探讨了秦“摹印篆”的文字特征与演变过程，并在文末附有“相家巷秦封泥文字编”；庞任隆《通过秦封泥和汉瓦当文字的对比窥探秦小篆研究传承的当代意义》（《秦汉研究》第四辑，2010年）主要从文字角度探讨秦泥封与汉瓦当文字的异同与秦小篆之美；朱晨《秦封泥文字与〈说文解字〉所辑字形的对比研究》（《第七届汉字与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摘要集》，2017年）从秦泥封文字本体方面来进行探讨，侧重于秦泥封文字与《说文解字》中不同字形的比对。

此外，也有不少硕博学位论文以秦泥封文字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内容涉及秦泥封文字。其中博士论文体量较大且研究内容极为详细，例如，单晓伟《秦文字疏证》（安徽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一文运用了不少秦玺印泥封资料，在全面收集秦出土文字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厘定及

编年分类工作，并按照《说文解字》顺序编制了文字编，同时也谈到秦文字的构形与演变；朱晨《秦封泥文字研究》（安徽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秦泥封文字的形体演变，考释了部分里耶出土秦泥封文字与两则姓名泥封文字，并按照《说文解字》体例作了详细的秦泥封文字编，资料性极强。刘孝霞《秦文字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对秦出土文字资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采集、梳理，重点部分亦是秦文字编。李苏和《秦文字构形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在搜集整理秦文字资料基础上展开了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秦文字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秦文字的断代标准。

近十年来的相关硕士论文如徐善飞《近四十年出土秦汉篆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重点部分为对近四十年出土的秦汉篆书文字编制文字编，其中涉及不少秦玺印泥封文字；徐冬梅《秦封泥文字字形研究》（河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秦封泥集》中的官印泥封为研究对象，对秦泥封文字的字量进行统计、分析，将其字形与《说文解字》小篆作了对比研究，并阐述了秦泥封文字字形研究在汉字学、秦汉史研究以及篆刻艺术方面的意义，此文在材料选取方面有较大的限制。李倩冉《新出秦汉印章封泥文字整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整理了1990年之后部分杂志与著作中的秦汉印章与泥封，也将其文字与《说文解字》字形作了比较，并把所收集到的新出秦汉印章泥封文字做成了便于查阅的字表。

四、秦泥封与秦职官地理研究

秦泥封作为秦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秦史的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秦泥封的发现与出土极大补充了秦传世文献的不足，也修正了历史记载的不确之处。自秦泥封大批量被公布以来，秦泥封与秦史相结合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在不断进行中，而且秦泥封经常与秦其他出土文献一起作为依据来探讨秦职官制度与地理沿革。其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根据秦泥封、玺印资料来展开讨论，这一类的研究较之以往有所减少；第二类不单以秦泥封为依据，而是结

合其他出土文献及历史记载来综合考证秦职官与地理制度，这也是近十年来相关成果的主体部分。

第一类研究主要讨论秦泥封、玺印中的职官与地理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从宏观角度对秦郡及郡官史料重做整合，并对秦官印文字中的官名构成规则作了解析；王辉《从“封泥”看秦代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团结报》2018年10月11日）整体论述了秦泥封所反映的秦代职官制度与郡县地理制度；陈昭容《从封泥谈秦汉“詹事”及其所属“食官”》（《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要通过秦泥封等材料，论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王后及太后的“詹事”及其属下“食官”；王伟《秦玺印封泥所见宫殿及其分布》（《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对秦玺印与泥封中所见的宫殿名作了考释并对其分布位置作了探究；高子期《秦封泥中的川渝史料》（《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考证了31品与川渝地区有关的郡县、苑囿等职官与地名秦泥封。此类文章均是结合其他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探讨秦泥封与玺印资料中出现的职官与地理，相似研究还有一些^[3]，文中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类研究综合运用秦出土文献（不拘于秦泥封、玺印类）及传世文献对秦职官制度与地理沿革进行考证、补充，这在近十年来成果比较丰富。这类研究中有一部分是针对秦某一类职官进行论述的，比如王辉《秦封泥等出土文字所见内史及其属官》（《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伟《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郡名称补正》（《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梁勇《试论“大匠官司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吴晓懿《秦简封泥所见秦厩官名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3期）、李超《秦汉贡橘制度考》（《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不少^[4]，在这里也不再一一表述。

在第二类研究中还有部分文章以秦历史地理为研究重点，借助秦泥封等出土文献来论证。这类文章近十年来有不少，比如章宏伟《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夏大兆《〈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周郢《“泰山守”与“泰山司空”：秦代泰山置官考》（《泰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张莉《秦郡再议》（《历史地理》2014年第1期），吴良宝、秦凤鹤《战国至秦代内史辖县新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徐卫民、裴蓓《新出土资料与秦历史地理研究》（《秦汉研究》第九辑，2015年）等。这些均是通过秦泥封等出土文献来对秦相关地理沿革与历史进行讨论。还有一些研究方法近似的文章^[5]，文中不再列举。

近十年来将秦泥封等出土文献与秦史结合进行探究的学位论文也有一些，比如杜小钰《秦职官考》（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依据传世与出土文献对秦职官体制及其演变进行了详细整理与分析；孔永红《出土印玺所见秦汉的官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对秦汉玺印与泥封中涉及的职官制度进行了考证，但将秦与汉一概而论有不妥之处；赵孝龙《秦职官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安徽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立足于秦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讨论了秦职官的源流、秦职官与地理因素的联系以及秦职官构成等方面；张宁《秦封泥历史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主要对秦泥封中体现的秦郡、县名称进行了整理，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作了总结。

五、秦泥封出土地及分期断代等相关问题研究

对秦泥封的释读、与秦史相结合的研究等内容是秦泥封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秦泥封出土地调查与分期断代等方面的成果。

关于秦泥封出土地的调查与研究成果，此前已有不少文章论及，近十年来像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简要概述了秦泥封的考古发掘情况并对其出土地地望作了讨论；马骥《西安近年封泥出土地调查》（《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记录了作者亲自调查与实地勘察后公布的西安几处泥封的确切出土地址。

对秦泥封的分期、断代等方面研究也有新的文章发表，比如张懋镕《试论秦代封泥与汉初封泥的区分》

(《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要从章法布局、字形书体、结构、风格等方面归纳了秦泥封与汉初泥封的区分要点，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皇帝信玺”应是汉初之物；刘瑞《秦封泥分期释例》(《考古》2013年第10期)一文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将57种秦泥封确定到战国秦、统一后秦始皇秦与秦二世秦三段时间之内，且依据出土地层对个别分期进行了验证，这对秦泥封分期来说是极有益的尝试；江连山《“参川尉印”及封泥归属猜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根据文献与“参川尉印”泥封的字形认为此泥封可能是项羽所封河南王的属官用印遗物，而非嬴秦之物；大西克也《从里耶秦简和秦封泥探讨“泰”字的造字意义》(《简帛》第八辑，2013年)就“大”与“泰”字的出现规律探讨了相关分期问题，值得参考；王伟《秦玺印封泥文字研究三题》(《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论述了秦玺印泥封中的高频字用法与鱼纽、蛇纽在断代方面的参考作用；马孟龙、何慕《再论“秦郡不用灭国名”——以秦代封泥文字的释读、辨伪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期)一文以“赵郡左田”“齐中尉印”“齐左尉印”为例，在文字释读、辨伪方面作了讨论，说明了王国维“秦郡不用灭国名”对秦政区研究的重要性，并揭示了对传世文物慎重使用的意义；崔璨《秦泥封的发现与鉴定》(南京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对秦泥封的发现与出土作了清晰的叙述，将所搜集的印文明确且基本完整的秦泥封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并简要总结了秦泥封鉴定的主要依据。

六、流传著录及其他研究

近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到海内外秦泥封流传著录方面的问题，如：施谢捷《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藏所误标问题》(《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部分著录中秦泥封藏所误标之处予以纠正；松丸道雄、高久由美《中国古封泥在日本——介绍二十世纪上半叶传到日本的几批中国古封泥》(《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及李中华《东瀛所藏中国封泥述略——记日本公共机关藏品》(《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介绍了日本所藏中国古代泥封的情况；杨广泰《封泥研究资料及相关文献目录(1842—2010)》(《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秦官印封泥著录史略》(《东方艺术》2013年第4期)对泥封相关的文献及秦泥封著录历史进行了梳理。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秦泥封及其他出土文献作了研究综述，如：王伟、王辉《秦文字的发现和研究简史(1949年之前)》(《中国文字研究》2011年第2期)，单晓伟《秦文字出土与研究综述》(《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王伟《20世纪以来的秦玺印封泥研究述评》(成建正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7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王辉《古封泥的发现、著录及其研究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24辑，2017年)，庞任隆《秦封泥入藏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二十年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综述》(《书法》2017年第10期)，王伟、杨广泰《古代封泥概说》(《书法》2017年第10期)等。另外，陈松长《与封泥有关的秦汉简牍文献拾零》(《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可以说是别样的文献综述。作者论述了秦汉简牍文献中与泥封“封物”有关的记载，这是秦汉时期泥封使用的原始记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涉及秦泥封保护问题，如：庞任隆《秦封泥文物保护展示的实践与观察》(《文博》2014年第4期)，赵光涛、李玉虎、杜德馨《含光门遗址博物馆馆藏秦封泥虫害治理研究》(《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6期)，这两篇文章从文物保护角度探讨秦泥封的展示与虫害治理等相关内容，这也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七、小结与展望

通过对近十年来秦泥封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对秦泥封资料的披露已经比较全面，且相关考释也比较丰富，那么对以往研究进行深化总结就有一定的必要性了。经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与爬梳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关于秦泥封的专门研究有所减少，也就是说，学者们不再仅以秦泥封为直接研究对象，不再拘泥于对秦泥封资料的披露、考释，而是转向更为多元的领域。例如，基于秦玺印泥封

等资料,探讨秦文字的艺术与发展;结合传世文献与秦出土文字资料,讨论秦职官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的问题;探究对秦泥封文物的保护,等等。由是观之,今后秦泥封的研究应当会更加细致与丰富。

笔者在整理相关资料之后,也意识到秦泥封研究还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个别泥封内容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对秦泥封的分期研究值得再探讨,关于秦泥封的出土地性质目前仍存在一定争论,有关秦职官、地理体系的系统研究及其与前后时代的对比都还有前进空间,对残损秦泥封的缀合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在秦泥封文字与艺术方面也值得深入发掘。

另外,受科技考古方面的启发,笔者认为关于秦泥封的科技探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例如,对秦泥封泥质进行分析,建立起秦泥封的泥质标本库,这或许能在解决某一秦泥封来自何地、缀合破碎秦泥封等方面提供帮助;秦泥封表面与背面痕迹的检测,或许能够为还原秦泥封的制作、使用、废弃过程提供科学解释。同时,秦泥封本身质地并不十分坚硬,且印面文字容易磨损,对秦泥封的科学保护也要借助科技手段来实现。

为中心》,《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杜小钰:《秦代食官考》,《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李超:《秦汉养狗官制考》,《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李超:《秦汉都船考》,《秦汉研究》第十一辑,2017年;陈四海:《乐府:始于战国》,《音乐研究》2010年第1期。

[5] 同类研究还见于:贾丽英:《从出土文献看秦时赵郡与恒山郡的变迁》,《石家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侯廷生:《“甘丹”出现时间及嬗变为“邯郸”的新证》,《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高移东:《鄞县考》,《文博》2016年第5期;周群:《秦代置郡考述》,《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熊贤品:《出土文献所见秦、楚食盐产地的分布》,《盐业史研究》2016年第1期;吴良宝:《出土秦文字与政区地理研究举例》,《中国文字研究》2017年第1期。

【注释】

[1] 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海吴氏家刻本。

[2] 刘鹗:《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影印本,第97页。

[3] 其他同类研究如:陈治国、谷朝旭:《秦封泥中“左般”与“右般”考释》,《文博》2013年第3期;李超:《秦阴阳御弄封泥与苑囿略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2期;刘新民:《古代玺印中的“左(右)攀桃支(丞)”新考》,《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张宁:《秦封泥所见郡县空间分布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第3期;孙闻博:《秦汉太尉、将军演变新考——以玺印资料为中心》,《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苗润洁、后晓荣:《秦汉印章封泥中的水文化》,《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4] 相关研究还见于:赵孝龙、胡香莲:《秦工官考》,《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期;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王伟:《秦出土文献所见太尉与邦尉及其关系辨正》,《秦始皇帝博物院》总第4辑,2014年;孙闻博:《秦汉中央宿卫武官演变考论——以宿卫体系确立与中郎将、校尉的发展

【作者简介】

崔 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 同一封泥重复著录问题

文 / 施谢捷

傅嘉仪先生编著的《秦封泥汇考》^[1]（下文或简称《泥考》），基本涵盖了之前出版的《秦封泥集》^[2]（下文或简称《泥集》）、《封じる》^[3]、《古封泥集成》^[4]（下文或简称《集成》）、《篆字印汇》^[5]、《历代印甸封泥印风》^[6]（下文或简称《泥风》）、《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7]（下文或简称《新出土》）、《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8]（下文或简称《陝玺》）及部分零散发表的秦封泥材料，依然是目前除《新出封泥汇编》^[9]以外收录秦封泥数量与品种最多的一部著作，研究和引用秦封泥资料不可或缺。我们在对已经发表的秦封泥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秦封泥集》在著录方面存在的问题，《秦封泥汇考》几乎全部承袭，而且本身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收藏单位标注失实、同一封泥重复著录、拓本照片不相对应、封泥编号前后不一、官印封泥误入私印、封泥释文取舍失当、残损封泥归属缀合等。关于收藏单位标注失实方面的问题，笔者曾撰《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藏所误标问题》一文，提交2010年11月于浙江杭州召开的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10]，其中已经涉及个别属于“同一封泥重复著录”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对《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等著录中存在的“同一封泥重复著录”各例逐一揭示，以期能















对使用相关秦封泥数据者有所帮助。

与其他同类的古文字数据总集一样，由于涉及数据数量繁多，同一器物往往先后有过数次传拓，加之有些器物除锈清理前后的差异，致使同一器物的不同拓本或多或少会有清晰程度的不同，整理时如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同一器物重复著录的问题。《秦封泥集》《秦封泥汇考》等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研究者针对秦封泥所作相关统计的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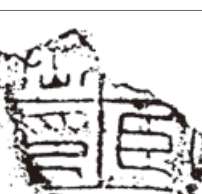



《秦封泥集》《秦封泥汇考》著录秦封泥主要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品为基础，按理同一封泥只需要选取效果最好的一种拓本入录即可。我们知道，同一封泥即使由同一人拓制，由于用力轻重、对边缘的取舍不同等因素，也往往会使同一封泥的拓本形态呈现或大或小的差异，而同一封泥由不同人拓制，同一封泥的拓本形态方面的差异有时会更明显。经过仔细复核比对，我们发现二书均存在将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分别重复著录的情况，甚至有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前后相次或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分别给以不同释文的情况。

先通过表1看《秦封泥集》中属于同一封泥重复著录的诸例。

表 1 《秦封泥集》同一封泥重复著录诸例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1			左丞相印	A: 《泥集》一·二·2·4 (《泥考》5) B: 《泥集》残 1
2			右丞相印	A: 《泥集》一·二·3·2; 《泥考》11 B: 《泥集》一·二·3·4; 《泥考》13
3			御史之印	A: 《泥集》一·二·4·2 (《泥考》19) B: 《泥集》残 86
4			少府	A: 《泥集》一·二·31·10 B: 《泥集》一·二·31·2 [《封じる》106、 《泥考》67页(二)]
5			居室丞印	A: 《泥集》一·二·46·2; 《泥考》508 B: 《泥集》一·二·46·9; 《泥考》513
6			居室寺从	A: 《泥集》一·二·47·2; 《泥考》537 B: 《泥集》一·二·47·3; 《泥考》538
7			御府丞印	A: 《泥集》一·二·52·12; 《泥考》859 B: 《泥集》一·二·52·13; 《泥考》860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8			御府丞印	A: 《泥集》一·二·52·14; 《泥考》861 B: 《泥集》一·二·52·15; 《泥考》862
9			郡右邸印	A: 《泥集》一·二·62·2; 《泥考》333 B: 《泥集》一·二·62·1; 《泥考》335
10			郡右邸印	A: 《泥集》一·二·62·20; 《泥考》350 B: 《泥集》一·二·62·28; 《泥考》52页(日)
11			内官丞印	A: 《泥集》一·二·63·11; 《泥考》631 B: 《泥集》一·二·63·10; 《泥考》630
12			寺从丞印	A: 《泥集》一·二·79·15; 《泥考》782 B: 《泥集》一·二·79·14; 《泥考》781
13			寺从丞印	A: 《泥集》一·二·79·16; 《泥考》783 B: 《泥集》一·二·79·6; 《泥考》769
14			属邦工丞	A: 《泥集》一·二·94·3; 《泥考》378 B: 《泥集》一·二·94·6; 《泥考》381
15			章廩丞印	A: 《泥集》一·三·3·5; 《泥考》196 B: 《泥集》一·三·3·4; 《泥考》197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16			官廩丞印	A: 《泥集》一·三·五·10; 《泥考》218 B: 《泥集》一·三·五·9; 《泥考》217
17			中廩丞印	A: 《泥集》一·三·七·18; 《泥考》247 B: 《泥集》一·三·七·9; 《泥考》239
18			中廩丞印	A: 《泥集》一·三·七·27 (《泥考》255) B: 《泥集》残 11
19			小廩丞印	A: 《泥集》一·三·14·13 B: 《泥集》残 87
20			华阳丞印	A: 《泥集》一·四·6·2; 《泥考》892 B: 《泥集》一·四·6·4; 《泥考》893
21			高章宦丞	A: 《泥集》一·四·17·9; 《泥考》964 B: 《泥集》一·四·17·6; 《泥考》961
22			官臣丞印	A: 《泥集》一·五·8·4 (《泥考》1066) B: 《泥集》残 82
23			旄大夫	A: 《泥集》一·五·28·1; 《泥考》1151 B: 《泥集》一·五·28·2; 《泥考》1152 (《封じる》107)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24			废丘丞印	A: 《泥集》二·三·11·9 (《泥考》1306) B: 《泥集》残 81
25			郎中丞印	A: 《泥集》残 29 B: 《泥集》残 41
26			中尉之印	A: 《泥集》残 31 B: 《泥集》残 34
27			高章宦丞	A: 《泥集》残 66 B: 《泥集》残 38












表 1 所举第 2 例“右丞相印”、第 5 例“居室丞印”、第 6 例“居室寺从”、第 7、8 二例“御府丞印”、第 9、10 二例“郡右邸印”、第 11 例“内官丞印”、第 12、13 二例“寺从丞印”、第 14 例“属邦工丞”、第 15 例“章廩丞印”、第 16 例“官廩丞印”、第 17 例“中廩丞印”、第 20 例“华阳丞印”、第 21 例“高章宦丞”、第 23 例“旛大夫”等封泥的不同拓本在《泥集》中重复著录，《泥考》未加筛选，全数加以承袭。其中第 10 例“郡右邸印”图 B，虽较图 A 尺寸小了许多，但二者显然是同一封泥拓本，《泥集》一·二·62·28 重复著录图 B 时注为篆刻美术馆藏品，《汇考》52 页著录承袭其误；第 13 例封泥现藏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泥集》一·二·79·6、《泥考》769 重复著录此封泥的另一拓本图 B，且误标为“古陶”即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11]《泥集》下编附章“残碎品”所著录计 89 号，《泥考》均未加以采录。上举第 1、

















3、18、19、22、24—27 各例封泥均为印文不完整的残碎品，从上揭拓本特征观察，诸例的图 A 与图 B 均是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泥集》既已根据印文完整之封泥，正确地将其中第 1 例图 A 补释为“左丞相印”，第 3 例图 A 补释为“御史之印”，第 18 例图 A 补释为“中廩丞印”，第 19 例图 A 补释为“小廩丞印”，第 22 例图 A 补释为“官臣丞印”，第 24 例图 A 补释为“废丘丞印”，则相应的诸例图 B 不应该再重复著录，出现在附章部分。又，第 18 例封泥亦著录于《秦官印封泥聚》3 (图 1)，是与上揭第 18 例图 A、图 B 均不同的另一拓本。其余第 25—27 三例，均重复著录见于附章部分，其中第 25 例印文，图 A《泥集》正确地释为“□中□印” (残 29)，图 B 则误释为“□□之丞” (残 41)。经与相关完整同印封泥的印文比对，上揭第 25 例印文为“郎中丞印”之残，第 26 例印文为“中尉之印”之残^[12]，第 27 例印文为“高章宦丞”之残。第

4例“少府”图A,《泥集》标注为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图B据《泥集》标注,系采自《封じる》106著录的“二闰山房”藏品,与图A呈现面貌有较大不同,盖为此封泥转归二闰山房后重制拓本。

《秦封泥汇考》中除上举承袭《秦封泥集》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重复著录诸例,《泥考》本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另还新出现一些将所采用数据中同一封泥拓本重复著录的问题,主要有表2所揭诸例。

表2 《秦封泥汇考》同一封泥拓本重复著录诸例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28			寺乐左瑟	A: 《泥考》105 B: 《泥考》106 (《新出土》8.1)
29			中廕丞印	A: 《泥考》228 (《新出土》17.1) B: 《泥考》256 (《泥集》一·三·7·28)
30			中廕丞印	A: 《泥考》231 B: 《泥考》249 (《泥集》一·三·7·20)
31			中廕将马	A: 《泥考》257 B: 《泥考》260 (《泥集》一·三·8·3; 《泥风》133.6)
32			小廕丞印	A: 《泥考》281 (《泥集》一·三·14·4) B: 《泥考》285 (《泥集》一·三·14·4)
33			下家马丞	A: 《泥考》303 B: 《泥考》298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34			宦走丞印	A: 《泥考》617 B: 《泥考》595
35			尚浴	A: 《泥考》655 (《新出土》47.1) B: 《泥考》662 (《泥集》一·二·65·5)
36			尚浴	A: 《泥考》657 B: 《泥考》661 (《泥集》一·二·65·4)
37			咸阳亭丞	A: 《泥考》1159 (《新出土》88.2) B: 《泥考》1160 (《篆字印汇》255页; 《泥风》159.2; 《泥集》二·五·2·1)
38			咸阳亭丞	A: 《泥考》1161 (《泥集》二·五·2·2) B: 《泥考》1158 (《泥集》二·五·2·2)
39			咸阳亭丞	A: 《泥考》1157 (《泥集》二·五·2·3) B: 《泥考》1162 (《泥集》二·五·2·3)
40			咸阳工室丞	A: 《泥考》1185 B: 《泥考》1188
41			離工室丞	A: 《泥考》1326 (《新出土》107.1) B: 《泥考》1324





42			菑丞之印	A: 《泥考》1274 B: 《泥考》1393
43			桓段	A: 《泥考》1479 B: 《泥考》1476

表2所举第32、38、39三例的图A、图B分别是《泥考》采自《泥集》一·三·14·4、二·五·2·2、二·五·2·3的同一封泥拓本，属于同一封泥拓本重复著录。第32例本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品，《泥考》281、285均误注为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13]，第38、39二例封泥印文实为“咸阳亭丞”之残，且其中第38例“丞”的上端笔画尚可分辨，亦可与上举第37例印文完整的“咸阳亭丞”封泥对照，《泥集》将此二例归在“咸阳亭丞”下是可信的。《泥考》1157、1158重复著录，将印文改释为“咸阳亭印”，其实是错误的。同出封泥中有印文相对完整的“咸阳亭印”封泥（图2、图3）分别著录于《新出土》88.1、《泥考》1153及《泥集》二·五·1·1、《泥考》1154，其中“亭”所从“丁”的写法还是可以区别的。^[14]其余诸例均属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重复著录，只要稍加留意是较易分辨的。《泥考》在重复著录时，往往还存在误标藏所或误释印文的情况。如上举第35、36二例

“尚浴”封泥，本是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品，《泥考》在重复著录时承袭《泥集》之误标注为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15]第33例“下家马丞”封泥，《泥考》298重复著录图B时，将印文中的“下”误释为“上”。“上家马丞”“下家马丞”在秦封泥中均有数见，“上”“下”之别应该是容易看出的。《泥风》145.5亦著录此封泥（图4），与《泥考》发表的不是同一拓本，显然较图A、图B二拓本的印文字画更加清晰。第34例“宦走丞印”封泥印文，《泥考》595著录图B下误释为“宦者丞印”；第41例“雕工室丞”封泥，《泥考》1324著录图B下误释为“雕工室印”；第42例“菑丞之印”封泥印文，《泥考》1393著录图B下误释为“芒丞之印”。第43例“桓段”为私印封泥，图A、图B系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此私印封泥在传相家巷出土封泥中多见，人名“段”过去多释为“段”，误。

《泥考》《泥集》中还著录有几件封泥（表3）。

表3 《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著录部分封泥

序号	图A	图B	释文	出处
44			中廐丞印	A: 《泥集》一·三·7·30; 《泥考》37页左三 B: 《泥集》一·三·7·31; 《泥考》37页左四







序号	图 A	图 B	释文	出处
45			咸阳丞印	A: 《泥集》二·一·二·31; 《泥考》172页; 《百年学府聚珍——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品集》 ^[16] 71左下 B: 《泥集》二·一·二·12; 《泥考》1176
46			走翟丞印	A: 《泥考》1541 B: 《泥考》1543
47			蜀左织官	A: 《泥考》87页 (《泥风》132.3; 《泥集》二·二·7·1) B: 《泥考》588

表3所举第44—47四例封泥的拓本图B与图A相较,图B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不如图A完整,或缺文字,或缺笔画,图B明显只是图A的一部分,如第44例“中廩丞印”图A的“丞”笔画完整,应该是利用相关残碎封泥与图B进行拼缀形成的面貌,第45、46、47三例封泥拓本图A的面貌也应该是同样的原因形成的,当是据拼缀后的封泥制作的拓本。封泥既已经过拼缀,则未拼缀前的残损封泥拓本完全没有理由重复录入。第47例封泥“蜀左织官”,本为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品,《泥考》8页著录图A时误标出处为“续”(指《续封泥考略》)。

最后,顺便将我们使用《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及《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17](下文或简称《世纪》)二书过程中发现的所著录秦封泥中同一封泥重复著录例胪列于此(用“=”表示同一封泥的不同拓本之间的关系):

1. 《新出土》100.1 = 《新出土》125.2, 芒丞之印

按:此封泥亦著录于《泥风》154.4、《泥考》1392

等。《新出土》100.1误释为“莛丞之印”。

2. 《新出土》98.2 = 《新出土》151.1, 邓印

按:此封泥亦著录于《陝玺》144、《泥考》1467等,《新出土》98.2误释为“酆印”。《泥考》1467、《新出土》151.1误归在私印封泥。

3. 《世纪》三-GP-0075 = 《世纪》三-GP-0115, 御羞

按:原著录于《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图一八:1(图版拾:9, T2③:114)。《世纪》三-GP-0115误注为“陶片”。

4. 《世纪》三-GP-0203 = 《世纪》三-GP-0314, 汾阴丞印

按:此封泥亦著录于《泥风》144.2、《泥考》194、《篆字印汇》p898、《泥集》二·三·46·1、《新出土》132.2、《泥考》1418等。

5. 《世纪》三-GP-0251 = 《世纪》三-GP-0603, 钜鹿之丞

按:此封泥原著录于《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

容》^[18]图 18。《世纪》三-GP-0603 释为“钜鹿之印”。

6. 《世纪》三-GP-0291 = 《世纪》三-GP-0321, 蕃丞之印

按: 此封泥亦著录于《泥风》p151、《新出土》141.2、《泥考》1455。

7. 《世纪》三-GP-0293 = 《世纪》三-GP-0307, 当城丞印

按: 此封泥亦著录于《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19]图二九:6、《辽宁省博物馆藏辽海印信图录》^[20]15、《泥集》二·三·70·1 等。

8. 《世纪》三-GP-0447 = 《世纪》三-GP-0563, 弩工室印

按: 此封泥亦著录于《泥风》p141、《泥集》一·五·24·1; 《陝玺》141; 《泥考》408 等。

9. 《世纪》三-GP-0496 = 《世纪》三-GP-0599, 阿阳禁印

按: 此封泥原著录于《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21]图三:13。

10. 《世纪》三-GP-0602 = 《世纪》三-GP-0114, 霸园

按: 此封泥原著录于《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图三:8。

[12] 此例或许可以与《考古学报》2001 年第 4 期所载《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图一八:13 (图版拾叁:3, T2③:136) 进行拼缀, 说看另文。

[13] 同 [10], 第 151 页。

[14] 有关秦封泥中印文残缺不全的所谓“残碎品”的释读, 往往多有歧解, 我们有专题讨论, 详另文。

[15] 同 [10], 第 155 页。

[16]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百年学府聚珍——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品集》,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17] 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 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18] 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

[19] 李恭笃、高美璇:《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 年第 2 期。

[20] 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 辽海出版社 2000 年版。

[21] 周晓陆、刘瑞、李凯、汤超:《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考古与文物》2005 年第 5 期。

【注 释】

[1] 傅嘉仪:《秦封泥汇考》,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

[2]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 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

[3] 松村一德:《封じる》(古河市立篆刻美术馆平成 10 年度企画展图录), 日本茨城县古河市篆刻美术馆 1998 年版。

[4]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

[5] 傅嘉仪:《篆字印汇》,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 年版。

[6] 傅嘉仪:《历代印匊封泥印风》,《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 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版。

[7] 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 西泠印社 2002 年版。

[8] 伏海翔:《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

[9] 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 年版。

[10] 施谢捷:《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藏所误标问题》,《青泥遗珍: 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 年版。

[11] 同上, 第 151 页。

【作者简介】

施谢捷: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文字学会理事, 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南北朝官印文字看中国古代泥封的衰落

文 / 杨逸云

【摘要】

从考古资料来看，汉代以后的泥封出土数量较少。南北朝官印虽然以阴文为主，但已经开始钤朱用印。本文对比秦汉时期泥封（官印）和南北朝时期的官印，发现秦汉时期的官印打在封泥上的笔画均匀，深浅基本一致，印面平整，而南北朝时期的官印文字笔画深浅不一。由此可以看出，南北朝官印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泥封制度的衰落、玺印使用制度兴起的变化。

【关键词】 秦汉 南北朝 官印 泥封 衰落

从考古资料来看，泥封在战国秦汉时期使用较多，用于密封保护公私简牍文书、装有物品的器皿以及门户等，如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盛放食物的硬陶罐、壶，口部被草填塞，外敷泥并置泥封匣，其中泥封为“软侯家丞”（图1）。^[1]而汉代以后的泥封出土数量较少。

孙慰祖先生《钤朱时代与官印改制》一文详细论述了钤朱制度在北朝晚期的形成情况。“钤朱先行，官印形态改变在后”^[2]，南北朝官印虽然以阴文为主，但已经开始钤朱用印，至北朝后期出现阳文官印，完成了形态上的改变。此时的官印也有直接示人的，如上海博物馆藏南朝“兴宁子章”（图2）为填金铜印^[3]，也有的是随葬所用。而南北朝官印文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泥封制度的衰落、玺印使用制度的变化，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内容。

从秦、汉、新莽时期的泥封如“右丞相印”“郡左邸印”“女阴令印”“朗陵侯相”“河东太守章”“司空左大夫”等（图3—图8），可见此时的官印文字多为阴文，笔画均匀，深浅基本一致，且印面平整，这些特点使得此时的官印打在封泥上较为清晰。



◎ 图1 “软侯家丞”泥封出土情况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图版二九



◎ 图2 兴宁子章 南朝
《中国玺印篆刻通史》第166页



◎ 图3 右丞相印
《秦封泥汇考》附录二第1页



◎ 图4 郡左邸印
《秦封泥汇考》附录二第12页



◎ 图5 汝阴令印 西汉
《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第52页



◎ 图6 朗陵侯相 东汉
《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第64页



◎ 图7 河东太守章
《新出新莽封泥选》第65页



◎ 图8 司空左大夫
《新出新莽封泥选》第111页



◎ 图9 主爵都尉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271页



◎ 图10 魏郡太守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368页

东晋、十六国时期涣解风格的印章开始出现，字体趋向于简率，字体结构如同拼搭而成，如故宫博物院藏东晋“主爵都尉章”（图9）、后赵“魏郡太守章”（图10），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后已经极为普遍。而这种涣解风格的泥封现在基本不见。

南北朝官印基本为阴文，后期出现阳文。少量的阴面有出现边栏，文字两排和三排均有。南朝官印文字多数笔画较细，字体显得简率、局促，北朝官印文字多粗率，直刀刻出，不加修饰，字体粗犷、疏阔。如这两枚“宁朔将军章”（图11、图12）就有非常明显的对比。

南朝官印多数笔画较为纤细，如《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所录“建威司马”“长宁令印”“南昌男章”（图13—图15），也存在笔画较粗者，如上海博物馆藏“巴陵子相之印”（图16）、“材官将军章”（图17）。此时的官印印面留白增多。两排印有“□□□印”“□□令印”等，三排印有“□□太守章”“□□将军章”等，每个字所占印面比例可能并不一致，有大小之别，但又有一种微妙的平衡感，字体欹侧，左右错落。

部分印文隶化明显，如故宫博物院藏“庐陵太守章”（图18）；并且出现楷书入印，结体较扁，如《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所录“镇北将军章”（图19）。

北朝官印文字多粗率，且排列紧密，如故宫博物院藏“安西将军章”（图20）、上海博物馆藏“常山太守章”（图21）、“威烈将军印”（图22）。

北朝早期也有笔画相对较细，同时出现盘曲折叠的现象，对之后隋唐盘条篆印的形成产生影响。如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北魏“冠军将军印”“高城侯印”“怀州刺史印”（图23—图25），从中很明显地看出其中部分笔画盘曲折叠，但仍是方折。到隋唐时的盘条篆则发展为圆转，如《隋唐官印研究》所录“安定郡市印”（图26）、“长安县印”（图27）。

这种印文字体与北朝碑刻上的篆书极为接近，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如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额^[4]（图28）、东魏《元珽墓志铭》志盖^[5]（图29）。《元珽墓志铭》志盖上的“之”字与“陇东太守章”（图30）的“东”字盘曲处笔画一致。

南北朝官印文字中均有起笔较平方，收尾处较尖，笔画由粗变细的笔画存在，有一种“钉头鼠尾”的感觉，不



◎ 图 11 宁朔将军章 南朝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第 573 页



◎ 图 12 宁朔将军章 北朝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第 573 页



◎ 图 13 建威司马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397 页



◎ 图 14 长宁令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00 页



◎ 图 15 南昌男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09 页



◎ 图 16 巴陵子相之印
《中国玺印篆刻通史》第 175 页



◎ 图 17 材官将军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394 页



◎ 图 18 庐陵太守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397 页



◎ 图 19 镇北将军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393 页



◎ 图 20 安西将军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18 页



◎ 图 21 常山太守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1 页



◎ 图 22 威烈将军印
《中国玺印篆刻通史》第 170 页



◎ 图 23 冠军将军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18 页



◎ 图 24 高城侯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4 页



◎ 图 25 怀州刺史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1 页



◎ 图 26 安定郡市印
《隋唐官印研究》



◎ 图 27 长安县印
《隋唐官印研究》



◎ 图 28 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额拓片



◎ 图 29 东魏《元环墓志铭》志盖拓片



◎ 图 30 陇东太守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2 页

仅笔画之内，笔画之间也有明显的粗细、深浅之别。转折多为方折，有些转折处笔画之间并不相连，产生间断，南朝这种现象较多。如《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所录南朝“建威司马”“长宁令印”“南昌男章”（图 13—图 15）、“镇北将军章”（图 19），北朝“常山太守章”（图 21）、“乡郡太守章”“西安令印”“白马子章”（图 31—图 33），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南朝“巴陵子相之印”（图 16）、北朝“威烈将军印”（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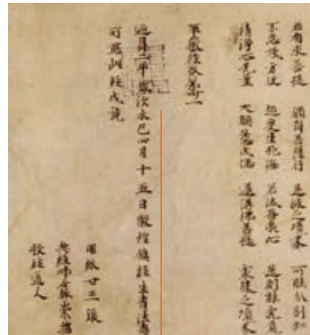
用泥封封护文书，不仅为了密封保护，同时也是一种凭信，其清晰程度尤为重要。而由上述举例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阴文官印笔画之内、笔画之间都有明显的粗细、

深浅区别，这样如果用于封泥上的话可能会存在笔画深处突起较多，比较清晰，笔画浅处突起较少，比较模糊的情况。试着对比其钤在纸上和打在泥上效果，这种特点的文字在泥上表现得十分不明显。

北魏已经出现阳文私印的钤印痕迹，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北魏延昌二年曹法寿书《华严经卷》上钤有一枚阳文墨印（图 34）。北朝晚期出现了阳文官印，如北周晚期的“天元皇太后玺”（图 35）、“卫国公印”（图 36），以及最近被进一步考释的北周“左司武印”^[6]（图 37），都说明了此时官印已经不再使用于封泥上，先秦以来玺印抑于封泥的用印方式已经逐渐衰落。



◎ 图 31 乡郡太守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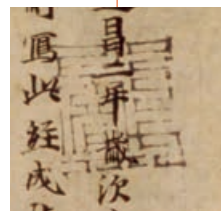
◎ 图 34 《华严经卷》钤阳文墨印



◎ 图 32 西安令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6 页



◎ 图 33 白马子章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 424 页



◎ 图 35 天元皇太后玺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第 584 页



◎ 图 36 卫国公印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第 584 页



◎ 图 37 左司武印
《隋唐官印研究》

【注释】

- [1]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 页。
- [2] 孙慰祖：《钤朱时代与官印改制》，《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下，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版。
- [3] 孙慰祖：《中国玺印篆刻通史》，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版。
- [4] 董其高：《平城第一碑〈皇帝南巡之碑〉》，《大同日报》2017 年 9 月 24 日，A3 版。
- [5] 东魏天平二年（535）刻，1917 年出土于洛阳城北，民国时期曾归武进陶湘（字涉园）藏石并拓。
- [6] 朱棒：《读“左司武印”札记》。

【参考文献】

- [1]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 [2] 小鹿：《古代玺印》，中国书店 1998 年版。
- [3] 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 [4] 孙慰祖：《隋唐官印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 年版。
- [5] 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
- [6] 王玉青、傅春喜：《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 [7] 马骥：《新出新莽封泥选》，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简介】

杨逸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硕士。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研究

文 / 张书慧

一、引言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图1）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封泥整体近正方形，白石灰质地，总长10厘米，宽9.5厘米，厚1.9厘米，重154.6克。边缘整齐光滑，从中间裂成两段，缺右下角，表面有污迹和磨损，开裂处存在磨损和缺失。正面钤印“褒州都督府之印”，印文纵6.5厘米，横5.5厘米。墨书小楷七行（详见后文），背面以开裂处为中心，有纵横共两道绳结痕，整体有压印的竹条纹。

此封泥1924年由罗振玉购藏，罗振玉为保存封泥特别制作囊匣，并在囊匣盖上书写名称及题记，名为“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

1925年，罗振玉写有《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摹本跋》^[1]一文，详述封泥收购经过、并对封泥进行了摹写，释读印文和题记文字，考证年代及功用，认为年代是唐开元二十年（732），提出“此封泥以封供进物”的说法。

1928年，罗福颐《待时轩传古别录》影印出版，收录了罗福颐摹的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摹本，著录名称为“梁州刺史进蒜封泥（白垩土墨书朱印，上虞罗氏藏）”。此书中收录了罗振玉写的关于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附说，纠正了封泥收购的经过，并指出“白垩易损，乃时经千祀，文字不灭，至可珍贵”。另外，罗振玉向周季木^[2]借其所藏唐硤州之印封泥^[3]，由罗福颐摹录，并将之附于梁州都督封泥之后。

1935年，罗振玉辑《贞松堂吉金图》出版，著录有罗福颐拍摄的此封泥照片和摹绘的摹本，著录名称为“唐梁州进蒜封泥”。



◎图1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 辽宁省博物馆藏

1981年，罗福颐著《古玺印概论》中收录了此封泥的摹本“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并结合1957年唐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封泥^[4]进一步说明唐代封泥的功用。2005年《古玺印考略》与《古玺印概论》基本相同。

1985年，王献唐著《五灯精舍印话》著录：“上虞罗叔蕴，藏唐梁州都督府进蒜封泥。”将之与唐硤州之印封泥并论，认为这两件封泥“谓为封泥遗制则可，非所论于秦汉简牍之泥封也”。

1994年，孙慰祖编《古封泥集成》第三卷“唐封泥·官印封泥”，收录了此封泥的摹本，著录名称为“褒州都督府之印”。

2004年，刘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题为《唐“襄州都督府之印”“硤州之印”封泥考》的文章，对“襄州都督府之印”“硤州之印”封泥分别进行了考释，并提出“襄州都督府之印”封泥对“唐代进贡时的签署制度、唐代国库验收制度及唐代文书制度的研究均具有一定意义”。

2015年，孙慰祖《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与表现》一文中使用了此封泥的照片，并认为“襄州都督府之印”（即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是“隋唐时期在一些范围内还保留着抑用封泥的方法”实证之一。

本文从罗振玉与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关系入手，分析罗振玉对于此封泥的研究，结合唐长安大明宫出土封泥及以往研究成果，分析唐代封泥存在的特殊含义及显现的时代特征。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是印证唐史记载的物证，是反映唐早期官制、土贡的资料。这种形式的封泥也反映出与汉魏封泥的区别，体现出官印制度的演变。封泥上的墨书与唐代公文行文方式有关，也是唐代书法的重要资料。

二、罗振玉与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曾经罗振玉收藏，关于此封泥罗振玉有三段文字，分别为题在封泥囊匣盖上的题记、1925年《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摹本跋》一文和1928年《待时轩传古别录》的附说。

（一）囊匣盖题记（图2）

隶书题名：唐梁州都督府进蒜封泥

行书款识：甲子秋洛阳出土，九月朔归雪堂。上虞罗振玉记于津沽寓居之声砚斋。

铃印：玉简斋（白文长方印）

这一封泥与常见的汉魏封泥形制完全不同，罗振玉是根据封泥上墨书内容并查证史料，将之定为封泥，并结合功用将之命名为“唐梁州都督府进蒜封泥”。匣盖的题记是民国甲子年（1924）罗振玉书写于津沽寓居，题记写此封泥为洛阳出土，九月朔（农历九月初一）归罗振玉，查《永丰乡人行年录》，未见1924年9月前后罗振玉至洛阳的记载，罗氏素于古董商人交往，此封泥或为古董商人送至天津罗振玉寓所出售。

（二）《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摹本跋》

此泥得之洛阳贾人，云出关中。以白垩土为之，

方广建初四寸，厚约八分，上有墨书小楷七行。其文曰：

“梁州都督府，（一行）

供进蒜壹□□□拾伍，（二行）

宣德郎行仓□□参事军臣□瞰，（三行）

朝议郎守□□□臣沈□，（四行）

朝请大夫守□□□上柱国臣沈宇，（五行）

朝散大夫守别驾护军臣杨胤直，（六行）

□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七行）”

上铃朱印，其文曰“襄州都督府之印”，而不作梁州都督府。考《唐书·地理志》山南道梁州：隋，汉川郡。武德元年，改为梁州。开元十三年，以梁凉声相近，更名襄州。二十年，复名梁州。天宝元年，改汉中郡。乾元元年，复为梁州。此封泥虽无年月，然可知为当开元二十年由襄州复改梁州之时，州名已复旧，而印仍是襄州，未易新印也。传世封泥多汉两京物，乃以封书函者，唐人书函状不可知，亦不知尚用泥封否，此封泥以封供进物，前人所未见。既手摹其文，详记其款式，并识语于后。惜出土时中裂，损去中间数字，为可憾耳。乙丑祀灶日。

跋文详述封泥来源、形制，并释读其上的墨笔楷书题记和所铃朱文官印，罗振玉通过考证史料得出此封泥为唐



◎ 图2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囊匣盖罗振玉题记

开元二十年（732）物，用以封供进物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与匣盖题记不同，此跋中记载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为关中出土，得之洛阳贾人，而非洛阳出土。

（三）《待时轩传古别录》唐梁州进蒜封泥附说

唐封泥得之洛估，出关中，以白垩土为之，方广建初尺四寸，厚约八分，上墨书七行，验其文乃梁州都督府进蒜封器物也，上钤褒州都督府之印朱印七字，考《唐书·地理志》：山南道梁州，隋汉川郡，武德元年改为梁州，开元十三年以梁、凉声相近，更名褒州，廿年复命梁州，天宝元年改汉中郡，乾元元年复

为梁州。此泥虽无年月，而墨书梁州，印文作褒州，知为开元廿年由褒州复改梁州之时，州名已复旧而印仍是褒州者，殆新印未颁，故尚用旧印也。传世封泥多汉两京物，乃以封书函者，唐人书函状不知与两京同否，封泥世无传者，此泥以封供进物，白垩易损，乃时经千祀，文字不灭，至可珍贵，惜已中断，致损数字为憾事耳，颀儿既摹其文，为书其后。又硃州刺史封泥，上下已损，其文不完，上钤硃州之印，州字未印出，亦白垩土为之，不知以封何器物者，唐之硃州当今湖北宜昌东湖县境，此泥今藏建德周季木处，颀儿既摹梁州封泥乃并借摹以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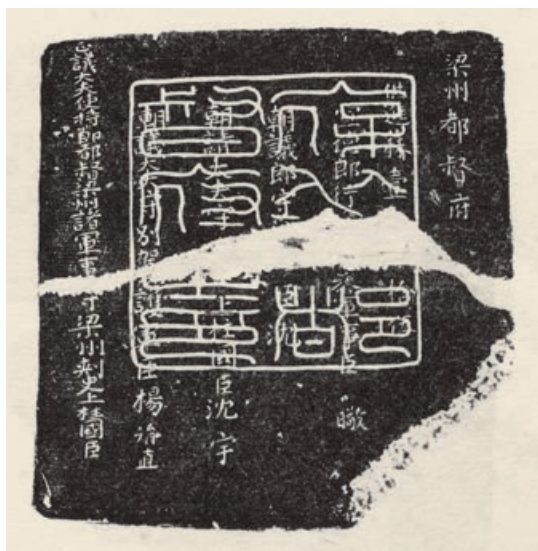
《待时轩传古别录》是辑录罗福颐摹写古物的图录，在此书目录后有罗福颐的一小段序：

古金文有错金银为文不可施毡墨者，家大人病其不能流传，每命以花乳石摹刻，久之得十种已。又得唐封泥墨书朱印，文字暗淡不可影照，复命摹附于末，总得十二种。家大人谓为下真迹一等，各为题识。戊辰冬取付影印，颜之曰《待时轩传古别录》，嗣有所见将续摹之。上虞罗福颐记于津沽嘉乐里寓居。

罗福颐的自序中说明了后来广见著录的唐梁州都督府进蒜封泥摹本（图3）的由来，即“文字暗淡不可影照”，罗振玉“病其不能流传”，乃命罗福颐摹制。

在罗振玉的附说中再次说明，此封泥得之洛阳估人之手，出土于关中，其余内容与前文相似，着重强调此封泥的珍贵难得，“此泥以封供进物，白垩易损，乃时经千祀，文字不灭，至可珍贵”。尤为珍贵的一点是，罗振玉在当时就认识到唐代封泥的珍稀，并借周季木所藏硃州之印封泥摹录附于梁州都督封泥之后。这是这两件传世唐代封泥的首次并称。

此封泥经罗振玉收藏至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至今已有近百年时间，文中记载的封泥形制、状态与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至为难得，这主要是得益于罗氏的细心收藏。关于此封泥的出土地点，罗振玉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24年匣盖题记所说出土于洛阳，一种是1925年的跋文和1928年的附说都说出土于关中。出土于关中的说法在出土于洛阳说之后，并提到两次，两次都有关于此封泥的严谨考证，加之1957年唐长安大明宫遗址有出土形制完全一致的唐代封泥，而洛阳至今未见有唐封泥出土，



◎ 图3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摹本 1928年《待时轩传古别录》



◎ 图4 软侯家丞（带封泥匣）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因此唐梁州都督府进蒜封泥应是出土于关中，罗振玉于1924年9月经洛阳商人手购得。关于封泥的时代，罗振玉考证认为是唐开元二十年（732），其说甚确，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是现存时代明确的最早的唐代封泥。罗振玉关于此封泥使用方式的考证也得到了后来出土的唐长安大明宫封泥的佐证。罗振玉能够将这一与汉魏封泥形制完全不同的封泥确认为唐代封泥并仔细保存，作跋考证，足见其在文物鉴定与历史研究方面的独到眼光和深厚功力。

三、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意义

（一）封泥方式的改变

封泥主要使用时代为战国至汉魏，用以封发竹筒或木札文书（图4），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竹木简书信的往来，封泥随之退出使用范畴。与之相联系的是魏晋至隋唐阳文官印的形成及使用方式“由封泥之制转变为直接蘸色在纸上钤印”^[5]的改变。但同时，“隋唐时期在一些范围内还保留着抑用封泥的方法，字腔较深易使朱文笔画在封泥上清晰映现”^[6]。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形制与战国至汉魏的封泥不同，它不是表面为印鉴阳文的泥块，而是白石灰质地，表面抹光，钤朱红色印文，在印章处有墨书题字。1957年唐大明宫出土过一批封泥，形制与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完全一致（图5—图7），其中“西夹城（紧挨夹城处）出土了几块大型的封泥堆在一起，合对起来是1个完整的坛子形的封泥外壳，在坛口上还覆盖1个青瓷大碗，碗仍粘在封泥内”^[7]。《唐长安大明宫》中说：“根据封泥背面的印痕和所写文字来看，所出的这些封泥都是当时各道、州、府的官员给皇帝进贡方物时，用在贡品包装外面的。”这点可以从唐诗中找到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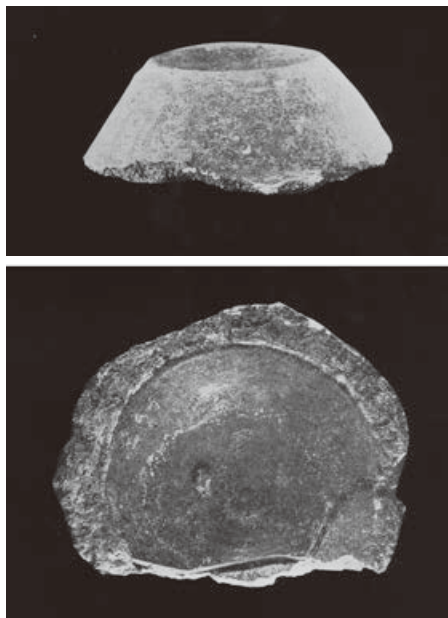
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何况蒙山顾渚茶，白泥赤印走风尘。”顾渚茶是产于顾渚山的紫笋茶。《新唐书·地理志》载：“湖州吴兴郡……土贡……紫笋茶……金沙泉”，“顾山有茶，以供贡”。唐李商隐《为荜阳贡赴桂州在道进贺端午银状》：“谨以前观察使杨汉公封印进上。”顾渚茶为土贡，端午银为四节进献，但无论是贡还是献，在送达皇帝之前都要经过白石灰质封泥的包装，钤道州朱印，“白



◎ 图5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



◎ 图6 唐长安大明宫出土封泥（部分） 国家博物馆藏



◎ 图7 唐长安大明宫出土带瓷碗封泥

泥赤印”是贡献物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8]

“唐代普通使用的包装物有木盒、银瓮、漆匣、竹箱、藤箱、荆筐、麻袋、纸、续、细布、素罗、银瓶等。”^[9]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背面以开裂处为中心有纵横共两道绳结痕，整体有压印的竹条纹（图8），应是以竹制成的箱或筐一类囊匣装贮大蒜后以绳子捆绑，外面再包裹白垩土制成的泥，在绳结处抹平，待干燥后墨书题写进贡州府、进贡物品名称和数量、进贡人的官衔和姓名，再以朱色钤官印。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墨书的进贡州府为梁州都督府，而钤官印为褒州都督府之印，这是罗振玉判断其年代的重要依据，“此封泥虽无年月，然可知为当开元二十年由褒州复改梁州之时，州名已复旧，而印仍是褒州，未易新印也”。梁州曾在唐开元十三年（725）改称褒州，开元二十年（732）复称梁州。州名已复旧而官印未复的现象与唐代官印的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官印至隋唐时期已由官吏个人配系的职官印转化为官署行使职能的官署印，不再由个人配系，唐代官印的铸造、管理，各有专署，铸作官印是中央统一管理，由唐礼部掌给“内外百官铜印”及“鱼符之制”。礼部并有“铸印官”。官印的铸造需要得到奏准。^[10]因此州县改名需要增设新印，由州县上奏获准，再由礼部付给，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形成了“州名已复旧，而印仍是褒州，未易新印也”的现象。

（二）题记文本

梁州都督府，（一行）

供进蒜壹□□□拾伍，（二行）

宣德郎行仓□□参军事臣□噉，（三行）



◎ 图8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背面

朝议郎守□□□臣沈□，（四行）

朝请大夫守□□□上柱国臣沈字，（五行）

朝散大夫守别驾护军臣杨胤直，（六行）

□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七行）

第一行，“府”字之后似有墨迹，但模糊不清。

第二行，在“壹”和“拾”之间有脱字。比对大明官出土封泥，与之相关的有：封泥 1:5，云南安抚使印，第3行“进酒壹瓶□□”；封泥 5:6.1，睦州之印，第1行“进蜜……瓶”；封泥 5:4，润州之印，第1行“进蜜四硕共肆拾瓶盛”；封泥 6:3.1，凤翔府印，第4行“……皮贰拾斤……”。按罗振玉认为脱三个字来看，第二行文字与封泥 5:4 的第1行最像，那么“伍”字之后也应有脱字，此行文字可以推断为“供进蒜壹（量词）（共）（数词）拾伍（包装物）（盛）”。再考虑到也有“进蜜……瓶”“……皮贰拾斤……”这类的行文，那么这段文字可以推断为“供进蒜壹（量词）（数词）拾伍（包装物）（盛）”。

第三行到第七行是梁州都督府的官职人员结衔与姓名。按《新唐书·地理志》，梁州有“户三万七千四百七十”^[11]。按《通典》：“至开元十八年三月敕，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汉二万户为下州。”梁州为中州。按《唐六典》，作为中州的梁州府官员设置如表1。

表1 唐代梁州府官员设置

职官	人数	品阶
刺史	1	正四品上
别驾	1	正五品下
长史	1	正六品上
司马	1	正六品下
录事参军事	1	正八品上
录事	1	从九品下
司功参军事	1	正八品下
司仓参军事	1	正八品下
司户参军事	1	正八品下
司兵参军事	1	正八品下
司法参军事	1	正八品下
参军事	3	正九品下

根据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统计，唐贞观二十三年（649）有都督府47个，管州280；开元二十九年（741），都督府48个，管州327。^[12]根据《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大都督府注：“贞观中，始改上、中、下都督府。”按《唐六典》，户满二万以上，四万以下，为中都督府。^[13]另据《唐会要》：“至开元元年着令：户满二万以上，为中都督府；不满二万，为下都督府。”梁州都督府为中都督府，按《唐六典》，作为中都督府的梁州都督府官员设置如表2。

表2 唐代梁州都督府官员设置

职官	人数	品阶
都督	1	正三品
别驾	1	正四品下
长史	1	正五品上
司马	1	正五品下
录事参军事	1	正七品下
录事	2	从九品上
功曹参军事	1	从七品上
仓曹参军事	1	从七品上
户曹参军事	1	从七品上
兵曹参军事	2	从七品上
法曹参军事	1	从七品上
士曹参军事	1	从七品上
参军事	4	从八品上

可以看出，唐代都督府与州政府职官名称基本一致，只在各参军的称谓上有所区别，即：“在府为曹，在州为司。府曰功曹、仓曹，州曰司功、司仓。”^[14]因此第三行以“仓”字开头，以“参军事”结尾，应该是参军在都督府的称谓，应为“仓曹参军事”，原罗振玉释文认为“仓”与“参军事”中间缺两字误。第三行释文应为：宣德郎行仓曹参军事臣口噉。

第三行“仓曹参军事”结合已经识出的第六行“别驾”、第七行“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可知从第三行到第七行官职品阶由低到高排序，因此第四、五行的品阶应该在别驾之下，仓曹参军事之上，长史、司马、录

事参军都在此范围。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第四行“朝议郎守□□□臣沈□”、第五行“朝请大夫守□□□、上柱国臣沈字”。按《通典·职官一》：“凡正官，皆称行、守，其阶高而官卑者称行，阶卑而官高者称守，阶官同者，并无行、守字。”按《旧唐书·志第二十二·职官一》：“朝请大夫为从五品上……正第六品上阶……朝议郎，文散官。”作为中都督府的梁州，录事参军事正七品下，符合“阶卑而官高者称守”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正五品上的长史、正五品下的司马，并且第五行官职品阶应该较第四行高，所以第四行释文为：朝议郎守司马臣沈□；第五行释文为：朝请大夫守长史上柱国臣沈字。

第六行释文：朝散大夫守别驾护军臣杨胤直。

第七行，□议大夫（图9），查《通典》知，唐代设有正议大夫、通议大夫两种称谓里含“议大夫”的文散官。^[15]从残存的墨迹上看，第七行首字应为“正”（图10），而非“通”（图11）。第七行最末梁州刺史姓名之后仍然有



◎ 图9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局部“□议大夫”



智永《真草千字文》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 图10 隋唐时期书法作品里的“正”字



柳公权《玄秘塔碑》



颜真卿《颜勤礼碑》

◎ 图11 隋唐时期书法作品里的“通”字

模糊字迹存在，可能不止一字，所以第七行释文应为：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 []。

综上，题记文本应该是：

梁州都督府， [] (一行)
 供进蒜壹(量词)(数词)拾伍(包装物)(盛)，
 (二行)
 宣德郎行仓曹参军事臣 [] 暉， (三行)
 朝议郎守司马臣沈 []， (四行)
 朝请大夫守长史上柱国臣沈宇， (五行)
 朝散大夫守别驾护军臣杨胤直， (六行)
 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
 国臣 [] (七行)

关于梁州刺史，查《唐刺史考全编》及各家订补，知唐开元十八年(730)梁州刺史为韩朝宗^[16]，开元十三年(725)至二十年(732)为韦令仪^[17]，开元十三年(725)至二十年(732)王英^[18]也曾任襄州刺史，从文字写法上来看皆与此封泥所录刺史名字(图12)不符，由此可知，唐开元二十年的梁州刺史是为此封泥所录者，可补史料所缺。

(三) 题记反映出来的问题

唐代由地方向中央进贡方物时，是需要附有文书的^[19]，出土的敦煌文书P.2803背《唐天宝九载(750)八月——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十六件》第三件就是一例。另外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喀拉和卓墓葬区发掘的唐代庸调布上，就有墨书题款，并钤有州县、库司印鉴。另有一绢(72TAM227:4)上钤有“益州都督府之印”。^[20]



◎ 图12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局部 刺史名字

百姓所纳庸调物经里正收集中于县，由县尉或专知官检查，将所纳布帛性质、地区、年月、数量、纳物者姓名等题于所纳物上，由县司钤印，然后统一送州。州不再于每件布帛上一一钤印，而是将其裹束好，或留州，或起输。起输者在为首的裹束上题州县名称，有的也题起输时间，并钤上州县之印……^[21]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的题记文字与这类文书性质相似的，写明贡献州府、贡物数量，及相关人员，并钤官印。

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是唐开元二十年(732)梁州向中央进贡蒜时，用以封禁贡品包装的，这七行墨书题记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唐代采购制度

唐代地方政府的赋税征收，由地方长官负总责，由佐官协理，由仓曹、司仓参军具体实施。^[22]按《唐六典》，各府、州，由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廩、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所以题记的第三行“仓曹参军事”是负责此次蒜的采购征收的实施人。

别驾、长史、司马是唐代州府佐吏，更是上佐。按《唐六典》，别驾、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可见别驾、长史、司马是主要的僚佐，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代替府、州长官主政。^[23]第四、第五行为此次贡蒜的辅佐。

唐代都督府的治所设置在某所属州，这个州便称为都督府治所州。并且都督一般兼任州刺史。^[24]所以“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 []”，梁州是梁州都督府治所州，“上柱国臣 []”既是梁州都督府的都督，又是梁州的刺史，他是这次贡进蒜的总负责人。

《通典·职官十五》：“录事参军掌付事钩稽，省署钞目，纠弹部内非违，监印、给纸笔之事。”《唐六典》：“司录、录事参军掌付事钩稽，省署钞目。纠正非违，监守符印。”负责保管官印的应该是梁州都督府的录事参军，同时录事参军是唐代地方的勾官，负责监察工作，地方税赋征收或者购买物资，首先要由勾官进行内部审计。^[25]并对征收、购买行为及最后缴纳进行监察。唐代建立的完善的勾检制度，作为唐代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唐代行政机构高效运转、中央决策合理化和科学化、纠核行政失误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6]所以，此次贡蒜行为应该还有录事参军的参与和监督。

2. 唐代文散官制度

题记行文中官职结衔均见“行、守”字样，如“宣德郎行仓曹参军事臣口噉”“朝议郎守录事参军事臣沈口”。题记所指的是梁州都督府官员。梁州都督府属中都督府，按《新唐书·志第三十九·百官四下》，中都督府设有“都督一人，正三品；别驾一人，正四品下；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下；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田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土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上”。按《旧唐书·志第二十二·职官一》：“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朝请大夫为从五品上，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正第六品上阶……朝议郎，文散官。正第七品下阶……宣德郎，文散官。”其中梁州都督府都督兼任梁州刺史，按《新唐书》，梁州有户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为中州，设刺史一人，正四品上。

《旧唐书·职官志》：“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即当官员所任职事官高于所带散官时以“守”字表示，职事官低于散官时以“行”字表示。唐代文散官以门荫结阶品，然后依劳（考）进叙。文散官无具体职事，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题记中“宣德郎行仓曹参军事臣口噉”，仓曹参军事是职事官，从七品上，宣德郎是散官，正七品下，职事官低于散官，以“行”字表示。“朝议郎守司马臣沈口”，司马是职事官，正五品下，朝议郎是散官，正六品上，职事官高于散官，以“守”字表示。“朝请大夫守长史上柱国臣沈字”，长史是职事官，正五品上，朝请大夫是散官，从五品下，职事官高于散官，以“守”字表示。“朝散大夫守别驾护军臣杨胤直”，别驾是职事官，正四品下，朝散大夫是散官从五品下，职事官高于散官，以“守”字表示。“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口噉”，都督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都是职事官，都督为正三品，刺史为正四品上，正议大夫是散官，正四品上，按《通典·职官一》：“凡正官，皆称行、守……阶官同者，并无行、守字。”而此处用“守”字，说明是以梁州都督为主职事品。

3. 唐代勋官制度

题记中的结衔除去散官和职事官外还涉及勋官，如

“朝请大夫守长史上柱国臣沈字”“朝散大夫守别驾护军臣杨胤直”和“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口噉”中“上柱国”和“护军”都是勋官。按《旧唐书·职官志》：“从第三品，护军。勋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长史、司马，九年省也。”“上柱国。勋官。《武德令》有尚书令，龙朔二年省。自是正第二品无职事官。”

《唐六典·尚书兵部》：“勋获之等级，谓军士战功之等级。”对照李德裕《请准兵部式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27]，知此实为军功格，亦可谓之勋格，兵部据之以酬勋，包括授予勋级、加阶、放选三个方面。

唐代勋官本为酬军功，主要是酬战功和征镇之劳。唐高宗、武后以降，勋官多出于兵卒。唐代勋官的授予，由授予有战功者，到形形色色的泛勋，使得勋官普遍化，造成了勋官自身的卑微化。^[28]

另外，“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守梁州刺史上柱国臣口噉”中，“使持节”是一种虚衔。按《唐会要》：“武德元年六月七日。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刺史加号持节。”

4. 题记格式

据《唐六典》载：上行文书用牒，“牒式”的格式与“关式”相同，即发文单位、标题（即事由）、正文，末尾用语为“故牒”，然后是时间、署名和收文单位。此题记也是属于上行文书类，与敦煌文书 P.2803 背《唐天宝九载（750）八月——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十六件》很相近，第四行为“牒件状如前，谨牒”。此题记第一行为发文单位：梁州都督府；第二行为标题，即事由：供进蒜；其后紧接着发文机关。

5. 反映唐早期贡献现象的重要资料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是梁州向中央政府进贡蒜，封贮在贡物囊匣外面的封泥。

土贡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长期存在，关于唐代梁州土贡的记载有《唐六典·尚书户部》《通典·食货六》和《新唐书·志第三十·地理四》。按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分析，《唐六典》所载的开元贡乃开元二十五年贡，《通典》所载的土贡是天宝中贡，《新唐书》所载的土贡应是长庆贡。^[29]

表3 唐代梁州土贡资料

出处	土贡内容	年代
《唐六典·尚书户部》	厥贡燕支、红花	开元二十五年贡 (737年)
《通典·食货六》	贡红花百斤, 燕脂一升	天宝中贡 (742—756年)
《新唐书·志第三十·地理四》	土贡: 麩、蜡、红蓝、燕脂、夏蒜、冬笋、糟瓜、柑、枇杷、茶	长庆贡 (821—824年)

如表3所示,在唐长庆年间梁州的土贡中有“夏蒜”,而开元二十五年及天宝中未见梁州土贡有蒜。

“夏蒜”与“蒜”不同,如《唐六典》在食料和开元二十五年屯田令都提到了“蒜”^[30],《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有“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之裔。有稻、麦……蒜、桃、李”,这说明在唐代“蒜”和“夏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按王赛时《唐代饮食》^[31]记:“唐代食用的蒜主要是大蒜,这种大蒜自汉代以后引入我国,被广泛利用,传统的小蒜则逐渐趋于次要地位。”封泥的墨书题字为“供进蒜壹□□拾伍”,此处的“蒜”应为大蒜,《新唐书》记述的“夏蒜”则是小蒜^[32],两者不同。

此封泥所贡之蒜与《唐六典》所载之开元二十五年贡种类不符,反映不出赋役令中的“任土所出”精神,原因可能是唐前期赋役资料复杂,“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的土贡情况比较混乱,没有体现赋役令中“任土所出”的精神,贡品也不完备……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才有记载完备的土贡资料”^[33]。更可能是,蒜这种贡献物在唐文献中称为“口味”^[34],“更多的应属于进和献”^[35],反映的是唐前期“口味贡献”的特色。

四、结语

罗振玉与辽宁省博物馆渊源颇深,辽宁省博物馆现藏的书画、甲骨、封泥、铜器、碑志等均有罗振玉旧藏。罗振玉与辽宁省博物馆的文物互动记载有3次:(一)1934年,捐赠的历代明器116件;^[36](二)1935年,捐赠的

铜器数百件;^[37](三)1940年3月24日至4月14日,罗振玉所藏敦煌出土古文书特别展览。^[38]与一般的金石学家不同,罗振玉认为隋唐官印“为当世之所忽,而可考证史志裨益至宏,不殊六朝以前诸印”^[39],并注意到唐印印迹的意义——唐代官印存世数量有限,各类印迹是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参证。1916年罗氏辑成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首先摹录了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三件唐代文书上所钤的官印”^[40]。作为清末民国时期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对于封泥的史料价值早有认知,在《陆庵斋古录·郑庵所藏封泥》序中归纳封泥文字的意义在于“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禘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梁州都督进蒜封泥作为唐代官印遗迹、唐代封泥遗物,首先得到了罗振玉的重视。当时尚未有其他唐代封泥出现,罗振玉在仔细甄别印文痕迹和墨书的基础上,提出此封泥是唐开元二十年(732)梁州“封供进物”所用,并在1957年唐长安大明宫封泥出土之后得以证实。

唐梁州都督进蒜封泥体现着唐代官印制度的特色,题记文字是唐代官制、土贡制度的重要资料,它是研究唐史的重要物证,意义非凡。此封泥经罗振玉收藏、鉴定、研究、著录,并最终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唐开元二十年距今约一千四百年,1924年距今约一百年。距今一千四百年的唐代封泥流传至今,得益于距今一百年的罗振玉的悉心珍藏,才能“白垩易损,乃时经千祀,文字不灭,至可珍贵”。

【注释】

[1] 罗振玉:《松翁近稿》,1925年。

[2] 周进(1893—1937),字季木,室名居贞草堂。安徽至德人。清两江总督周馥之孙,著名收藏家,著有《季木藏印》《贞居草堂汉石影》等。

[3] “唐硃州之印”封泥最早见著于周明泰辑《续封泥考略》,周明泰是周季木的从弟,继承了周季木的封泥旧藏,1938年依照《封泥考略》体例编成《续封泥考略》。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47页。在上述东房遗址西侧的扰坑填土中及西夹城内的

灰坑里，出土很多封泥。在交通沟的填土内也出有封泥，当是挖沟时翻上来的。封泥共出土 160 余块（有印文或墨字的），其中印文完整的仅 2 件，余均残缺不全。所出的封泥与一般封泥不同，全是白石灰质的。其用途也与常见的汉代封泥不同，从封泥背面的印痕来看，大都有清楚的篚笥印文，有的则是封闭瓶子（坛子）用的，瓶口（或坛口）及包扎瓶口的布纹绳结的印痕等都还保存得非常清楚。

[5] 孙慰祖：《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东方艺术》2015 年第 4 期。

[6] 同上。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2—47 页。

[8] 李锦绣：《唐长安大明宫西夹城内出土封泥研究——兼论唐后期的口味贡》，《中华文史论丛》第 5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14—137 页。

[9] 文媛媛：《唐代土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

[10] “《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记：建中三年（七八二）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新唐书·宗室传》记：王定远‘自以有劳于《李》说，颇横恣，请别赐印’，得到允准；又《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八三七），‘吏部奏长定选格，请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别置印一面，以“新置南曹之印为文”，从之’。”同 [5]。

[11] 《新唐书·地理志》：兴元府汉中郡，赤。本梁州汉川郡，开元十三年以梁、凉声相近，更名褒州，二十年复曰梁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兴元元年为府。土贡：穀、蜡、红蓝、燕脂、夏蒜、冬笋、糟瓜、柑、枇杷、茶。户三万七千四百七十，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七。县五：有府一，曰丽水。

[12] 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51 页。

[13] 《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大都督府注（若中、下都督府户满四万以上者，官员同此，唯减司马一人），中都督府注（下都督府户满二万以上者，官员亦准此）。

[14] 《通典·职官十五》，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注。

[15] 《通典·职官十六》，正议大夫、通议大夫，皆隋置散官，盖取秦大夫掌论议之义。大唐并因之。

[1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二〇五“梁州”，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7] 黄楼：《唐刺史考全编订补——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吐鲁番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

[18] 毛阳光：《唐刺史考全编新补订》，“9. 关内道卷一九盐州（五原郡）王英开元中”，《文献》2006 年第 1 期。

[19] 吕岩：《唐朝政府物资购买研究》，“政府购买物资的交纳要行文书”，山东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31 页。

[20] 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中国唐史研究会《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1]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6—117 页。

[22] 吕岩：《唐朝政府物资购买研究》，山东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

[23]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大都督府，由长史主政，长史为当时实际长官，从三品。”汪家华：《唐代长史述考——以唐代典籍和墓志

文献为基本》，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

[24] “都督府设置于地方，必然要与州发生一定的关系。唐代都督府的治所设置方式与州治所的设置方式相同，州的治所是设置于某个所属县，而都督府的治所则是设置于某个所属州，这个州便称为都督府治所州。治所州石都督府政府所在地，是领导属州实物，形式各项权力的核心所在。唐代都督府与治所州政府的关系集中体现在都督一般兼任都督府治州的刺史，这种兼任关系来源于都督府的前身总管府与治所州的关系。”夏炎：《试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关系》，《史学集刊》2008 年第 2 期。

[25] 同 [22]。

[26] 李志刚：《唐代勾检制度研究》，扬州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27] 傅璇琮、周建国笺校：《李德裕文集校笺》卷 16，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4—306 页。

[28] 马志立：《唐代勋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

[29] 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4 期。

[30] 《唐六典·尚书礼部》：凡亲王已下常食料各有差。（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葱、韭、豉、蒜、姜、椒之类各有差……）《唐六典·尚书工部》：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营稻一顷，料单功九百四十八日……蒜，七百二十日……）

[31] 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出版社 2003 年版。

[32] 小蒜，百合科植物小根蒜的全株，又名山蒜、野蒜、夏蒜、荤菜等。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夏、秋季采收。

[33] 同 [29]。

[34] “我们可知唐‘口味’一词指可以入口的粮、果、肉、药等一切食物。”同 [8]，第 114—137 页。

[35] 同 [8]，第 114—137 页。

[36] “奉天分馆所藏历代明器，十之九为先恭敏公所捐赠……”罗福颐：《奉天分馆藏历代明器录》，《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第 17 号，1942 年。

[37] 《盛京时报》1935 年 5 月 31 日。

[38] 赵晓华：《旧事摭存——伪满国立博物馆与国民党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古物馆史事纪略》，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十年纪事》，辽海文物学刊编辑部 1989 年版。

[39] 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序》，1916 年。

[40] 同 [5]。

【作者简介】

张书慧：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现任职于辽宁省博物馆，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玺印。

徐州博物馆展厅新见土山汉墓出土封泥述要

文 / 吕健

一、土山汉墓发掘简况

土山汉墓位于徐州市区，现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内，北距明清时期的徐州城南门500米（一里）许，故《铜山县志》《徐州府志》等地方史料多称其在“城南里许”，所指即徐州故城。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该墓被长期认定为“亚父冢”^[1]，即秦末项羽集团的谋士、居巢人范增之墓。1969年，土山汉墓封土堆附近的居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砖室墓（M1）。次年南京博物院组织进行发掘工作，出土了包括银缕玉衣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由此明确了土山汉墓应为东汉时期的高等级墓葬。^[2]1977年，徐州博物馆通过调查发现土山封土的中心位置存在另一座大型墓葬（M2）^[3]，随后持续开展相关工作，截至目前，M2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其间墓葬封土内、墓室顶部、盗洞等位置出土了大量遗物，可借此明确土山汉墓系东汉时期某代彭城王家族墓地。

土山汉墓封土略呈圆形，底径约200米，2004年发掘M2时的高度约为18.2米，系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0.2—0.4米不等。该墓封土包含物丰富，具体可以分为封泥，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以及残碎陶器、刻文陶片、钱币（含蚁鼻钱、榆荚半两、五铢、货泉大布黄千等新莽钱币）几大大类，另有极少量木牍、钱范等遗物出土。

毫无疑问，封泥是土山汉墓封土中最具特色的遗存。早在1977年，已有人在封土中捡得“彭城右尉”封泥一方；1982年，徐州博物馆在土山汉墓封土内清理出封泥22

方。^[4]当时土山位于徐州博物馆北侧围墙外，封土周边散布十余家居民，博物馆对封土的保护很难做到全方位覆盖。因此，当时的封土还存在被附近居民取土使用的现象。同时，封泥的出土也吸引了不少爱好者前来“寻宝”，鉴于土山封土内封泥数量颇多，遂出现夏天雨季有爱好者撑伞捡拾封泥的“奇观”，这也是土山封泥有小部分流入市场的原因。2004年，在徐州博物馆时任馆长李银德先生的主导下，土山M2的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随后组织了考古队开展工作。鉴于封土内包含物丰富，尤其是有字封泥的出现，考古人员从工作之始就制定了详细的封土发掘方案，即采用“探方法”切开M2上方的封土，10米×10米布方，保留周边封土以待将来复原墓葬之用。对探方内发现的遗物细致甄别保存，记录位置、标高等。这种方法发掘封土比较费时费力，但收获也是明显的，仅封泥一类遗物，就达到4000余枚之多。^[5]目前M2已发掘至墓室，在盗洞等局部填土内依旧有零星的封泥出土。

笔者曾于2007至2008年短暂主持过封土发掘工作，目验过一部分出土品，基本完整者约有1000枚，另有大量残封泥及无字封泥。封泥的时代大多为西汉，也有零星的战国与秦封泥，最晚可至新莽，尚未见到可确定为东汉时期的遗物。据印面文字，这批封泥涵盖西汉楚国官署、县邑乡官、私印及无字封几大大品类，信息量很大，对西汉楚国历史的研究极具意义。因相关的保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迄今未见发掘者公布过资料，仅有李银德先生的两篇文章涉及。^[6]2018年，徐州博物馆启动了展厅提升改造工

程，一楼新增通史展厅，秦汉时期的“重头戏”就是土山汉墓出土封泥陈列，展陈数量约 400 余方。2019 年 4 月 28 日，徐州博物馆新展厅全面开放，笔者参与部分封泥文字的释读与布展工作，有鉴于这批资料的丰富性及学术性，现将已经面向观众的封泥作一简要介绍。

二、土山汉墓出土封泥概述

土山所出封泥，李银德先生先后刊布二文做了介绍。此外，杨广泰先生于 2010 年编辑出版的《新出封泥汇编》^[7]，公布了源自土山汉墓封土的封泥 30 种 72 件。对于这批封泥，诸家多有考订、讨论，笔者不再赘述，仅将其分作楚王国、县邑、乡官、私印及无字封泥诸类，以表格形式列出。（表 1、表 2）

对照以上二表，暂不考虑印文重复的因素，可以明确：现已发表的土山汉墓封土所出封泥种类较多，基本涵盖了西汉楚国中央官署、楚国辖县、乡官及私印等内容，此外还有少量其他郡国属县等。具体来说，属于楚王国行政系统的职官有 34 种，包括内史、御史、中尉、卫士、奉常属

官、郎官，乃至管理楚王薨后陵园的职官，王国的重要职位中唯独未见丞相的印信；县邑类 39 种^[19]，大多数属楚王元初封时三郡三十六县范畴，另有少量如新丰、东阳等其他郡国县邑官印；乡官印 18 种，考虑到出土地点，推测这些乡多为楚国内史（彭城郡）下辖诸县之乡名；私印 10 种，可能为楚国内史省掾属所用之印^[20]；此外尚有无字封泥若干。这是目前能够得出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据仅指种类，不包括具体数量，因为很多种类封泥都有大量重复出现者，如“彭城丞印”“东乡”“南乡”等。

以上述及的封泥绝大多数已在徐州博物馆新增通史展厅陈列，可供相关研究者及爱好者近距离观摩。下文将挑选出小部分此前未曾公布者予以介绍，随后谈谈笔者对土山汉墓封土所出封泥的几点认识。

三、新见封泥介绍

（一）西汉楚国行政系统职官

新见者计有“楚祝长印”“楚御府长”“楚永巷

表 1 杨广泰先生《新出封泥汇编》公布种类

分类	楚王国系统	县邑职官	乡官	私印
释文	楚内史印、内史省印、楚内史印 ^[8] 、楚食官丞、楚中厩印、楚官司丞、楚宦者丞、楚内官丞、司空、库印、厩印	彭城丞印、彭城之印、彭城左尉、彭城□丞、吕丞、吕丞之印、符离丞印、万春□□ ^[9] 、萧令之印、薛丞之印、左市 ^[10]	南乡、东乡、浮丘乡印 ^[11] 、广昌乡印、东乡 ^[12] 、北乡之印、相离乡印、中乡	赵达、孔□堂里 ^[13]
合计	11 种	11 种	8 种	2 种

表 2 李银德先生文章公布封泥种类

分类	楚王国系统	县邑职官	乡官	私印	无字
释文	楚内史印、楚□史丞 ^[14] 、内史省印·陈固 ^[15] 、楚中尉印、楚御史丞、楚内官印、楚内官丞、楚宦者长、楚□仆□、楚太宰印、楚大祝印、楚祠祀印、楚后祠祀、楚食官印、楚郎中丞、楚中厩丞、楚官司丞、楚卫士丞、司空之印、中官、少内、楚夷园印、楚文园长、库印、□库、楚□轻□、仓印	彭城丞印、彭城右尉、彭城左尉、彭城狱丞、北平邑印、□平□印 ^[16] 、山桑左尉、承丞之印、僮丞之印、相丞之印、相右丞印、新丰丞印、向丞之印、薪丞之印、薪□之印、下蔡丞印、蒙□之印、薛□之印 ^[17] 、东阳丞印、□县□丞印 ^[18] 、城侯邑印、宛胸邑印、□阳邑丞、□侯（候）□印、万春邑印、穀阳之印、下邳丞印、符离丞印、萧令之印、萧邑之印、萧□□印、传舍、左市	东乡、南乡、北乡、西乡、中乡、东休乡印、□乡之印、适乡、养陵乡印、四乡、大乡、槁乡、峰（？）乡	戴弥私印、公孙青、杜德之印、周阳、朱固、朱明顺印、僮缙、陈奴	馒头、半圆、四分之一圆形等多种多枚
合计	27 种	33 种	13 种	8 种	3 类



◎ 图 1 楚祝长印



◎ 图 2 楚大祝印



◎ 图 3 楚御府长



◎ 图 4 楚永巷长



◎ 图 5 楚中厩丞

长”“楚中厩丞”“楚后中傅(?)”“楚太史口”“楚史长印”“楚元园印”等多枚。

1. 楚祝长印(图1)

泥色微红较细腻,上部略残,但印文清晰可辨,泥略呈圆形,泥背有较宽的检痕。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文简称《百官表》),太祝为奉常属官,有令丞,汉景帝时更名“奉常”为“太常”。^[21]诸侯王国奉常属官与汉一致,下设史、祝、医、卜等长丞。此前公布的土山封泥中有1枚“楚大祝印”(图2),此泥径称“祝长”,时代当在景帝“七国之乱”以后。与此相类似者,有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的“山阳祝长”封泥。^[22]

2. 楚御府长(图3)

《百官表》汉御府为少府属官^[23],诸侯王国亦有设置。该泥椭圆形、红褐色,印面四字基本完整,泥侧有绳孔、泥背有横贯的绳纹痕迹。楚国的府库之属,此前在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中还发现过“楚东宫府”铜印。^[24]

3. 楚永巷长(图4)

泥褐色,似经火焚,泥背较平整有一道纵向检痕。该泥完整形状应近圆形,残存三分之二,可辨识为“楚永巷长”四字,“巷”字仅存一点笔画,据印文可补充完整。据《百官表》,“永巷”亦为少府属官,武帝时更名“掖庭”。^[25]狮子山汉墓出土过“楚永巷印”铜印^[26],以“楚永巷”起头的封泥当是首次出现。

4. 楚中厩丞(图5)

此泥虽有文章述及,但未刊布照片或拓片,故在此略作介绍。泥近圆形,红褐色,略残,字口清晰,泥背有一道纵向检痕,绳孔不可见。此前的文章见有“楚中厩印”,仍为楚国依照汉制设立的管理楚王舆马之职,此“丞”为副贰以佐令长。据《百官表》,皇帝所设之厩颇多,根据目前材料,楚国似只发现了“中厩”,但依照职官命名原则,与“中厩”对应的可能还有其余的“厩”。

5. 楚太史口

残一字,泥作圆形,印面上沿留有指纹痕迹,泥背留一道纵向检痕,较宽。比对狮子山汉墓曾经发现的“楚太史印”铜印^[27],阙字当补为“印”字。太史为奉常(太常)属官,无须多言。

6. 楚长史印/楚史长印(图6)

四周都有缺损,泥团扁平、色纯黑,系经过彻底焚烧

所致，类似早年乐浪郡遗址发现的黑色质地封泥，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对此有专论。^[28]“长史”应为楚国丞相之长史，但也不排除都尉府长史一职的可能。^[29]

此外，这件封泥的读序也可能为“楚史长印”，联系上文所述“楚太史印”，笔者推断此泥时代应晚于“太史”之称谓。赵平安先生在论及汉廷与诸侯王国印制之别时曾指出，“王国群卿属官，负责人似只称长”，并举数例说明。^[30]据目前材料看来，此论应属允当。但笔者想说明的是，王国群卿令长称谓似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以“楚太史印”为例，太史为楚国群卿，为区别于汉，“楚”字无疑要占一格，“太史”乃官名故紧随其后，最后一个为“印”字。这是王国职官印章的特征所在，那么，类似的四字官印似乎可理解为“某某令”的省称，为呼应印制而省去了“令”字。到了“楚史长印”的出现，可以明确此时的楚国太史已改称为“长”，不再称“令”了。以上所举是一个明显的可以接续的例证，据此，笔者判断，西汉景帝年间“七国之乱”的平定可能就是诸侯王国群卿称谓变化的一个节点，限于篇幅，此处不便展开，当专文另述。但综合看来，目前所见封泥资料中的确没有明确称为“令”的王国群卿官印，以上是笔者的推断，尚不能轻易否定赵平安先生之说。

7. 楚元园印

残，经缀合后基本完整，“元”及“园”二字笔画稍缺，但不影响释读。泥色淡黄，泥背亦有较宽检痕。此泥无疑为楚元王刘交陵园职官印所钤，“元园”与刘交谥号“元王”正相对应。联系之前已经发现的“楚夷园印”“楚文园长”二泥，西汉楚王陵园名称已发现三处，涵盖前四代楚王。^[31]与皇帝不同，诸侯王陵园即用各王所得谥号命名。

8. 口后口傅（图7）

残，泥色偏红，原泥团应略呈长方形。印面残存的应为第二字与第四字，分别为“后”与“傅”，第一字尚余一点笔画，不好判断原字。联系到“齐中傅印”“楚后祠祀”等泥，笔者推断该泥可能为“楚后中傅”，仅备一说，祈方家指正。

（二）县邑类职官印

所见新品数枚，地名均见于《汉书·地理志》，都属于楚国受封之初的版图之内，故不再一一考证，仅对诸泥

作简要描述。

1. 海邑丞印（图8）

灰色、略近方形，上下两端较平齐，应使用封泥匣缄封，泥背中间有横贯绳纹。

2. 留丞之印（图9）

稍残，泥表面呈灰色，断茬处红色，泥背平整，中间有横贯的绳纹痕迹。



◎ 图6 楚长史印 / 楚史长印



◎ 图7 口后口傅



◎ 图8 海邑丞印



◎ 图9 留丞之印



◎ 图 10 郟丞之印



◎ 图 11 薛丞



◎ 图 12 徐狱□□



◎ 图 13 承丞之印



◎ 图 14 都乡

3. 郟丞之印 (图 10)

泥呈黄褐色，扁平长方形，上下两端平齐，应该使用了封泥匣緘封，印文不甚清晰但文字可辨，郟县为楚东海郡治。

4. 吕左尉印

残，右侧两字仅存部分笔画，但可推知为“吕左”二字。泥灰色，较规整，典型使用了封泥匣所致。

5. 薛丞 (图 11)

半通，泥略呈圆形，灰黑色，泥背平整，留有一道横向的检痕。

6. 徐狱□□ (图 12)

残，从形制推知左半应有二字，可能为“丞印”二字。泥红褐色，泥背留有四道横贯绳痕，尚有绳子的碎屑残留其中。

7. 承丞之印 (图 13)

圆形，红褐色，印面文字清晰，背面有横向绳纹及纵向检痕。

(三) 乡官印

此前公布的材料中多见以方位命名的乡，东西南北中俱全，数量也比较多，有半通、通官印两种，比对印面文字可以发现，这些以方位命名的乡印有时代上的差别，至少应该包括西汉早期及中期两个阶段，而且并非同属一县。本次新展览的封泥中，出现了一小批乡官印，地名与汉代一些县名重叠，但从史料中可知乡名重复者所在多有，不能轻易论断。有一点可作如下推断，即这些乡印大多应属楚国内史属县的辖乡，出于事务的需要，这些乡与楚都内史官署有较多的文书传递，所以才留下了这些封印。下文对这批封泥做一简要介绍。

1. 都乡 (图 14)

系半通印钤于近方形泥团上，中间隆起呈四面坡状，泥背留有二道横贯绳纹。按照汉制，都乡一般为县治所在，史料中的“都乡”比比皆是，此泥不知具体属县。

2. 虹乡 (图 15)

半通，泥圆形，灰色，印文清晰。《汉书·地理志》有虹县，应属楚国内史辖地，此“虹乡”与县邑的关系待考。

3. 四与乡印 (图 16)

残，仅存二分之一强，四字可辨。泥红褐色，泥背有横向草纹及纵向检痕。此泥文字较为特殊，笔者还曾见过



◎ 图 15 虹乡



◎ 图 16 四与乡印



◎ 图 17 四与



护封泥线摹图



◎ 图 18 葢乡



◎ 图 19 东阳乡



◎ 图 20 平乡



◎ 图 21 新昌乡印

另一枚土山所出半通印封泥，名“四与”（图 17），二者当为一地，唯印制有别。“四与”史籍无考，不知属于何县邑。另，笔者曾于本人博士学位论文提到一枚土山所出“护封泥”^[32]，疑其文字即为“四与乡印”。

4. 葢乡（图 18）

半通，红褐色，长方形，泥背平整，使用封泥匣缄封，侧面可见五组横贯且对应的细小圆形绳孔。

5. 东阳乡（图 19）

半通，略残，但“东阳乡”三字较清晰，泥背不甚规则，具体缄封方法未明。

6. 平乡（图 20）

半通，椭圆形，红褐色，泥背可见绳孔及检痕。

7. 新昌乡印（图 21）

圆形，泥色黑，应经过焚烧，泥背有检痕。



◎ 图 22 山阳乡印



◎ 图 23 林宣私印



◎ 图 24 任宣私印



◎ 图 25 宋广私印



◎ 图 26 陈寿



◎ 图 27 蔡佗



◎ 图 28 大尹少内

8. 山阳乡印（图 22）

红褐色泥质，略圆形，泥背有纵向检痕。

（四）私印

印面较小，大多在 1 厘米见方，介绍 5 枚文字较清晰者。

1. 林宣私印（图 23）

残，泥质略黄，该泥特点在于泥块截面类似于“舌形”，当是封于“剖竹”之类的检上，故泥背呈现出圆弧状。

2. 任宣私印（图 24）

褐色，稍残，泥背形态与上述“林宣私印”相同。

3. 宋广私印（图 25）

稍残，红褐色，近方形，泥背平整，纵向木纹纹理清晰可见，当系封于匣中。

4. 陈寿（图 26）

残，褐色。原应为扁平方形泥块，封印钤于正中间，泥背甚平，当附着于木牍上，可见一道横向绳痕。

5. 蔡佗（图 27）

稍残，泥色微黄，泥团圆形，正中钤私印“蔡佗”二字，印文及边框完整，印面平整。

（五）其他

除以上四类外，本次展示的封泥还包括数枚无字者，其形制与之前李银德先生披露者几乎一致，故不再逐个描述。此外，尚有 2 枚较为特殊者，分别为“大尹少内”“牢监”。

1. 大尹少内（图 28）

残，泥色红，长方形，印面从上至下完整保留“大尹少”三字，“内”系据残留一画推知。泥背平整，留有木牍的纵向纹理，泥侧至少还留有四道横贯绳孔。按《汉书·王莽传》，王莽于始建国元年篡汉后，进行了一系列更名，其中“改郡太守曰大尹”^[33]。该泥从形制上看仍属半通形态，按照汉代的习惯，此“少府”应为大尹（太守）征辟的掾属，官秩不高，主管太守府邸财务，因是对内的职守，故未在印章前加郡名，所以也不知所属何郡。

2. 牢监（图 29）

残，红褐色，呈狭长的长方形条状，根据印面文字及隐约可见的边框推测应为半通印，印文为“牢监”二字。泥背中间有一道横向较窄的检痕。关于“牢”，笔者以为应当理解与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相关。《史记·平准书》关于此有如下记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为牢也。盆者，煮盐盆。”[索隐]曰：“苏林云：‘牢，价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颜云苏说是。乐彦云‘牢乃盆名’，其说异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张晏曰：‘若人执仓库之管籥。或曰管，固。’”^[34]综合以上各家注解，可以推断此泥印文“牢监”即应为某处盐官属吏，其职责应为监管官方向民众发放的煮盐器具。

至此，如从品类上统计土山汉墓出土封泥，则可得出最新数字如下：楚国群卿类 41 种、县邑类职官 46 种、乡官印 26 种、私印 15 种以上。私印出土量也不小，本文仅介绍了 5 枚清晰者，加上此前公布者，种类应该至少在 30 枚以上。其他类 2 种，无字封泥未有确切统计数字。

四、几点认识

首先，谈一下这批封泥的出土地点与堆积性质。

土山汉墓可以明确为东汉中南期的诸侯王墓葬，这批封泥均源自墓葬封土而非墓室内，这一特点在迄今的考



◎ 图 29 牢监

古发现中绝无仅有。就封泥的出土单位“封土”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二次堆积，并非原生的灰坑或房址等遗迹单位，而是经人工搬运堆筑而成的。因此，虽然发掘者前期工作细致，但是面对这批次生堆积材料，探方法的分层、分单位未必对将来的整理有益，今后的整理工作仍应依托文字释读与泥背形态进行断代。此外，次生的堆积还牵涉到这批封泥的原生堆积地点问题。笔者曾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35]，此处从略，仅就核心问题阐明观点：根据可见的封泥时代特征及印面反映出的职官种类，笔者认为土山封泥原生的堆积地点最有可能为西汉楚国的丞相官署。

其次，土山封泥的数量与时代。

如前所述，土山汉墓封土中出土的封泥数量达到 4000 余枚，但基本完整者只占约四分之一，总数在 1000 枚左右。本次新展览展示了 400 余枚，又只占基本完整者的一半，未公布者依然值得期待。除去基本完整的，尚有大量残封泥及无字封泥。残封泥无疑也很重要，只鳞片爪的文字都有可能解决重要问题，但在整理过程中，应会有不少缀合的工作需要做；大批量的无字封泥也相当重要，此前较少有对无字封泥的专题研究，土山发现的这批或许能有所突破。

时代方面，从印面文字风格、官制、政区地理方面的信息，加之泥背缄封的形态来看，土山封泥的时代集中在西汉前、中期，另有少量西汉晚期及新莽时期遗物，尚未见到可确定为东汉时期的品类。这一点与这批封泥次生堆积的特征也基本吻合。

再次，土山封泥所反映出的职官特征。

据当前可见的资料，土山封泥遗存中未发现汉廷的朝官封印。此外，除本文提及的“大尹少内”外，尚未见到可明确为西汉时期郡级及所属职官的封印，楚国支郡的名

称均未发现，但相关属县名称却存在。游逸飞先生在讨论这批材料时，曾提出过“汉初楚国无郡”的论断，并指出了大致的时间段。^[36]此可备一说，是否经得住验证还有待于相关资料的发表及讨论，但目前当可谓“无郡”，这也是土山封泥遗存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以上就土山汉墓封泥遗存的特征谈了一点看法，限于笔者的学识、眼界，难免挂一漏万，祈请方家指正。最后还想说明的是，这批资料数量多，时代跨度较大，出土地点明确，是近年来封泥研究领域翘首以盼的重要资料。期待发掘者能够尽快进行整理工作，早日公布较完整的资料，届时对相关研究一定会有推动作用。

【注 释】

- [1] 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6页。
- [2] 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东汉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第15期，1977年9月。
- [3] 李银德：《徐州土山出土封泥考略》，《文物》1994年第11期。
- [4] 同上。
- [5] 笔者于2007至2008年负责过封土发掘工作，当时登记入库的封泥数量即有数百枚，目前零星出土的封泥编号均在4000之后，具体数量仍应以考古队发布的信息为准。
- [6] 同[3]；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 [7] 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 [8] 杨广泰先生所藏二枚“楚内史印”不同文，故归类时分作两种。
- [9] 土山所出“万春”字头封泥有两种，分别为“乡印”“邑印”，阙字不清，暂将其归入县邑类。
- [10] 此“左市”归属楚都彭城县的可能性较大，故将其归入县邑职官类。
- [11] 据拓片，“丘”字无疑，“浮”暂且存疑。
- [12] 据拓片，“东乡”二泥字体不同，不清晰是否前后相续还是属县不同，暂从杨广泰先生分类。
- [13] 拓片不清晰，今从杨广泰先生释读。
- [14] 阙字为“内”或者“御”的可能性较大。
- [15] 一泥钤二印，详见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 [16] 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该泥很可能就是“北平邑印”。
- [17] 疑即“薛丞之印”。
- [18] 此泥当为新莽时期，第一个阙字不清，“丞”字之前应为“徒”字。
- [19] 县邑类职官封泥包括楚国属县及少量其他郡国县邑。
- [20] 土山发现的“楚内史印”“内史省印”数量颇多，私印有时附钤于“内史省”官印之侧，故推断一些私印当为楚国官署掾属之印，可参见张辉、海京：《“内史省印”封泥考》，《印学研究》第12辑，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
- [21]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6页。
- [22]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 [23] 同[21]，第731页。
- [24]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
- [25] 同[21]，第731页。
- [26] 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第8期。
- [27]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 [28] 原田淑人：《封泥の発見とその研究とについて》，原田淑人先生米寿纪念会《东亚古文化说苑》，日本猪瀬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版。
- [29] 笔者原释文为“楚史长印”，“长史”的释读承孙慰祖先生指点。
- [30] 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2页。
- [31] 叛王刘戊作为首逆之一，应无陵园，是否会“置守冢”也不得而知。景帝以刘礼奉元王后，故本文计算到刘礼为楚王时包含前四代王。
- [32] 吕健：《汉代封泥的考古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 [33] 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03页。
- [34]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16页。
- [35] 吕健、杜益华：《土山汉墓出土封泥原生堆积地点及性质探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 [36] 游逸飞：《战国至汉初的郡制变革》，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吕健：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汉代玺印封泥。

横空惊艳之书坛奇珍

——王羲之妻、献之母郗氏墓识

文 / 林乾良

中国“书法”是以文字为基础衍发出来的一门艺术。这在全世界而论是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撰《蜕厂印谱·序》时即断然论定：“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书法自汉朝起，即流传至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日本则称“书道”。余曾两至彼邦讲学，深感单从普及论似微为占先。如今，西方人学书法的也很多。1994年，余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主持“再进会”（类似我国老年大学）书法班一年，市府曾召开大会奖励。法国汉学家 LONG 君，系我的学生，从谐音取汉字名为龙乐恒。他不但会书法，还会篆刻。由于我的介绍，他已加入西泠印社多年，并曾多次捐献艺术品，受到社方表彰。

汉字的特点为非拼音而颇具形象特点的方块字。从比较成熟的最早系统文字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沙师孟海编《中国书法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中，首先收有一些甲骨文。他老人家昔年曾告诉我：甲骨文当然是中国书法开山之作，而许多著名的“贞人”（即刻甲骨者），可视为当时的书法家。早先，论者每称书法必言起于春秋或更晚，显然不确。在悠悠数千载的中国书法史中，最重要的书法家族是晋代的琅琊王氏。能有“书圣”称号者，唯有王羲之。他和其子王献之都辉耀千秋万代，合称“二王”，又作“羲献”。而作为羲之妻、献之母的郗氏，自然也是个非凡的名人。近年来横空出世的《郗氏墓识》，在文史界与书法界必将掀起极大的影响。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有两大著名的家族：王与郗。而作为这两大家族交会点的，即是王羲之妻郗氏。郗氏与父郗鉴，兄弟郗愔、郗昙，以及侄郗超、

郗恢，一门六人，皆是名标青史的书法家。《郗氏墓识》早年出土，无人识宝，浑身泥涂。直至近二十多年才现身北京。我的弟子张笑荣经过追寻与磋商，终于2006年春节后运回绍兴，如今成为会稽金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绍兴文博》第七期曾有《〈郗璿墓志〉考辨》报道。如此罕见之重宝，真伪鉴定自是必不可少。《郗氏墓识》返乡后，曾经有著名学者马承源、陈佩芬、曹锦炎等鉴定，皆无异辞。与已出土的同类晋代墓志相比，无论书法、行文、材质、程式、刻造风格均接近。或有存疑者，恐并世无人有此学问、财力、胆识去作伪。从实物观之，古趣盎然，严丝合缝，绝无一点可疑之处。

先将实物及所刻文字按照原来行次作一介绍。青石质，底边横损一排，故有缺字。共28行，每行1至21字，总356字，兹列如下：

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乡都乡□
平里郗氏之墓识。

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讳羲之，
[字]
逸少，年五十六。
长子。
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南]阳范氏，父讳汪，
字玄平，吏部[尚]
书。
次子凝之，字叔平。妻陈国谢氏，父讳奕，字无
奕，使[持节]
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 晋王羲之妻郗璿墓识

次子涣之，字季文。妻颍川陈氏，父讳逵，字林道，使 [持节]

卫将军、淮南内史。

次子肃之，字幼恭。妻陈国殷氏，父讳浩，字渊源，使 [持节]

中军将军、扬州刺史。

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讳籍，字项羽，莒阳 [太] 守。

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济阳江氏，父讳霖，字思玄，右 [将军]

会稽内史。

次子献之，字子敬。

女适南阳刘畅，字序元，抚军大将军掾。父遐，字子□□

将军、会稽内史。

夫人外氏，沛国武氏。

夫人长姊，丧乱相失。

妹适济阴卞轸，字道重，封建兴公。

弟愔，字方回，临海太守、南昌公。

妹适济阳蔡奚，字子叔，太宰司马。

弟昱，字重熙，散骑常侍、北中郎军司。

升平二年戊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以其年□月廿八日庚戌，葬会稽山阴南乡离上里离东山□。

(注：底边损字以 [] 标出，可推定者则置其内。)

“郗氏”与“墓识”之称呼，均出原石之文。今知她名璿，与“璇”系同一字。例如《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784 页：“璿：美玉。本作璇。”以故，之前各家所论或称郗璿，字虽异，其实同名。再举一例：我的太老师王福菴，其最后一字可作“庵、盒、厂”等，均见于他本人的作品中。墓识，一般多作墓志。附有铭文（多为四言诗）者，则称墓志铭。

围绕王羲之及其所撰并书之《兰亭集序》，古今曾多有聚讼。由于《郗氏墓识》的出现，与王羲之的生年、婚姻、子女、官职等已可得出明确之结论，此即为文物证史可贵之处。

(一) 生卒问题

关于王羲之的生卒，文献上颇多分歧。以 1949 年后倾全国学术界之力所编《辞海》观之，1979 年、1989 年、1999 年编辑出版者即有很大不同，有“312—379”“303—361”“307—365”三说。生卒年所显示的“享年五十九”，则是相同之处。编者应该是查过《晋书·王羲之传》，书中明确写其“年五十九卒”。今从《郗氏墓识》，王氏在他夫人过世之时（升平二年即公元 358 年）

“年五十六”，推算其生年应为 303 年。既然“年五十九卒”，当为后其夫人三年过世（升平五年即公元 361 年）。有此铁证，今后论王羲之的生卒当定为公元 303—361 年，与《辞海》三说之一相同。

（二）子女问题

中国人兄弟间长幼大小的排序，向有伯、仲、叔、季的规定。关于王羲之的子女，据他晚年写给好友益州刺史的信说：“吾有七子一女……内外孙十有六人，足慰目前。”之前余就感不解：何以一般书上称其长子玄之字仲思，二子凝之字叔平，有明显的排序参差？今《郗氏墓识》才使千古疑案浮出水面。原来，王羲之实有八子一女，只是长子早夭。若从存世论，就只有七子一女了。墓识第五行仅“长子”二字，连名字都没取。但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无视他的存在，所以保留了“伯”的排序。所以，玄之字仲思，凝之字叔平。夭折的时间，估计比较早。近代以前，新生儿的死亡率相当高，例如脐带风（破伤风的特型）俗名“七日风”即为一例。其他如难产、产后窒息、先天性疾病等。为何王氏自称“七子一女”呢？避免触及伤处之故也。

（三）官职称谓

后世称王羲之或其字称“王逸少”，或因其官职称“王右军”。问题是其时的官职与“右军”有关者，有二品的“右将军”与三品的“右军将军”。之前文献，似乎以后者略多，今从《郗氏墓识》，则知王氏故世前三年已任“右将军”。当然，官职是从低阶向上高升的，或许王氏早些年曾任“右军将军”，后来才升为“右将军”，那就无从查证了。

（四）书风与作者

王羲之及其夫人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史重要的书风变异的时期，盛行于汉朝的隶书，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魏体（又称魏碑）而楷化。至于成熟的楷书用笔，那已是唐朝的事了。自古以来关于《兰亭集序》其文、其书真伪的争论，在“文革”期间又掀起高潮，至今尚未止息。我们认为，王、郗夫妻在世之时，社会上在正规的场合（即如写墓志）所用的书风仍是以隶书为基础，兼魏带楷。而文人另创行草以抒胸臆作为游艺，在王羲之以前，就有他叔父王廙的《祥除帖》、堂伯王敦的《蜡节帖》等流传。这种现状，与秦代的小篆与古隶并存类似，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先贤必指《兰亭集序》非王氏书，我看也如同必证《满江

红》非岳飞所作一样，未免多事。至于撰文及书《郗氏墓识》者是谁，因为无任何资讯可推测，只好有待他年另有发现。多数人以为，王氏子女及家族中能文善书的人太多，任何一人均可胜任。我倒有另一种观点，当至亲之人突然离世，举家亲人心神震荡，难以下笔，或托其事与专业的友人甚至行户。

（五）缺铭问题

晋代对于墓葬多所限制，墓碑率皆粗糙。此石碑面未经仔细打磨，缘由即为此。墓志后来多缀以铭文，故称“墓志铭”，但魏晋六朝均少见。如 1965 年 6 月南京出土的夏金虎（王彬继室）墓志，1998 年 12 月南京出土的王建之夫妇墓志等。在这些东晋妇女的墓志上都没有“歌功颂德”之词，《郗氏墓识》出在同一时代，亦不可能有例外。

（六）墓葬地址

《郗氏墓识》虽自称“葬会稽山阴南乡离上里离东山口”，但由于古今地名的变异，又由于该墓志为传世之物，无法追查其确切地址，因此至今难以确定其具体位置。据王羲之后裔、琅琊王氏家族史研究权威王云根研究，可能在今日之兰亭、漓渚一带。因为郗璿先王羲之三年而死，按照古人“夫妻同穴”之习，要么王羲之即与郗璿同葬于“离东山”，要么郗璿移葬于王墓。因为王羲之在历史上是个著名人物，所写《兰亭集序》流芳千古，西泠前辈陈左夫当年与余谈及此事均十分敬仰，大家都刻了一方“一序双绝”（指文与书）印。关于王氏的墓葬，共有四说：其一为“山阴西南三十里兰渚山下”（唐何延之《兰亭始末记》），此说与《郗氏墓识》所述相近；其二为“会稽云门山”（《绍兴县志》）；其三为“苕萝山”（《诸暨县志》）；其四为“金庭”（《嵊县志》）。从近代的考察，目前仅嵊县（今改称嵊州市）金庭一地存有大量之地面建筑，并有明弘治十五年（1502）所立墓碑及《布政司督令修募徽》等珍贵文物。今日，金庭已是旅游之地，国内外慕名来访者甚多。该地还有一些王氏后裔。看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伟哉书圣！夫妻、父子同垂万古。举世崇其道德、书艺与文章、懿行，与日月同光！

【作者简介】

林乾良：西泠印社资深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顾问。

对汪新士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提供几条佐证

文 / 昌少军

我是 1981 年师从汪新士先生的，之后近二十年里，汪先生在多次对我们弟子谈及自己的往事时，以及他在面向社会的自我介绍资料中，均称其于 1946 年 11 月，经王福庵、韩登安介绍加入西泠印社。但因各种原因，汪新士是否为早期社员，一直以来没有定论。

2018 年 11 月中旬，我有幸参加西泠印社 115 周年社庆活动，拜读了《西泠艺丛》2018 年第 9 期（总第 45 期）所刊余正先生《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名单整理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提及：

邹梦禅、徐家植、汪新士等（“文革”后入社）是否为早期社员等的问题。其中有因史料互校难以确定的，也有因“孤证不立”或“文本不载”不能贸然确定的，只能存疑，以待日后大家的研究了。

2019 年 3 月，《书法报》发表陈振濂先生《高式熊先生十事（三）》一文，文中指出：

为什么我们对“早期社员”特别重视？这是因为西泠印社本是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艺术社团。它的聚合力，就是每个人对金石书画和印学的无条件热爱，它的动机完全来自信仰和精神维系。参与者除了付出时间、精力和钱财之外，其他名利均无可图，也不可能有回报。社长只吴昌硕一人，当时也没有副社长、理事的交椅和头衔。雅集时各取所藏，互相观摩为乐，其中没有利益冲突，更没有组织所拥有的制度约束和强制力，而在这样“无约束”的漫长岁月中，还能每有雅集活动必到；天远地久，风雨无阻，不一次或缺，这正是一种对西泠印社文化有极高忠诚度的表现。

拜读陈振濂先生的文章后，使我觉得有必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余正先生研究参考。



◎ 图 1 西泠印社丁亥重阳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社员合影（第一排右三穿浅色西装者为汪新士）



◎ 图 2 1947 年秋，西泠印社补行建社 40 周年时部分社员在闲泉合影留念（第二排右一为汪新士） 转引自王佩智著《题襟遗韵》

1. 西泠印社丁亥重阳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纪念活动中，共有两张社员合影，汪新士都在其中。这是汪新士时为西泠印社社员的直接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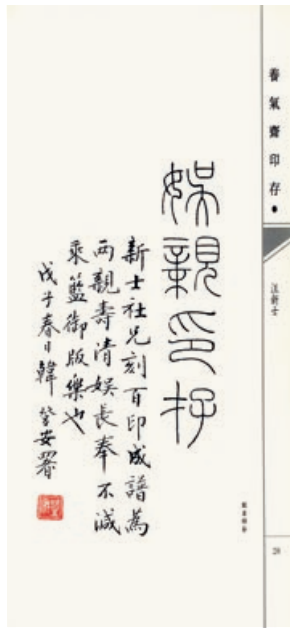
西泠印社成立于 1904 年，四十周年纪念当在 1944 年，



◎ 图3 《汪新士篆刻书法集》



◎ 图4 韩登安题“新士道兄”



◎ 图5 韩登安题“新社兄”



◎ 图6 童大年题“开年社兄”

当时正处抗战期间，因此才于1947年“补行”。

其中一张照片上，有王福庵隶书“西泠印社丁亥重阳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社员合影”十九字。此照为汪新士1981年1月赠西泠印社。照片第一排右三、穿浅色西装者为汪新士。汪新士在照片右上题“西泠印社惠存”，左下题：“此帧乃三十五年前之旧物，幸赖舍侄乐夏保存，历劫不磨，使后之览者得见昔日之盛会，亦一快事也。辛酉岁朝，汪新士敬赠并记。”2019年3月13日，《书法报》第10期发表陈振濂先生《高式熊先生十事（三）》一文，此文附印了这张照片。（图1）

另一张照片，为王佩智著《题襟遗韵》第161页所印丁如霞提供的“1947年秋，（西泠印社）补行建社40周年时部分社员在闲泉合影留念”。该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照片第二排右一为汪新士。（图2）

2. 韩登安为汪新士题词由“道兄”变为“社兄”，是汪新士由非社员成为社员的最直接证明。

1999年12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汪新士篆刻书法集》（沙孟海题写书名，图3），刊载了许多印社前辈的题词。其中，第27页（图4）韩登安丙戌（1946年）六月题：

新士道兄就学沪上，课余时诣麋研斋问道于福庵世叔，不数月而艺猛进，并集拓几案鏤陈诸印，以备观摩，属为记之。丙戌六月韩登安。

钤“韩”（圆形朱文印）、“登安”（白文）。

此前汪新士拜韩登安为师学习篆刻，韩题款谦称“新士道兄”。

第28页（图5）韩登安戊子（1948年）题汪新士《娱亲印存》曰：

新士社兄刻百印成谱，为两亲寿。清娱长奉，不减乘篮御版乐也。戊子春日，韩登安署。

钤“登安”（白文）。

此题称“新士社兄”，“社兄”为印社社员之间互称之惯例。韩登安为汪新士两次题词的称谓，从1946年的“道兄”到1948年的“社兄”，此之变化，绝非时任西泠印社总干事的韩登安先生随意为之，实因汪新士1946年时尚非社员，而1948年已经成为社员无疑。

3. 童大年为汪新士题词亦以“社兄”相称，再证汪新士当时已是西泠印社社员。

《汪新士篆刻书法集》第20页（图6），童大年戊子（1948年）大暑节题词：

养气斋印存。开年社兄清属。戊子大暑节，童大年年七十六署。

钤“童大年”（白文印）。

汪新士名开年，字新士，后以字行。

韩登安、童大年这两位早期社员都在1948年称汪新士

为“社兄”，实在没有理由说他们两人都错了。如果此“社兄”不是西泠印社之“社”，那还有别的什么“社”吗？

4. 1949年编订的《西泠印社志稿》，录有“汪新士”条目。这也是汪新士其时为西泠印社社员的重要佐证。

2003年11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西泠印社志稿》，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韩登安题写书名，余正点注。该书编成于1949年，1950年有少量油印本。我没有见到该书油印本，但在新版《西泠印社志稿卷六·志余·丁亥题名》影印件第126页载“《西泠印社丁亥（一九四七）重九题名》（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先后）”，汪新士排第27位；第129页载：“汪开年，别号汪新士，斋馆：环山园、养气斋，年龄1923年（癸亥）25岁，籍贯：衢州江山。”（图7）

5. 1950年西泠印社秋季雅集，汪新士作为印社成员被邀请。

邀请函（图8）内容为：

兹启者夏历九月初九日（春祭清明、秋祭重阳）午后二时，为本社秋祭。故印人暨故社员之期，届时务祈早光，风雨不更，特此奉布。此致，汪开年先生。
西泠印社启。

钤“庚寅”（朱文）。

右侧为汪新士钢笔书写：

1950年西泠印社雅集，发给汪新士的通知，为总干事韩登安亲笔和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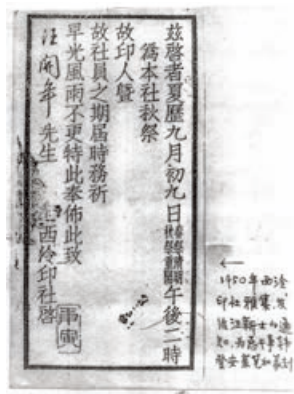
西泠印社这次雅集，给汪新士与给其他社员的邀请函并无二致，没有理由怀疑汪新士的社员身份。

汪开年（1923—2001），字新士，晚年以字行，号不舍翁、无际老人、锲镂轩主。浙江江山人。先后师从余绍宋、韩登安、王福庵、丁辅之、唐醉石、马公愚诸前辈。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平民艺术教育家。汪先生作古已19个年头，他一生醉心篆刻艺术，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渝，始终以西泠印社社员为荣，每印边款均署“西泠印人汪新士”，每幅书法作品均署“西泠汪新士”，始终以弘扬西泠印社文化为己任。即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没有石章，用砖瓦当石；没有刻刀，用铁钉代刀，一生治印逾万方。晚年与弟子创办荆州南纪印社、深圳北斗印社、广州岭南印社，授徒2000余人。汪先生是西泠印社的传奇人物之一。

西泠印社是天下第一名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讨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活动情况，事实上是在回顾西泠印社早



◎ 图7 新版《西泠印社志稿卷六·志余·丁亥题名》影印件，第126—129页



◎ 图8 1950年西泠印社秋季雅集邀请函

期的那段历史。正视历史，才能照亮现在，指引未来。汪新士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身份若能澄清，对汪先生是一种告慰，对他的弟子们也是一件幸事。

【作者简介】

昌少军：西泠印社社员、中流印社社长、湖北篆刻研究院院长，汪新士大弟子。

一位被低估的大家

——重新认识陆维钊

文 / 卢 炯

如今资讯发达，书画大家被埋没的概率很少，而被低估却屡见不鲜。陆维钊先生、余任天先生在浙江书画界无人不晓，皆为潘天寿学术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但在北方甚至至京城的圈子里，却往往被忽视和低估。

宾虹老人身前说自己五十年后才能被人认识，果真 21 世纪初一个特大的“画之大者——黄宾虹热”如期而至，“人人学宾虹”的现象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画坛。

陆维钊先生则更为坦然，他甚至说：“是不是书法家，活着说了都不算数，三百年以后还记得你，才作数。”对此我深信不疑，也带着这种信念拜读陆先生留下的丰厚的诗文著述，颇有所得，深感先生形象高大伟岸。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所得，亦请诸位批评指正。

一、开拓型书法大家

书法是写字，陆维钊认为写字无法与诗词比重要性。我曾为陆先生临终那段感叹而惋惜过，认为先生将书法艺术看低了。

陆先生临终自我叹息：“想不到落得个书法家的下场！真可谓一事无成，真可谓一事无成，真可谓一事无成！”一连说了三次。我想陆先生也是自有道理的。《礼记·大学》所说的明德于天下者，需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陆先生追求的最大出息即在于此。就文化而言，诗文和绘画都可以是全人格的，但诗文所表达的东西自然比绘画要多得多，尤其是思想、哲理。一位书画家要将自己的专业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联系起来，才能

发挥最大的意义。

陆维钊先生无疑是书家也是诗人。“曾记狂吟登绝顶，万山青拥一诗人。”何等豪迈！何等自信！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被迫自焚诗稿时所叹：“依旧诗人，江水东流不忍听！”情浓心碎，感人泪下。在潘天寿学术群体中，论国学，陆维钊可谓首屈一指。

陆先生最后是以书法家名世的。就书法领域而言，我觉得陆维钊先生也应该定位于 20 世纪开拓型的书法大家。先生领悟“书法、书论”非常透彻、鲜明，不但具有时代特征，而且具有超前性。潘天寿先生请他到美术学院任教，一开始是因为他题跋好，让他当题跋课老师，因为学生古文基础偏弱，不太会写题跋。后来在陆维钊家里看到他字写得不错，就改请他教书法，主持书法专业。陆先生曾谦虚地回答自己不是一流书法家，潘老接着说：“但你也不是三流书法家。”以此推想，意思似乎是二流的书家。

其实我觉得潘老对陆维钊的书法成就评价有待研究。

一是，潘老说此话为 1962 年，在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书法家标准不同，当时还没有书法创新一说，也只有沈尹默、马一浮、张宗祥等少数几位被人称为书法家，而沙孟海、启功、林散之等还是一般的写家，会写而已。潘老也从不自称书法家，而说自己是书法票友。

二是，潘老过世比较早（1971 年），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书法展览，手书招牌也很少（印刷体流行），很多书家没有公开展示的机会，互相并不是很了解。陆维钊的两副三言联“抽宝剑 / 缚苍龙”“同心干 / 放眼量”是 1964 年写的，更多的则创作于“文革”以后，如“百花

齐放 / 推陈出新”“冲霄汉 / 起宏图”，以及为岳飞墓书七言联“青山有幸埋忠骨 / 白铁无辜铸佞臣”，还有“四古碑名”“潘天寿常用印章”“潘天寿墓碑”等。这些陆老独创的扁篆体隶书作品，潘老见到不多，所以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说得不一定到位。改革开放前，陆先生写扁篆体隶书也比较少，作品留存并不多。

这与黄宾虹评潘天寿相似，据说黄老说：“阿寿的画力能扛鼎，但墨韵尚欠。”（大意）我在一篇论文里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黄老也是因为1955年过世，未曾见到潘老雁荡题材和墨荷系列的佳作。后来的这些作品不但章法有突破，用笔和用墨都相当精到，根本不存在墨韵欠佳的问题。

陆老很谦虚，其实他早早对书法有了专业性的研究。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维钊著《书法述要》，是他1948年通过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书法》的再版，书名改了一下。实际撰写的时间还要提前许多年。我从陆老哲嗣陆昭徽老师那里了解到，早在1927年，陆维钊在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教语文的时候，就讲授过文字学；后来1942年在圣约翰大学任副教授，以及1946年被聘为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时，都开过文字学的课程。他对文字发展演变特别感兴趣，进行了几十年的碑帖搜集研究。尽管文字研究只是他众多著述的一个方面，但成果卓著。

《书法述要》约2万字，篇幅不长，然精准得当，观点鲜明。从中国书法之所以强于他国文字谈起，笔画、用笔、结体、姿态，以及品鉴风格，一路谈下来，非常精彩，语言特别精湛。譬如生动地将书写风格概述为如同“英雄（沉雄、豪劲）、美人（清丽、和婉）、君子（端庄、厚重）、才士（倜傥、俊拔）、野老（浑穆、苍古）、隐者（高逸、幽雅）”的几大类，又指出：“无形中受其熏陶：感情为所渗透，人格为所感染，心绪为所改变，嗜好为之提高，渐渐将一般人娱乐上之低级趣味转移至于高级。这便是学书法的价值。”

文中对比各种碑帖文字书写风格、优劣及传承发展关系，引用的碑帖达一百四五十种。近年家属捐赠整理的陆老历代碑帖收藏实际有千余种。可知《书法述要》是真正的择要概述，意义在于指导入门鉴赏和学习，普通人和专业人士皆能得益。

仅举一个例子：谈到当时热门的《石门铭》，书中

指出：

用笔方圆兼能的，当推《爨龙颜碑》，在云南，其高华朴茂超于中土诸碑之上。岂退方书家不受中土拘墟所致耶（中土《刘怀民墓志》极与相似）？其次为《嵩高灵庙碑》，用笔较方，碑阴尤胜，似由《吴九真太守谷朗碑》蜕化而来，惜今碑之中部已全蚀损。《谷朗》未经剥损之本不易得，字含隶意，故《灵庙》也有隶意。至《爨宝子》则更方峻，终不及《爨龙颜》之意味深长，也不及《灵庙》之气息浑厚。

论述明确。接着陆先生更直截了当言之：“故我以为，与其学《爨宝子》，尚不如学《南石窟寺》《程哲碑》，属此派而整齐。”由此又进一步阐述：

近于《爨龙颜》而结体无其跌宕，用笔兼取仄势渐入整齐一路、易于摹写者，则有《张猛龙》《贾思伯》二碑。贾碑发现甚早，迄今剥蚀已甚。《张猛龙》兼有碑阴，碑阴书法圆浑，碑额书法险峻，故人皆知而习之。若论魏书正宗，当以此为第一。昔人以为，唐之虞、褚、欧三家俱其支流；虽未必尽然，而其开后来无数法门，则确可由用笔、结体窥其线索。故我于习魏书者，每令其潜心于此，盖《石门铭》《爨龙颜》俱臻化境，非天纵之资兼以学力，易滋画虎不成之讥，不若学《张猛龙》之有规矩可循也。同于张、贾一派，有《李璧墓志》；用笔更重，刻画更甚者，则有《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薛法绍》《鞠彦云》诸造像，则已近于《吊比干墓文》矣。

此外，还特别提醒：“然除《始平公》外，每有刻工不慎，频见败笔之处，学者须以意得之可耳。”

研究陆先生书法创作的文章很多，对其独创性评价极高。他的法书在力度方面超越了他的前辈，笔画饱含情感，灵动别致，感人至深。可以看出他内心极其强悍，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也是对自己的自信。陆先生的执着倔强与蕴藉诗性都表现在书法之中，所以用“翰墨铸诗魂”来称道他，我觉得非常准确。

陆先生虽然各体皆擅，但独创的“扁篆体隶书”更体现出他的开拓性。无疑这与他特别重视收藏研究秦汉碑帖有很大关系，对于“隶变”的研究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他的“扁篆体隶书”也是一种“隶变”。在整理陆维钊所收藏的秦汉三国六朝碑帖时，先生夹进去的小纸条被发现，

为他亲笔记录，注明该件由篆变隶，隶的成分有几成；由隶转楷，楷的成分有几成。对于文字演变，他非常关注，非常敏感。他长期订阅《文物》，里面有文字发掘研究，他每期都看得非常仔细。

“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隶变”中，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隶变”以后，从使用方面说，文字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和书写，但作为书法艺术家的陆维钊，我觉得他还在留意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保留篆书所特有的“象形会意”中所体现的，人最质朴的情感、最本初的审美意识？他认为这非常有意思，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执迷。他的“扁篆体隶书”挖掘了汉字的本初之美，让古文字的美在现代汉字上得到极限般的保存。

沙孟海先生曾经回忆说：“有一次（陆维钊）对我说，这样写好不好？我说，会变就是好。过了不久，果然变出名堂来了，那就是今天国内外推崇的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陆维钊独特新体。”

沙老接着说，这种新体陆先生自己叫作隶书，而当沙老称赞“陆先生是当今的螺扁专家，他笑而不答，我看他是当仁不让的”。这里沙老借用了宋代称方体扁体篆书的名字，既然陆先生自己笑而不答，此后的研究者就沿用沙老的说法流传开了。我觉得“笑而不答”是不太认可，因为陆先生明明说自己的体是隶书，只是吸取了篆书之美，呈现出扁篆体的趣味而已。所以我觉得称之为“扁篆体隶书”可能更符合先生本意。

陆先生对学生说过：“以隶求隶是写不出来的。”（《与俞建华谈话》）他自己是以篆求隶。他还对学生说：“历代大家多成功于书体大变之时代。”（卢坤峰《博大精深 万法可明》）陆先生将现代书家带回到了书体大变之时代，为他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就是陆先生一大贡献。

篆书毕竟由于实用性存在缺憾而在历史上式微了，但陆先生对它情有独钟。他从美学的意义中将篆书之美在隶书中复活，这是一种极大的开拓，能说不伟大吗？

连沙老都未必真正理解他。不过沙老也说：“在中国书法史上开办书法专业，陆先生立了第一大功。”又说：“他有个人独创，一种驾于篆隶之上的书体，从前有人写的是圆的，他写成扁的，我称之为螺扁体，这是第二个大功，所以我非常敬佩他。”所谓“驾于篆隶之上的书体”，

毕竟一言中的。

陆先生研究篆书可细分为七大派：

- 雍容一派，以《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
- 劲直一派，以《开通褒斜道石刻》为代表；
- 道逸一派，以《石门颂》为代表；
- 闲畅一派，以《孔宙碑》为代表；
- 丰媚一派，以《夏承碑》为代表；



◎ 西泠印社 75 周年纪念联 陆维钊撰句并书 西泠印社藏

韶秀一派，以《曹全碑》为代表；

凝重一派，以《张迁碑》为代表。

此中陆先生又特重以《夏承碑》为代表的丰媚一派。

陆先生记道：

碑建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元祐间出土时完好如新；后剥落四十五字，后又剝刻下截一百十字；后又将其中“勤约”二字剝伪为“勤绍”。此原石前后不同之处也。石在广平府平曜；碑所自来，莫可考竟。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筑城，碑为工匠所毁。二十四年（1545），郡守唐曜取原碑已经剝刻伪为“勤绍”之本，重行摹刻。原石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摹本十三行，行三十字。今所见者，摹刻之石也。今所传者，以华氏真赏斋所藏而后归李宗瀚之原本为佳；所缺三十字，翁方纲书以补足之。翁氏复据之校出重刻本误字二十，并谓：“姿态横溢，见宋拓始知其笔笔变化、左右向背、阳开阴闭之妙。”程瑶田也谓：“中郎有九势八字诀，唯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不得以奇怪卑视之，而隶法之中实尚存有篆意者也。”

我认为谜题已经掀开一角。请注意这句：“中郎有九势八字诀，唯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不得以奇怪卑视之，而隶法之中实尚存有篆意者也。”陆先生的扁篆体隶书也许正是由丰媚一派篆书中得到了启发——隶法之中得存有篆意。

陆先生书写自己这种扁篆体隶书的时候，落笔非常迅捷，不像写普通篆书那般迟缓，后来他在其中又加进了草书的成分，呈现出更多的书写之美。扁篆体隶书的创造使陆维钊登上了开拓型大家的高位，这是他高于同代书法家的地方。这样的结果估计陆维钊自己亦未曾料到。

二、才华横溢的全才型文化大家

陆维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儒士、师者、正人君子，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论他、研究他，经得起大浪淘沙，经得起时间筛选。

我先说一件小事。“文革”结束后，陆维钊先生第一时间把一本笔记本交给了潘公凯。这是什么东西呢？“文革”中他与潘天寿、吴弗之、周昌谷等所谓的“牛鬼蛇

神”，一起被关进“牛棚”，要他们开会交代——这是一本会议记录。陆维钊是记录人，用红色自来水笔记录的，包括每个人的提问、发言。现在笔记本保存在潘天寿纪念馆。在当时没有录音条件下，正是这本记录见证了被限制自由的老先生们的人格，有的实话实说，有的敷衍了事，也有的屈服于压力说着违心的话。

陆先生的记录，帮助澄清了许多冤案，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是做了觉得应该做的事。《论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胸怀宽广，保护贤良，不计个人得失。我把正人君子作为论陆先生之必须，论艺品先论人品。

（一）人品第一

陆先生注重自身修为，以道德律己，做正人君子，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陆先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爱国之士，他的雄才大略基于崇高的家国情怀。这方面内容很多，仅说二点。

一是诗。他的诗词所表现的情怀，尤其是抗战离乱时期的作品，可以与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感怀诗同视，随便取一首诗都一样沉郁顿挫，感人至深。那个时期几乎没有欢乐可言，八年抗日战争的灾难过甚于八年安史之乱。我曾专文论及过他的感怀诗，在此聊摘几段：

览其诗集，满目惊心的诗句：“凭将妙手烟云笔，写尽江南十万峰”“莫叹诗人眼界穷，画山常圆浙西东。要知烽火家山路，全在屠门大嚼中”“天涯若问刀兵劫，处处哀鸿动比邻”“今日故人同秉烛，酒酣还枕吴戈”“一岭梅花新岁月，半竿斜日旧河山。英雄老去心犹壮，匹马边城不拟还”“甲申明日从头数，犹此山河吊国殇”，读罢使人为之激愤，顿生爱国之情。

他常以诗会友，以诗代简，以诗作论，以诗为记。这让我们想起九百年前他的本家，南宋诗人陆游，每事必以诗记之。他俩对于自己的诗人身份一样看得很重，这从他们的诗中极易感受到。“暮烟开处月华新，独唤轻车驻水滨。曾记狂吟登绝顶，万山青拥一诗人”（陆维钊诗《与同学诸子登宝石山》之二），“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诗《剑门道中遇微雨》）就是为了这句“万山青拥一诗人”的诗人理想，陆维钊作了一生的努力，临终前还留下那充满遗憾的《减字木

兰花》：“当时年少，月夜登临秋皓皓。意气纵横，万山青拥一诗人。而今老病，重到西湖秋有影，依旧诗人，江水东流不忍听。”

其实陆先生与本家先贤陆游，不仅在觅诗之成就上为人所敬。他们在国难当头都有保家卫国争当英雄的理想，陆游自然用不着我在此赘言，陆维钊在抗战写的诗词亦多有所体现。如《念奴娇·和季思抗战》，他欣羡抗日健儿“纵横游击，让他草莽英雄”，以至于“完卵覆巢宁有此，誓把匈奴歼灭。待捣黄龙，登民衽席，重整冲冠发”，诗人则已将自身融入。又如《甘州·丹徒客感》的下半阙“落尽萧萧木叶，剩烽烟半壁，谁挽神州。莫飘零自误，珍重少年游。看英雄，后推前浪，乘长风，万里逞飞舟。从今后，要闻鸡舞，睥睨封侯”，全是诗人的心声。

然而，他腿染流火，连从事地质都不行的身体，如何挥戈抗日？辛弃疾的词句“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他的体会自然最为深切，在诗词中亦不乏流露。如：《金缕曲·九一八后》“阅风尘、尊前抵掌，中原如画。棘地荆天歌不得，一恸平生称快。剩断续，斯文旧社。丝竹中年胸怀恶，枉高轩、谁是知音者。更谁慰，漫长夜”，这与辛弃疾名篇“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同是在曲折委婉地表达功业未就的郁闷。

陆维钊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与屈原、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游的爱国诗词一脉相承，甚至诗格、诗品和造诣也同处一个水准上。

二是日记。劫后余存的《日寇金山卫登陆前后》，从1937年7月16日至1938年6月10日保存的44篇日记，有的仅短短几句话。日记记录了逃难之苦，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

选摘如下：

九月二日 松江车站受日寇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因而居民或迁租界，或迁回乡。

九月廿四日 炮声甚隆。

十一月十三日 松江大炸，死多人。……西门精

华殆尽，延烧甚久。

十一月五日 日寇已持枪追人，人有投水逃者……一路有跛者、有病者皆欲搭船，余俱助之上船。……炮声连续不断，飞机亦续有盘旋。

十一月七日 上午有一队日兵过胡家……日兵入室索人不得……遂击之，此农民竟惨死。

十月十八日 夜间灯光数十里，借用探照灯指示方向。上岸以后，沿路则烧民屋为记号，以示行军路线。奸淫掳掠，无所不至。枪杀人以为耗费子弹，则以刀刺胸割喉。有我在山阳认识者，有在路上同避者，死于日寇之手已有六七人，不相识者，更不尽数。……涿涇一沦陷即大火，至今日已大火三日不绝。

十一月九日 山阳亦大火，东西被抢，死者不少。……我带往山阳之皮箱等已全部被抢，仅若干稿子撕碎在地上。……山阳、张堰、亭林、烟墩头、叶榭、庄家行等近处情况，或日兵刺死人，或日兵强奸而又刺死人，以及焚烧房屋等等。有一产妇，初产不久，日寇欲奸之不遂，乃以刀剖其腹，其他类似者甚多。

十一月十日 有某一君，日寇逼其从桥上跳河，不死，上岸后仍逼其再跳，终于淹死。日寇以此为乐，拍手大笑，无人性至此已极。

十一月十三日 日寇入室，遍看各人面孔，于数十人中选一人，令其跟他们走。哪知走出不过数丈，即将此人枪毙。……杀人放火之恐怖气氛又极浓。其实无日不杀人，且所杀不是一二人。……例如有人从闵行来，仅他一人亲眼所见，公路上死尸已达数十。

十一月十五日 亭林被焚甚烈，而张堰则亦于今日又烧一次，大街全毁。

十二月六日 一日忽来日寇甚多，于上午六时许即包围此村，将女的放出，将男的全部屠杀。杀的方法不用枪打，而用刀割其喉，以至喉断而死。但有若干人喉半断，自知无生望，竟爬行至河浜，投水而死，其状惨极，共死八十余人。

五月廿九日 但见全镇十分之九被烧去……姑丈沈伯操之子桂方被日寇残杀，姨母嫁正昌者亦死于日寇之手，舅父仲帆几为日寇所杀。……有女名吴淑芬，为小学教师。日寇登陆，即入其家强奸淑芬，淑芬愤而大骂日寇，并掌其颊。日寇乃刀破淑芬腹，并将肠

挖出而去。

百姓遭殃，亲人罹难，耳闻目见，挥之不去。陆先生的爱国情怀久蓄于胸，成为他感怀诗的一个源泉；他经常把抗战见闻讲述给子女听，让他们不忘国恨家仇，将正气得以传承。

（二）文学史研究

琴棋书画、金石篆刻，无论哪一方面，陆维钊都是一流高手，而这位博学通透的饱学之士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眼光撰写过文学史。

1925年至1959年，陆维钊从教中学到教大学，有长达34年教授国文、文学的经历。他对文学史料非常熟悉，在文学史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待梳理。

从现有的资料看，陆维钊正式发表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内容主要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以及清代文学两大块。最热门的唐宋文学和元代文学却未见专著问世。

究其原因，也许是陆先生对上古、中古文学的兴趣浓厚，也可能与他爱好古碑刻拓片金石有关；此外，他协助叶恭绰最后完成《全清词钞》的编辑任务，对有清一代文学自然特别熟。

当然也无须怀疑陆先生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学问，因为作为诗人，他创作了数千首诗词，对数十种词牌掌握得非常自如，留存的诗集仅是一小部分。

陆维钊先生的留存著作主要有：

1. 《三国晋南北朝文选》，1946年，正中书局出版。序言是一篇非常精到的论文。
2. 《中国文学史》，1958年，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合编。陆先生执笔《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内容几乎是半部《中国文学史》。
3. 《中国文学史》，1959年，陆维钊主持，与吴熊和、平慧善、邵海清合编。陆先生个人执笔《晚晴诗文专题纲要》。

就这些著作和零星的文章，也可以一窥陆先生的文学史观：

1. 谙熟唯物史观

（1）劳动创造文学：劳动中产生；劳动决定了内容形式；为劳动服务。

（2）探索民间源头，努力找出其中内在的发展规律。

2. 注重精神性、思想内容的进步性

（1）高度评价屈原。

值得注意的是，陆先生指出，屈原的爱国思想并非停留在“忠君”一端上，他的忠君不是愚忠、假忠，是为了国富民安而忠，希望楚王施行“美政”。又特别指出，诗人热爱祖国，绝不是空洞的，他热爱祖国的山川风物，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祖国的灾难越深重，他爱得也越加深刻。

（2）两汉文学弱化汉赋，注重散文民歌，重点介绍司马迁。

陆先生认为：“两汉文学，以民歌民谣和司马迁的史传散文最有价值。其次，文人的诗赋和政论哲理散文，也有不少优秀之作。而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的大赋和庙堂诗，则是歪曲现实的作品。”

他指出：

旧时以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指的是传统上以司马相如为首的大赋。它的成熟，是在西汉帝国经济日益繁荣，武帝的奢侈生活日益加甚之时。那时候，武帝豢养了许多御用文人，又修建了上林、建章、甘泉、太液，以游冶享乐为事。于是这些文人专门铺叙田猎游幸、声色珍异，借讽喻为名，行逢迎之实，所以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是歪曲现实的宫廷文学。从此以后，大赋便成了一种不良的风气，盛于西汉中叶，沿用至东汉前期。然而，赋中也不乏优秀作品，或抒个人志愿，或写遭遇的苦痛，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张衡、蔡邕等写的有现实意义的抒情小赋，其中还有特别写民生疾苦的，内容丰富，形式精练，绝不同于大赋的铺张扬厉，陈陈相因。

（3）重视建安文学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陆先生指出：建安文学反映了时代特点，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辉煌的成就。建安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着比较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因为建安文人无不亲历了这场巨大的变乱，对悲惨而又残破的社会有深刻的体会。

（4）《三国晋南北朝文选》中休闲散文选得不多，重在政论类。

陆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段话：

在晋承魏统，其篡夺如出一辙，其提倡文艺，当然亦具同一的作用。只要看阮籍酗酒佯狂，仅免于死，嵇康、刘琨、郭璞、潘岳、石崇、陆机、陆云，都不

保首领而歿，便可想见当时的文人，只好讲讲庄、老，做做《咏怀》《拟古》《游仙》《游山水》《归田园》了。先生对文人不问政治、休闲田园的态度甚为在意，认为政治的专制、文人的无奈，乃国家人民的损失。

3. 不忘民间文学的辉煌成就

重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的推介，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就两汉六朝文学而言，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西洲曲》这样传诵不绝的诗歌和《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幽明录》《列异传》等志怪小说，都得到了陆先生的充分肯定，并分析了其积极的思想意义。

4. 重视文学理论、文学形式的发展

高度评价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等文学评论著作。赞同“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对于作品文学方面的永久性和独立价值、诗歌与作者的品评标准，都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也一一指出了他们的局限。

（三）尊师重教，旁涉医学，治病救人，全才精英

陆先生以事业为重，教育得法，诲人不倦，率真品评。我们可以把称颂教师最好的词汇毫无保留地用在先生身上，因为他担得起。

我们先来看陆先生的一首《金缕曲·怀声越》。“声越”为徐震镛先生的字，他是陆先生1914年（16岁）就读嘉兴秀州书院（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前身）时的老同学，擅长诗词，他们与胡士莹三人时称“嘉兴三才子”。徐震镛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这首词是1979年陆先生闻胡士莹先生离世而作。全词为：

往事何堪忆。记韶年、台城城下，鸡鸣寺际。早岁文章期济世，寻遍天涯知己。枉负了、米盐家计。击节同歌今与古，挽狂澜、第一祛时弊。君为我，剖玄理。而今老去人同弃。况难逢、抱琴词客，导游仙侣。回首佛陀时命蹇，历劫真同儿戏。看洒尽、门前血泪。词赋如今须少作，数千秋、多少彭殇例。凭珍重，会君意。

其中最后诉说“词赋如今须少作，数千秋、多少彭殇例”，一位诗人竟诉说词赋诗文可以少作，什么意思？这

是因为彭殇寿夭更为重要，又逢友人离世，陆先生心中积蓄的情感一下子全部喷发出来——希望自己当一名好医师，这才是他的愿望，而且由来已久。

陆维钊先生是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四个月前就因伤寒不治而逝，而他自己20岁考进之江学堂又因生病而被迫休学。此时他开始研究医学，希望以后能当个医师，从医多做好事。可是治病救人当医师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于是他劝子女从医，要一辈子做好事。

他自己一直自学中医，1948年至1949年还与王驾吾一起校勘过清代孔继棻所著《孔氏医案》，为之作跋。他给不少同事开过中医药方，留存的方子有的他注明“与阆丈商后拟方”“与乐三商量”等。阆丈指张宗祥，陆先生敬佩他精通国学、国医；诸乐三原来就是学中医出身。

1959年，陆维钊应邀到浙江中医学院（今浙江中医药大学）讲授医古文课程，同时应邀到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诗词题跋。正当他准备调进中医学院之时，1960年，美院潘天寿院长通过浙江省政协做工作，商调函先于中医学院到达杭大。潘院长一片诚意，慧眼识英才，陆维钊只好放弃去中医学院的打算，走上了书法教学的岗位。

陆昭徽老师在《书如其人——回忆父亲陆维钊》中记道：“父亲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学医，未能成为医生。在他看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永远是在做好事，不同于文学艺术，属文人雅事，是解决温饱之后的精神消遣，因此他希望子女都学医。”

陆先生原来确实希望能多校勘一些古代医书，因为他发现古籍医典在译注方面实在错误太多，急需修正；同时要大力提高中医药专业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在温饱阶段，人民的生老病死，实实在在地牵系着陆维钊这位文化大家的赤诚之心。

最后，我用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在陆维钊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陆维钊先生一生治学态度老老实实，他于文学、书法、绘画，以至音乐、医学，无所不精，而且能融会贯通。他要全面地掌握中国文化的精华，他的艺术是完整的。他是综合中国文化艺术精华的可贵的人。

【作者简介】

卢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画名家馆联合会秘书长。

追忆恩师周昌谷

文 / 黄镇中

今年的9月29日（农历九月初一日）是周昌谷先生90周年诞辰。他是我命中遇到的一位贵人，正是他与李震坚先生引领我正式进入了国画人物画的艺术殿堂。

我是1971年初春认识昌谷先生的，从此追随他16年，直至他去世。他的为人处事至今历历在目。那时我参加浙江工农兵画报社《英雄的南堡人》创作组去桐庐深入生活。一天，我们到桐庐的梅蓉大队，遇到了正在那里创作国画组画《沙家浜》的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老师，他们正把画板搁在板凳上作画。同行的工农兵画报社的陈松林介绍说，这是周昌谷老师，这是李震坚老师。我从小就仰慕这二位名师，当即向他们二位各鞠了一躬并问好。二位老师正在作画，见我向他们鞠躬问好，周老师微笑地向我点点头，并放下画笔与我们聊了起来。

这年夏天，我们回出版社继续创作连环画。一天，创作组画《沙家浜》的美院老师也来出版社修改组画，在这期间我与周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交流。每日下班，两位老师（周老师与李老师）总是与我从出版社推着自行车步行到六公园附近才告别，我们一见如故，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

此后，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二位老师家拜访，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人物画，并看他们作画。那时，周老师家门庭若市，来的人也多。初冬时，周老师查出患了黄疸型肝炎，为防传染，需要与家人隔离，他就搬到学院北面的一

间小平房里单独居住。因他得的是传染病，来的人就少了，但我还是每周必去拜访并帮他做些家务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也视我如同儿子一样，有事必来找我。一次他夫人王含英所在单位浙江省博物馆要创作几幅画，因夫人平常既要照顾他又要工作，难以完成，他就带了五六岁的女儿吉诺来我家，要我帮忙完成一幅。我遵嘱画好后，拿给周老师请他教正，他看过基本满意，并补加了几笔花草，顿使画面充满生气。

1978年的一天，我告诉周老师，我要结婚了。他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我的画你可随便挑一张留作纪念。”我当即感激地说：“那就把墙上挂着那幅送我吧。”他当即叫我把墙上镜框里的一幅水墨《傣女图》取下来，并在画上补题“镇中、陈怡伉俪雅属”，作为贺礼赠送于我。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美院要评第一批副教授，一天我去他家，他对我说：“学院要我报副教授，我填表时，报了 you 与闵庚灿二人为入室弟子。你们二人是我最困难时走得最近的学生。”闵庚灿是韩国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被准予回国。快到临别时，周老师对我说：“明天我们二人在天香楼为闵庚灿饯行，费用我们二人平摊，如何？”我说费用我来出。老师说：“不行，平摊较好，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这样说了，也坚持这样做了。

1985年1月我到西泠印社工作后，与蒋北耿先生、余

成兄创办《西泠艺报》。周老师对我们的工作予以积极支持，他不顾病重，为创刊号撰写了《传统与创新》一文并题词“艺海藏珠”，给予鼓励。当年6月10日，《西泠艺报》创刊号面世。

周老师的肝炎每年冬天黄疸指数都要升高，病情反复，久久不愈。一次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冬天病情复发，难以控制。恰好我爱人的姨夫是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的大夫，便设法帮他转入了市六院。当时周老师身边无人帮着办理，我不顾传染的危险，帮他办理转院手续并护送他去市六院，随同护送的医护人员也担心地告诫我，要注意被传染。当时我年轻也自信，我说我跟随他十多年了，可能有抗体了。也许这也是命里安排的吧。

周老师转院之后，一次我去市六院看他，见他在病床上挂了一幅刚写好的书法，说是老家的人请他给雁荡景区题字，他诙谐地对我说：“以前我落款的‘周’是不出头的，现在开始我的‘周’要出头了。”可能他也知道，这次转入市六医院可能已经病入膏肓。这也是他晚年作品的一个标志。

周老师患病十多年，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

他患病之初，一直住在浙江医院，每次我去看他时，总是看到他在读书或看画册。他说他要把这些吸收在他的作品里。那时期他创作了《荷塘牧女》（图1）、《秋在何处》（图2）、《夏山欲雨图》等作品，成功地把印象派色彩与国画水墨融合在一起，创新了国画的用色。不久，他和美院的诸涵先生二人在深圳举办了一个画展，他那颇具创新性的作品在美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昌谷先生是位才华出众的书画家，他的艺术成就早为世人所称道。1954年他创作的《两个羊羔》在1955年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节”上获得金奖，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上摘取美术桂冠的第一人，那时他才26岁。

在以后几十年的艺术生涯里，昌谷先生尽管患病，仍创作了许多闻名遐迩的佳作，驰名海内外。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新中国写意人物画，在现代美术史上与李震坚、方增先并列为开创现代浙派写意人物画的三个代表人物。



◎ 图1 荷塘牧女 周昌谷



◎ 图2 秋在何处 周昌谷

殊不知，昌谷先生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只是靠他的天赋，还与他的勤奋好学和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密不可分。这种执着的求索精神贯穿他的一生，直至其生命的终点。

1985年冬天，已经病了15年的昌谷师听从医生劝告，转去上海瑞金医院就医。出发前夕，我到他在未央村的寓所，一进门，就看见他侧卧在床上，画桌上铺放着一幅刚

刚完成的《红梅图》（图3）。这幅画不大，为四尺四开纸大小。画幅中，硕大虬曲的老枝干上，挺立着三两枝缀有几朵娇艳红梅的新枝。浑厚的墨韵产生的肌理，把老枝的质地表现得淋漓尽致，与鲜红欲滴的梅朵产生强烈对比，甚是可爱。

我注意到枝干的赭石色与以往不同，特别沉着，且赭石和墨色结合得很好。于是我就问老师，为何这幅画上的赭石色如此沉着呢？老师笑笑，诙谐地说：“我用了秘



◎ 图3 红梅图 周昌谷 1985年

密武器。”我听后更加疑惑了：“哦？那是什么秘密武器呢？”老师笑说：“你猜猜看。”可我猜了半天，还是猜不出来。于是老师便说：“你看看我画桌上还有什么？”我便又环视了一下画桌，仍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便答道：“除了一杯茶，没有什么呀。”老师这才高兴地说：“我的秘密武器就在这茶杯里。”

我好奇地端起茶杯，是一杯很浓的红茶。为解开我的疑惑，老师起身走到画桌前，指着这杯浓茶说：“以前我画梅杆，都是用赭石加墨色画成的，后来发现赭石是矿物质颜料，颗粒又粗，较为‘火气’，近来尝试用浓的红茶来代替赭石色作画，效果果然不错。你看，茶叶是植物质的，粒子较细，色泽也较沉着，色不碍墨，倒有另一种效果。”听了老师一席话，我茅塞顿开，再来看这幅《红梅图》时，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老师见我喜爱此画，便说：“你要是喜欢，这画就送给你吧。”于是，他就用他那独特的“虬书”题上：“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镇中兄正之。周昌谷写。”此画我一直珍藏着。

哪里知道，老师去上海就医后不久，便在第二年的10月11日离开了人世，去世时才57岁。这幅《红梅图》可说是他晚年创作的最后几幅作品之一。

继承与创新，是艺术永恒的课题。昌谷先生以他不断创新的精神，为我们留下不少佳作。这幅《红梅图》或许是他信手之作，从中却亦可觅见他勤于探求、勇于创新的精神。昌谷先生在生命的尽头仍对艺术不断刻苦钻研和创新，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值此昌谷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之际，谨以此文追忆恩师，并志永怀。

【作者简介】

黄镇中：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周昌谷入室弟子。

肯与花王相近侍，笑它倾国是何人

——从《一池春水》看陆抑非先生的艺术与人生态度

文 / 张伟民

2018年，以“一池春水”为题的纪念陆抑非110周年诞辰画展，让人们再次欣赏到杰出的花鸟画大家陆抑非先生的佳作，我也因此再次回忆起先生创作这些作品时落笔生风的身姿，耳边响起先生诙谐的、带着乡音的谆谆教诲、殷殷嘱咐。一切仍如在身边，亲切而温暖入怀。

陆抑非（1908—1997）先生是江苏常熟人。名翀，初字一飞，1937年后改字抑非，花甲后自号非翁，古稀之年沉疴获痊，又号甦叟。偶尔与我谈笑间会落下“跛一足”署款，以记晚年被车撞获痊后的自嘲。

先生早年师从故里先贤李西山，后师从陈迦盦，而立之年又师从吴湖帆，入梅景书屋。先生一生执着不辍，20世纪30年代便以其花鸟画享誉沪上画坛，兼工山水。花鸟取法兼得吕纪、林良、周之冕、陈洪绶诸家技法，以画风清健明丽和讲究韵味的特点，与唐云、张大壮、江寒汀享有“江南花卉四才子”之美誉。中年后又研习和吸取恽南田、华新罗之精髓，精没骨，艳而不俗，工而不滞，工中见写，写中有工。晚年更是汲取青藤、白阳，旁及八大、石涛诸家，且以书入画，将一生的法书功力与体悟融入绘画的笔墨造型、韵律节奏、开合舒展中，其画风灵秀且老辣，朴茂又不失典雅。尤其以南田宗规在前，蓄万千气象为本，自出胸臆的感悟与中得心源、外化于艺术的造诣，创造出传统功力深厚又颇具个人风格魅力的当代花鸟画艺术世界。其中牡丹花的创作是属于他绘画中代表性题材，形式多样，手法丰富，描绘出不同境界、百态千姿、意趣盎然的牡丹作品，或雍容华贵，或脱俗典雅，或清丽温馨，或水墨淋漓，因其卓越的艺术表现力而被业界誉为“陆牡丹”，且以其温润典雅的气质和糯糯通透入味的优雅风格，

被大家戏称为“冰糖莲子羹”。

这幅《一池春水》是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那一池春水的灿烂，是湖光秀色的收敛，是人类心灵美丽的绽放，是生命的律动，体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是幻化为造型艺术审美的追求。纵观陆先生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由工致至写意，由传承到创新，高华之气始终贯穿其一生。



◎ 一池春水 陆抑非

67厘米 × 33厘米 1976年 浙江美术馆藏

陆先生画牡丹有多少本，已无从考证，而把牡丹作为一个重要创作题材来研究，其发展进程可以从我研习过的作品中略见一二。

1951年陆抑非先生入梅景书屋已逾14年，一日随吴湖帆先生一起品读南田牡丹真迹后，吴先生命“抑飞兴到即为席摹出二本”，还“为写石并录原款”。合作完成后，二人“各存一帧用志心赏”，可见吴湖帆先生对陆抑非的绘画表现十分赏识。

此时陆先生43岁，正值中年的他对南田没骨法与新罗兼工带写法已有深度的研究，登堂入室，游刃有余，将南田、新罗画法融入自己的绘画中。他的悉心钻研对这一时期的绘画风格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种融会与理解并不停留在惟妙惟肖的传承层面，而是已有了化解与发挥的端倪。陆抑非先生没有落入徒知模袭的“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户户正叔”、让三百年前南田担忧的驻足于模仿的状态，而是有了突破性的新发展。这幅牡丹摹写是在品鉴基础上有自己心得的“兴到即为席摹”，因此虽是即席挥毫，然其内在有了更深层意义的认识。38年后的我，当有幸伺随陆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先生提供我研究的第一批画中就有此幅与吴湖帆先生合作的《国香春霁》。同时，先生让我去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更广泛地关注、研究南田作品。后来又有机会赴台北故宫博物院，读到馆藏恽南田数十本从严整工细到放逸洒脱的各个时期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今天回想，显然可以看出陆先生1951年做此本《国香春霁》时，“兴到即写”，但已与南田所绘牡丹有了不尽相同的变化趋势。牡丹造型虽未改原作的姿态，但在用粉、用色、用笔上显然有脱胎出更秀逸清俊之势。用笔更具飘逸灵动，色彩搭配更趋雅致；淡化简略了层染细润的复加，更重视笔触调动的抒写性。而其丰富笔法的运用，展示出此刻的他，虽入南田、新罗宗庙求索，却已有了脱胎换骨的突破处。以我看来，这个变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更在审美观念上突破了三百年来对没骨法的认识，也就有了当代著名中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称他“是自恽南田以后三百年来兼工带写和没骨法开宗立派第一人”之赞评。

精承传继，又孜孜矻矻，探索前行。1959年到达杭州后的陆先生更有了湖光山色、四季晦明的滋养，总爱带着学生去自然界写生，体悟风霜雨露，感受大千自然的赐予。作

品《窈窕独殿春》正出之于此。回顾先生画牡丹的历程，这件作品的产生也验证了他研究没骨法的重要过程。1962年，陆先生为学生示范没骨法，随身携带笔墨颜料，率众学生在花港公园写生。写生的过程正是他突破传统法式、寻找表现语汇的过程。面对大自然活色生香的对象，如何以画家的审美感悟，将生命的状态用笔墨的形式转化为艺术审美的境界？外有生活的感动，内有艺术家的养蓄，笔下有传习的优秀品质，胸中有风情雨露的情怀。先生胸有成竹，落笔生风，让围观学习的学生们几十年后还津津乐道目睹的创作过程。这件作品也成为没骨法写生创作的经典范本。正是他将没骨法粉本的传摹，拓展到从大自然中去发现、获取艺术创作的原创力与笔墨语汇，把生活作为重要的艺术感染力的源头。这对陆氏牡丹的艺术形成具有转折性的里程碑意义，是历经梅景书屋中“兴到摹写”的精进，到体悟风霜雨露后《窈窕独殿春》的实践。正是有了自师门佐辅之下的《国香春霁》，到《窈窕独殿春》的创造性写生，才有了25年后的《一池春水》的灿烂辉煌。

《一池春水》《赤城霞》《昆玉夜光》《粉著光凝晴雨中》《闹红一舸》，无论牡丹还是月季、荷花，各种花卉禽鸟，其绚丽多彩的再现，丰富内涵的表现，无一不是源于生活而脱颖于艺术之上；无论丹青重彩还是水墨淋漓，笔下那《无边春色》正《春风拂槛》；无论“怀素驰豪笔写幽兰”的洒脱，抑或《清奇古怪》的宏大，不都是人生抒怀致毫耄之年的精神象征？

陆先生以一生绘画创作的执着践行，验证了“写意应从严谨来”的治学态度，从造化中获得生机，拓展了当代审美追求的中国画艺术发展道路。

“獭祭而成，信手拈来，此对吾辈天资并不聪敏，而好学不倦，到老弥笃者，一道韬光无悔之妙路。未眠老弟以为如何？甦叟。”这是陆先生写给我的箴言，也是他《一池春水》展现出灿烂美丽背后的人生态度。

“五铢衣薄不留尘，罢舞还留窈窕身。肯与花王相近侍，笑它倾国是何人。”卓越的艺术生命已不再仅属于自己。当读者体悟到这一点，即会对陆抑非先生肃然起敬。

【作者简介】

张伟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画院中国工笔画研究所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西泠艺丛》2016年第1期至第12期目录索引

【编者按】

本期刊登的是《西泠艺丛》2016年第1期至第12期目录。2015年始，持续11年颇受好评的社刊《西泠印社》，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进入国家新闻期刊序列，成为正式月刊《西泠艺丛》。新的《西泠艺丛》承《西泠印社》11年的经验，又要在这一基础上更上层楼，创新发展，逐渐成为社刊更高层面的延伸。

《西泠艺丛》2016年第1期（总第13期）

专题·当代篆刻研究

从黄永年先生的篆刻看当代学人印

文 / 张伟然

20世纪中叶的扬州印坛及其现象——以蔡易庵、孙龙父、桑宝松为中心 文 / 金丹

初暖乍寒——1960年前后以“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为中心的江苏篆刻 文 / 杜志强
马衡“重篆轻刻”印学观的史学价值及现实意义 文 / 荀海

秋季雅集

攒聚理论研究力量 指导当代篆刻实践——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在杭举行

以理论创新指导当代篆刻实践——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总结讲话 文 / 陈振濂

秋拍选萃

西泠印社2015年秋拍选萃

学术研究

设计印稿——早期篆刻艺术史研究中被忽视的环节 文 / 黄惇

《纪念韩登安先生诞辰110周年·青灯籀古集》后记 文 / 余正

西泠撷英

传承印学 贡献印坛——纪念陈寿荣先生百年诞辰 文 / 刘云鹤

艺丛信息

陆维钊书画院建院20周年系列活动在平湖举行 / 谢稚柳学术艺术思想座谈会在上海举行 / “嘉兴书学”全国书法研讨会在嘉兴举行 / 西泠印社美术馆推出“风高藏南宋瓷印展” / “秦印风韵——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在杭州举行 / 日本篆刻家协会换届 / “岭东

雅韵——西泠书画名家邀请展”举行 / “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在上海举行 / 鲍复兴先生18方紫砂陶印入藏西泠印社 / 鞠稚儒篆刻高级研修班第二季课程在深圳开课 / 李刚田主编、谷松章编著《历代篆刻赏析系列——秦汉私印赏析100例》出版 / 王佩智著《西泠印社收藏史》出版 / 王佩智编著《三老碑今昔》出版 / 《王晨篆刻心经》出版

篆刻群英会

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学员作品选

封三 2015年《西泠艺丛》合辑本出版

封底 平安延年 饶宗颐 2006年作

《西泠艺丛》2016年第2期（总第14期）

专题·入印文字研究

篆刻用字与文字学 文 / 徐畅

《天发神讖碑》对晚清以来印人创作的影响 文 / 张炜羽

变变则生 不变则死——甲骨文印用字创作谈 文 / 吴自标

生命的色彩——鸟虫篆印创作摭谈 文 / 蒋瑾琦

“杂体篆”与“杂体篆”入印 文 / 程渤

篆刻用字常识指谬 文 / 王平

源远流长——鸟虫印源流概论 文 / 林墨子

佳作欣赏

巡斋藏金石碑刻造像选

学术研究

《石鼓文补注》两例 文 / 归之春

“亚尊尊”覃字试释——兼论“囧”形所象、象、明所从 文 / 王跃庆

灯光冻矿物学特征初探 文 / 沈忠悦

人物品鉴

撼人山色——圆霖法师的绘画世界 文 / 陆一飞

访谈录

叶尚青先生谈新著《中国花鸟画史》

社员成果介绍

《鸟虫篆全书》 徐谷甫 著

《印人逸事》 蒋频 著

艺丛信息

“画风画峰——浙江花鸟画家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 沧海印社召开2015年工作总结表彰会 / “播芳六合 喜迎G20——钱大礼蔬果迎春作品展”在杭州举行 / “在路上——吴颐人师生书法篆刻展”在上海举行 / “熔山铸海——朱炳仁铜印篆刻艺术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展出 / 高庆春书法集出版 / 童衍方《晏方匾额百品》新书见面会在上海举行 / “彼时·彼岸——叶莹中国画作展”在成都举行 / 张用博先生逝世

篆刻群英会

西泠印社社员刻《易经印谱》印选

封三 名家馆寻访 饶宗颐学术馆

封底 北魏强弩将军赵振造像记 巡斋藏

《西泠艺丛》2016年第3期（总第15期）

专题·周昌谷研究

学术主持人 卢忻

周昌谷谈艺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唯美抒情的现代艺术——论周昌谷的人物画艺术 文 / 林木

水墨人物画可以再创一个“后浙派”——周

昌谷诗书画的启示 文 / 洪惠镇
如花似玉——周昌谷：中国人物画的现代启示录 文 / 曹工化
一切众生 均属有情——以周昌谷作品为例看浙派人物画的人文精神 文 / 张素琪
荔枝硕果 孔雀屏张——周昌谷云南写生遥想 文 / 朱维明
周昌谷书画选
周昌谷篆刻选
斯人归去 金石永存——《周昌谷印集》序 文 / 刘江
周昌谷年表

西泠掇英

汪新士《集句印稿》的时代与艺术探析 文 / 昌少军

学术研究

明末清初印人身份的变迁及其背景初探 文 / 朱天曙
“东皋印派”研究三题 文 / 石剑波
篆刻的“受众面”应当关注 文 / 范石甫

新书介绍

《〈寐叟题跋〉研究》/《识篆津梁》/《画竹概论》

艺丛信息

坚守综合型人才培养方向“守望·杭州国画院创作成果展”举行 / 《书法研究》于2016年春季复刊 / 《青灯篝古集》《浙派篆刻赏析》《浙派印论文摘》在日本举办新书发布会 / 《徐璞生印谱》入藏西泠印社 / 王家新临摹历代书法经典作品展在北京举行 / 蒋瑾琦书画篆刻作品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举行 / “艺心在兹——蒋频书画作品展在杭州举行 / “骆芃芃精品展”亮相国家博物馆 / “溪山好处——燕守谷丙申春季书法展”在胶州举行

封三 名家馆寻访 周昌谷艺术馆

封底 百花齐放 周昌谷

《西泠艺丛》2016年第4期(总第16期)

专题·沈曾植书学研究

本专题由嘉兴市书法家协会、嘉兴博物馆与本刊合编

书家别成独行传 文 / 葛金根

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文 / 戴家妙

南北关通初启绪 海日遗珠有奇芒——沈曾植先生跋《刁遵墓志》考略 文 / 林辛勤
通变之机 生拙之妙——沈曾植书法美学思想及实践初探 文 / 刘成伦
寐叟影存
沈曾植书画选
沈曾植书学系年表

春季雅集

西泠印社丙申春季雅集在杭举行 文 / 冷文
西泠印社丙申春季雅集摄影

学术研究

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 文 / 郭福祥

特别报道

群贤聚 翰墨香——第32届兰亭书法节在绍兴举行 文 / 丛文

艺丛信息

西泠印社社员龙乐恒再次向印社捐献藏品 / “书印参同·当代印人篆刻篆书邀请展”举行 / 《十钟山房印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 “大学望境——中国美术学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十周年”特展举行 / 浙江省书协篆刻创作委员会2016年工作会在宁波召开 / 第32届日本篆刻展闭幕 / “随我抚古——鲍贤伦书法展”在杭州萧山新街第三小学开幕 / “福履成之，薪传浙宗——《江成之印汇》首发暨浙派篆刻传承展”在沪开幕 / 《江成之印汇》出版 / 李震坚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 “师古妙创——师村妙石六六篆刻书法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举行 / “游目骋怀——海派书画金石家十人展”在绍兴举行 / “陶写本心——韩天雍、刘茜陶印、瓷板书法作品展”举行 / 韩天衡艺术教育基地首届高级研究生班开班 / “乐土——李夏荣·孙向群陶印艺术展”举行 / 恒庐美术馆举办“美术报·陈振濂工作室作品展” / 童衍方举办“《十钟山房印举》纵横谈”讲座

封三 名家馆寻访 沈曾植故居

封底 海日楼 沈曾植自用印

《西泠艺丛》2016年第5期(总第17期)

专题·赵叔孺研究

以古为新、兼容通达的书画印大家——赵叔孺 文 / 张奕辰

二弩精舍 神留苍润——《赵叔孺先生遗墨·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展览特刊(1956)》介绍 文 / 余正

光前裕后赵时桐 文 / 周建国

从赵叔孺的交往中看其艺术的正统观 文 / 陈可奇

民国海上帖学巨擘赵叔孺 文 / 陆传福

赵叔孺印学年表 文 / 罗超阳

赵叔孺印选

赵叔孺书画选

社史钩沉

陈之佛与西泠印社中人交往及其他 文 / 孙群豪

学术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国宋代绘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文 / 金晓明

沈曾植“尚古”书学观研究 文 / 戎恺凯

特别报道

西泠印社——中国金石篆刻艺术海外推广活动

艺丛信息

“喜迎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杭举行 / “凉友梳儿风——西泠印社社员折扇作品联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举行 / 西泠艺苑鹭江苑在厦门成立,首批导师团亮相 / “湖海之约——2016浦东篆刻会·东吴印社主题篆刻交流展”在苏州举行 / 浙江省书协沙孟海研究委员会召开2016年年会 / “魏晋风骨——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80周年展”在杭举行 /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多位西泠印社中人担任市文联领导 / 韩天衡“九百年印谱史漫说”讲座在上海举办 / 韩天衡受聘担任岳麓印社名誉社长 / 宁海童衍方艺术馆获赠60品古砖 / “吴永良《鲁迅小说人物百图》专题展暨专集首发式”在绍兴举行 / “瓯海潮凉·张如元书画文献展”举行 / “禅悦澄心——江吟、程澄禅意书画展”在杭州佛学院举行 / 何水法“东盟国花精品国画展”在京举行 / 吴山明获法国鲁拉德骑士勋章 / 上海浦东篆刻研究会会刊《印苑》创刊 / 《中流学术十家丛书》首发式在武汉举行

封三 赵叔孺海上旧庐

封底 赵叔孺长寿年 赵叔孺

《西冷艺丛》2016年第6期(总第18期)

专题·古陶瓷印及文字研究

景德镇窑南宋青白瓷印研究——写在《风斋藏南宋瓷印》图录前 文/黄惇

风斋藏南宋瓷印选

古陶瓷印述略——兼论玺印的早期形态

文/孙慰祖

新见战国钤印齐陶文考迹——《夕惕藏陶》

选释 文/吕金成

特别报道

“喜迎 G20·西冷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

在北京隆重举行 文/古豪

百年西冷之“谜”——“喜迎 G20·西冷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讲座 文/陈振濂

西冷印社喜迎 G20 大型展览作品选

能知古始 是为道纪——“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徐畅

考据辨证

吴江博物馆藏《明徐霖小篆横披》辨证

文/周新月

楚国“行府之玺”考 文/汪凯

西冷掇英

说说黄胄先生 文/韩天衡

新发现之沙孟海隶书所制笺 文/林乾良

佳作赏析

来楚生猴肖形印作品欣赏 文/大石子

新书介绍

《新见古代玉印选》/《中国书画鉴藏大辞典》/《民国杭州金石书画》

艺丛信息

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举行 2016 年春季雅集 / “看得见的思想——沙孟海·井上有一作品展”在宁波举行 / “中国海派绘画系列——吴昌硕·王一亭作品展”在上海举行 / “西冷印社 2016 年春季拍卖会”圆满收官 / “向傅嘉仪致敬·在陕西冷印社社员篆刻专场”开拍 / 17 国媒体骨干参观西冷印社集团 / 新昌徽印社成立 / “大美篆刻——走进生活中的篆刻艺术作品展”在京举行 / “容庚奖全国书法大展作品展”在广东举行 / “骆芃芃及其研究生赴日交流展暨第 31 届日本随风会书法篆刻学术交流展”在京举行 / “骆恒光诗书画印作品展”在绍兴举行 / “洪亮书画艺术馆开馆一周年——全国书画名家祝贺作品展”

在北京举行 / 袁道厚在西冷印社美术馆办展并向西冷印社捐赠作品 / 戴家妙整理《赵之谦集》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 师村妙石先生访问钱君匋艺术研究院 / “丹青问道——韩天衡学艺七十年特展”在澳门举行 / 孙慰祖“三十年来玺印研究之新认识”讲座在广州举行 / 李伏雨、李早父子艺术馆在湘潭开馆 / “饮湖上——西冷名家小品展”在杭州举行 / “心与古会——刘新惠艺术作品展”在西冷印社美术馆举行 / 汪黎特全形拓主题雅集举行

封三 西冷印社社员刻西湖名胜印选

封底 雁形纹 南宋瓷印 风斋藏

《西冷艺丛》2016年第7期(总第19期)

专题·秦印研究

《戎奭轩藏秦印珍品展》序 文/刘江

秦印发微 文/张小东

秦私印综述 文/萧春源

秦印“印章钁厨”初读 文/周晓陆

秦“封陵津印”考——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文/熊长云

秦印“李”字考——兼及“李”姓起源 文/张鹏

秦私印掇英 文/谷松章

秦印选

学术研究

元代论印诗初探 文/蔡显良

藏印摭遗

弢翁对印章的喜好及毕生所藏古玺印 文/周景良 校/孟繁之

文著解读

坚守书学研究的寂寞之道 文/昌少军

余绍宋与《书画书录解题》 文/江兴祐

西冷掇英

张宗祥浙南宦宦及《龙庆桥记碑》书艺研究 文/陈远鸣

论张寒月先生篆刻艺术特点及成就与贡献

文/周梅

艺丛信息

“第二届海峡两岸名家篆刻展暨首届两岸青年篆刻大赛”在福州举行 / “浙江·湖南篆刻家作品联展”在湖南举行 / “纪念徐邦达先生诞辰 105 周年书画作品展”在海宁举行 / “第九届全浙书法大展”评选结果揭晓 / “当代

书法评价体系建设”课题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 “青桐印社成立三十周年暨当代篆刻社团联展”在桐乡举办 / “尺素海宁·当代信札展”在海宁张宗祥书画院举行 / “吴昌硕奖”第五届浙江省篆刻大展评选结果揭晓 / 浙江省金融系统书法篆刻展在杭州举行 / 西冷艺苑翡翠物语文化创意中心举办饶宗颐书画展 / “笔墨诗韵——馆藏郭仲选书法作品展”在浙江博物馆举行 / 西冷印社书画篆刻院熊伯齐篆刻高级研修班结业汇报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 何水法花鸟画展在广州开幕 / 王冬龄在新西兰举行个人作品展和大字书写活动 / “红柳精神——傅嘉仪先生书画篆刻藏品邀请展”在西安举行 / “书对话联——刘一闻、鲍贤伦学术对话暨楹联书法展”在河北举行 / 孙慰祖作“战国秦汉印风类型与创作借鉴”讲座 / “厚道有缘——袁道人家文思院同仁艺术作品展”在绍兴举行 / “凤鸣探道——蒋频书画作品展”在桐乡举行 / “十竹斋木版水印培养项目”在杭州开班 / “游刃金石——费铭瑶篆刻艺术展”在台北举行 / “朽兮不朽——三百芙蓉斋文房特展”在杭州举行 / 美国第 39 届总统吉米·卡特获赠朱炳仁作肖形铜印 / “艺术三人行”西冷名家公益讲堂在杭州开课 / “湖上留香——何水法 G20 国花精品国画展”在杭州举行 / 范正红作“当代篆刻艺术”公益讲座 / 西冷印社书法篆刻院余正工作室丙申浔阳爱莲雅集举行 / 钱大礼先生逝世

篆刻群英会

封三 水岸夏景图 潘天寿 1965 年作

封底 明上 秦印 西冷印社藏

《西冷艺丛》2016年第8期(总第20期)

专题·徐邦达研究

本专题由海宁徐邦达艺术馆与本刊合编 谈古书画鉴别中的作伪 文/徐邦达

风华不老星辉耀 文/郑欣森

学派宗师 文博功臣——深切缅怀徐邦达先生 文/郑欣森、单霁翔

疑义相与析——读徐邦达先生题跋札记 文/唐吟方

一代古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艺术人生 文/朱昌元

徐邦达诗词整理记 文/蔡渊迪

徐邦达部分著作书影

徐邦达画选

徐邦达影存

徐邦达年表

学术研究

不必愜吾意——从好雅与附庸风雅的风气中看晚明印人的生存状态 文 / 崔祖善
异好簠铭文补释 文 / 陈治军

艺市知津

海上双璧 独领风骚——吴昌硕和王一亭的艺术与市场走向 文 / 朱浩云

文著解读

金石学宣导的新契机——《金石书画》发刊词 / 《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 / 《中国篆刻聚》 / 《可斋论印四集》

艺丛信息

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启第十一站新疆阿克苏“印之爱”篆刻支教活动 / 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首期篆刻创作班在京举办 / “铁血磐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领肖像印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 / “蒲髯雅集——会稽葛蒲古字砖特展”在上海举行 / “喜迎 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在杭州开幕 / “当好东道主办好 G20”西泠印社迎峰会主题创作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展 / “岭上云·荣宝斋当代篆刻名家邀请展”在北京举行 / “西泠名家篆刻公益讲堂”走进杭州采荷社区 / “范正红书法篆刻精品展”在山东举行

社员近作

孙慰祖 / 张炜羽 / 王云山 / 李智野 / 汤忠辉

封三 名家馆寻访 徐邦达艺术馆碑记

封底 心远草堂 徐邦达自用印

《西泠艺丛》2016年第9期(总第21期)

专题·“西泠八家”诗文书画研究

本专题由浙江省博物馆与本刊合编

“西泠八家”诗文探论 文 / 林乾良、陈谊
“西泠八家”书画艺术概观 文 / 郭超英
浙篆先贤——浙江省博物馆藏“西泠八家”作品介绍 文 / 赵幼强

“西泠八家”之蒋仁书法艺术略论 文 / 朱琪
安徽歙县博物馆藏奚冈三札考释 文 / 董建
陈鸿寿与刘塘的一段金石奇缘 文 / 萧建民
“西泠八家”书画选——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藏

学术研究

从“印宗秦汉”到“印从书出”思想在浙派创立和发展中的体现 文 / 周一红
统计学视野下的当代印风流变(1980—2010)——以历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作品集为例 文 / 舒鸣

追念先贤

学点篆刻有助书画 文 / 钱大礼
“天香满堂——钱大礼先生捐赠纪念展”暨追思会纪要

艺丛信息

“当好东道主，办好 G20·西泠印社迎峰会主题创作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 西泠印社中人积极助力 G20 杭州峰会 / “金石留韵——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拓片展”在成都举行 / “吴风赵格：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举行 /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新馆正式开馆 / “喜迎 G20·科学与艺术的对话——院士与书画家作品展”在杭州举办 / “全国首届金石拓本题跋精品展”在河北举行 / 首届“陈介祺艺术节”在山东潍坊开幕 / “第十四届临沂圣文化节”举行 / “第二届全国篆书书法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 “吴昌硕与中国印学”(安吉论坛)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安吉举行 / 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纪念吴昌硕诞辰活动 / 《西泠艺丛》亮相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 韩天衡先生荣获多项荣誉称号 / 范正红于长沙举办学术讲座 / 2016年“林剑丹温州书法专业学子奖学金”颁发 / “白云遥遥——鲍贤伦书法精品展”在宁波举行 / “吾道至简——吴山明、高晔画展”在杭州举行 / “晏方匾额百品——童衍方先生书法作品展”在东京举行 / 林剑丹·张如元篆刻古文字工作室开课 / “删宪书法篆刻近作结集发布”系列活动在潍坊举办 / 《中流学术十家》荣获第25届全国“金牛杯”优秀美术图书银奖 / “左腕如山·费新我先生书法特展”在江苏举行 / “乱书”王冬龄个展在北京举行 / 西泠十家齐聚海宁 / “西泠之子——李早书法篆刻作品展”在桐庐举行 / “师古妙创——师村妙石篆刻书法展”在平湖举行

社员近作

薛虎峻 / 刘银鹏 / 罗光磊 / 郑朝阳 / 刘洪洋

封三 浙江省博物馆藏“西泠八家”篆刻选

封底 汪鱼亭藏阅书 丁敬 浙江省博物馆藏

《西泠艺丛》2016年第10期(总第22期)

专题·黄牧甫研究

学术主持人 徐畅
黄士陵生平及艺术史料研究四则 文 / 唐存才
金石学视阈之下黄士陵印学思想生成与“印外求印”创作观审视 文 / 杨天才
黄牧甫岭南印事考述 文 / 谢光辉
君旬艺术院藏黄牧甫篆刻作品综述 文 / 蔡泓杰
所识见黄牧甫印谱传本 文 / 刘浩敏
黄牧甫书画选

特别报道

以艺术的篇章献礼 G20——西泠印社喜迎 G20 杭州国际峰会系列活动综述
西泠印社 20 国国名、20 国元首姓名与肖像印篆刻作品选

诗词题跋

绿痕庐诗话选录 文 / 王翼奇

西泠掇英

兰亭一夜忆陆翁 文 / 王琪森

艺丛信息

“西泠四君子——丁仁、王昶、叶铭、吴隐书画篆刻作品展”在杭州举行 / 西泠印社入选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 第十届(2016)杭州文博会圆满落幕 / “绘意中国——西泠印社名家作品美国展”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 《沧海印社三十年》首发式暨研讨会举行 / “钱君旬及其时代音乐作品鉴赏研讨系列活动”在海宁举行 / “沙孟海奖”第九届全浙书法大展在浙江平湖举行 / “沙孟海书法作品特展”在杭州举行 / “西安城墙——当代书法篆刻家作品邀请展”在西安举行 / “吴昌硕奖”第五届浙江省篆刻大展在浙江安吉举行 / “浙江书坛名家二十一人精品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 “万印楼当代国际篆刻精英收藏工程(2016)”评审结果揭晓 / “南北·刘彦湖、白砥书法作品展”在宁波举行 / “醉翁之意——吴永良诗意山水画展”在浙江乐清举行 / G20 成员国领导人肖像章亮相西泠印社美术馆 / 刘一闻做学术性公益讲座 / 吴山明教授师生中国画作品展在浙江浦江举行 / “扶桑六玺书画篆刻作品展”在杭州举行 / “养吾浩然之气——徐利明书画篆刻第三回晋京展”在国博举行 / “佛昭印画——安多民、蔡铁军师徒艺术展”

在山西举行 / 宁波美术馆“吴永良艺术陈列室”揭幕 / “霭霭停云——鲍贤伦书法展”在沈阳举行 / 吴静初国画工作室举行孤山笔会 / “意与古会——邹涛、陈大中、徐海、沈乐平书法作品联展”在宁波举行 / “山高水长——陈佩秋、照诚书画联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 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举办公益讲坛及秋季雅集 / “求道金陵——崔伟书法习作汇报展”在南京举行 / “陶写本心——韩天雍、刘茜篆刻书法艺术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举行

社员近作

蒋瑾琦 / 叶青峰 / 郭强

封三 黄牧甫自用印选

封底 王雪尘游鄂以后所得书画 黄牧甫 西泠印社藏

《西泠艺丛》2016年第11期(总第23期)

专题·王个簠研究

本专题由南通市个簠艺术馆与本刊合编
坚守传统 自出机杼——论金石书画家王个簠的书法艺术 文 / 魏武
粗服乱头 倜傥老成——王个簠篆刻艺术简论 文 / 丘石
高浑郁勃 古茂斑斓——王个簠及其书画艺术 文 / 施作雄
诗存古意自风雅 文 / 冯新民
王个簠艺术年表 文 / 曹用平
王个簠影存
西泠印社、个簠艺术馆藏王个簠作品选
王个簠捐赠西泠印社珍品撷英

学术研究

跋越南发现的“黄神使者章”封泥(外一篇) 文 / 孙慰祖
关于“绣虎·雕龙”印二则 文 / 许浒、朱宜
裴景福与吴昌硕交游考 文 / 冯春术

特别报道

西泠四君子——丁仁、王昶、叶铭、吴隐书画篆刻作品展纪要

文著解读

亦图亦文 堪称典范——《古玺印图典》读后 文 / 陈道义
《笈边漫语》小引 文 / 吴格

艺丛信息

“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幕 / 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启“印之爱”河南罗山县篆刻支教活动 / “小林斗庵篆刻的轨迹——印的世界及中国书画收藏”展在东京展出 / 上海中国画院推出“文心烁烁——丰子恺·程十发艺术特展” / 纪念方介堪诞辰115周年、方去疾诞辰95周年系列活动在泰顺举行 / “得意之作——全国中青年篆刻名家邀请展”在苏州开幕 / “孔孟之乡汉碑行——全国隶书展暨中国汉碑与书法学术研讨会”在济宁开幕 / 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多名西泠印社社员当选省青年书协领导 / “黄教奇书法篆刻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展出 / “满堂印相——包根满师生篆刻作品展”开幕 / “金匱艺缘——韩天衡师生书画印作品展”在无锡开展 / “道象·王冬龄书法艺术”在北京太庙展出 / 《陈之佛年谱》首发 / “鞠稚儒篆刻高级研修班优秀结业作品展”举行

社员近作

龙乐恒 / 高庆春 / 曹文武 / 戴武

封三 南通市个簠艺术馆

封底 王个簠塑像

《西泠艺丛》2016年第12期(总第24期)

专题·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研究

论图形玺起源及在殷、周初的发展——从新出土殷墟铜玺说起 文 / 王晓光
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研究 文 / 刘昌玉
金龟子印中的古埃及 文 / 杨斌
《印法参同》中“利玛窦印章”的相关问题 文 / 刘建
西双版纳召片领图案印纹溯源 文 / 刘德武

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清宫旧藏“金薤留珍”古铜印的钤拓及衍生出版 文 / 张小李

秋季雅集

西泠印社丙申秋季雅集“百年西泠·湖山流韵”大型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
“百年西泠·湖山流韵”——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获奖入社新社员作品选

入社新社员名单

入社新社员作品选
西泠印社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秘书处工作报告 文 / 陈振濂
西泠印社新社员推荐入社题名标准
印学图像志, 打造时代高度——“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举行
《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孤山永不孤, 新人攀绝顶——王义骅、顾建全谈考试选拔入社经历

特别报道

“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科伦坡特展隆重开幕

艺丛信息

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 纪念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 “辉煌足迹——沪港澳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书法篆刻邀请展”于香港举行 / “且饮墨渾一升——吴昌硕的篆刻与当代印人的创作展暨吴昌硕篆刻学术研讨会”举行 / “墨润五洲——2016上海国际汉字书法邀请展”开幕 / 中国书协第22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杭州)开班 / “中国金石全形拓非遗艺术展”品鉴会在杭举行 / “新出新莽封泥专题展”在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 “金螭野逸——徐三庚书法篆刻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开幕 / “无上菩提·弘一法师书法展”在新昌博物馆开幕 / 吴镇书画院在嘉善落成 / “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展出 / “江苏甲骨印社”在南京成立 / “明代浙派绘画艺术特展”系列活动在杭举行 / “金玉其心——钱路书法篆刻展”在京举行 / “湖心书意——沈金加书法作品展”在杭举行 / 韩天衡作品亮相春城 / “蔬果养生——钱大礼书画精品展”在西泠艺苑举行 / “大美篆刻——走进生活中的篆刻艺术作品展”“骆芃芃篆刻书法精品展”举行 / “水秀山青·吴山明青瓷绘画艺术展”开幕 / “墨滋兰香——周国城书画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 / “李刚田对联书法精品展”在宁波开展

封三 雷峰塔砖拓片

封底 西王母·神兽纹肖形绿松石头印(战国时期, 双面印)

“中国印学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特展——戎壹轩藏秦系陶文专题展”在杭州举办

11月30日，由西泠印社主办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特展——戎壹轩藏秦系陶文专题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围绕印学、印史、印人研究推出的系列专题展之一，展出戎壹轩主人张小东捐赠中国印学博物馆的秦系陶文60余件。此次张小东共向中国印学博物馆捐赠100件秦系陶文。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长、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王宏伟为张小东颁发捐赠证书。展览持续至2020年1月5日。



“回向西泠——郑朝阳肖形印作品展”在杭州举办

12月10日，由西泠印社主办的“回向西泠——郑朝阳肖形印作品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西泠印社社员郑朝阳创作的五百罗汉、水浒一百单八将、封神人物、历史名人、十二生肖、八仙过海及诸佛造像等，共计印蜕1000枚，原印50余方，印屏70余件。开幕式上，郑朝阳向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分别捐赠53方印作和2件印屏。中国印学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顾祥森为郑朝阳颁发捐赠证书。展览于12月17日结束。



艺丛信息

01 “金薤玉翰——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名家工作室结业典礼暨师生作品展”在杭州举办 02 2019中国书法评论杭州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 03 2019年地域美术史研讨会在绍兴召开 04 “‘浙江书法奖·沙孟海奖’第十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在杭州举办 05 “西泠公益行——西泠十家走进革命老区方志敏家乡书画篆刻展”在弋阳举办 06 “一带一路——国石青田石雕印章巡回展”在上海举办 07 西泠名家赴青田开展公益助教和艺术交流活动 08 首届“吴昌硕国际艺术奖”在安吉颁奖 09 “蒲公英计划”走进湖州 10 浦东篆刻会举行己亥秋季雅集 11 第二届“浙江农信杯‘法润之江’主题书法展”在杭州举办 12 王伯敏艺术史学馆被列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3 “翰墨写华章——第十一届中华慈孝节西泠名家书画篆刻作品巡展”在杭州举办 14 “亲情中华·瑞福新章——浙江青田石篆刻作品日本巡回展”在东京举办 15 第三届中国高等书法教育论坛系列活动在平湖举行 16 “当代篆刻名家·新锐联袂邀请展”在上海举办 17 “怀念英才——周昌谷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在温州举办 18 西泠印社再次入选杭州社会资源国际旅游示范访问点 19 “心画——纪念陆维钊诞辰120周年文献展”在杭州举办 20 西泠印社举行2019年新社员入社颁证仪式 21 “大江奔流——长三角三省一市书法院作品联展巡展”在杭州举办 22 “日本篆刻艺术——大和古印”学术分享会在杭州举办 23 “笔歌墨舞——徐海作品展”在东莞举办 24 “天人造化——朱炳仁、朱军岷熔铜艺术展”在厦门举办 25 “老树新花——顾振乐师生书画篆刻展”在上海举办 26 “祝遂之书法作品藏品展”在杭州举办 27 “西子清嘉——杭州西湖美术学院书画篆刻艺术展”在杭州举办 28 费名瑶7小时完成128方红楼人物人名印

01

10月22日，“金薤玉翰——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名家工作室结业典礼暨师生作品展”在孤山还朴精庐开幕。展览展出工作室导师与学员的书法、国画、篆刻作品近百件。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长、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王宏伟，西泠印社理事、名家工作室导师李早、崔志强，西泠印社社员江继甚等出席活动。开幕式由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秦陶主持。展览于10月30日结束。

02

11月11日，2019中国书法评论杭州论坛暨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中国书法评论人才培养”交流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高校书法专业教师和文化机构创作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西泠印社理事沈浩、朱培尔，社员汪永江、方爱龙、沈乐平、林如出席论坛。

03

11月16日，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鉴藏研究所、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19年地域美术史研讨会浙江绍兴召开。来自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西泠印社、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多家文博机构和高校院所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04

11月22日，“‘浙江书法奖·沙孟海奖’第十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幕。本次大展共收到投稿作品4733件，经评审产生获奖作品16件，优秀提名作品15件，入展作品352件，入选作品211件。多位西泠名家参与评审工作。展览于11月27日结束。

05

11月22日，由西泠印社、方志敏干部学院、中共弋阳县委、弋阳县人民政府主办的“西泠公益行——西泠十家走进革命老区方志敏家乡书画篆刻展”在江西弋阳方志敏干部学院开幕。10位参展艺术家罗光磊、杨剑、沈永泰、林尔、江继甚、程迟生、沈慧兴、郑志群、乔中石、张钧分别向方志敏干部学院捐赠作品。开幕式结束后，杨剑、林尔、张钧还为当地书画爱好者及学生进行了专题指导。

06

11月22日，由韩天衡美术馆、浙江青田石雕博物馆主办的“一带一路——国石青田石雕印章巡回展（上海站）”在韩天衡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青田石雕作品千余件，涵盖印章、把玩、石雕等品类。西泠名家韩天衡、孙慰祖、王丹等参展。展览于12月22日结束。

07

11月28日至29日，由西泠印社、中共青田县委宣传部主办，10位西泠印社理事、社员及10多名社友会会员赴浙江青田开展公益助教和艺术交流活动。西泠名家一行先后到青田石雕博物馆、封门矿、山口镇小学篆刻基地实地考察，并为山口镇小学篆刻班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实践课。

08

11月29日，由湖州市人民政府、西泠印社主办的首届“吴昌硕国际艺术奖”颁奖典礼在浙江安吉举行。本次大赛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4500余件，经评审，共有108名作者入展，并产生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1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出席典礼并致辞。

09

11月29日，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大型公益培训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湖州，启动仪式在安吉县鄞吴镇举行。项目发起人陈振濂出席仪式并介绍项目基本情况。“蒲公英计划”走进湖州首期培训班将于2020年暑期在安吉举办。

10

11月30日，浦东篆刻会己亥秋季雅集在浦东汇商大厦举行。理事会议、会员大会于上午召开，沪甬两地篆刻作品交流展同时开幕。下午开启公益大讲堂和年度学术报告。西泠印社社员、浦东篆刻会会长张遴骏主持理事会议。西泠印社副秘书长、浦东篆刻会顾问孙慰祖出席了会员大会和展览开幕式。

11

12月1日，由浙江省普法办公室、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办，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为艺术指导的第二届“浙江农信杯‘法润之江’主题书法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幕。展览以宪法为主题，展出“农信杯书法奖”获奖作品3件，入展作品59件。另有20件作品入选展览作品集。12月4日，本次书法展览评审的优秀作品登上了杭州地铁“书法说宪法”主题车厢。

12

12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命名温岭市王伯敏艺术史学馆等为第十一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伯敏先生是当代美术史论大师，生前曾任西泠印社理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等。2011年5月20日，王伯敏将其书画作品、艺术藏品、文物及学术手稿等无偿捐赠给家乡温岭。中共温岭市委、温岭市人民政府在温岭市锦屏公园建造了王伯敏艺术史学馆，对公众开放。

13

12月4日，由中华慈孝节组委会主办的“翰墨写华章——第十一届中华慈孝节西泠名家书法篆刻作品巡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40余位西泠印社书法篆刻名家的作品，包括顾振乐、归之春、沙更世、吕国璋等诸位老先生，及朱关田、韩天衡、陈振濂、李刚田、童衍方五位副社长。参加展览的还有一幅由西泠印社名家、宁波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共70人在慈城创作的百米长卷。展览于12月12日结束。

14

12月5日，由浙江省侨联、西泠印社、青田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亲情中华·瑞福新章——浙江青田石篆刻作品日本巡回展”在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开幕。这是“亲情中华·瑞福新章”第一次国外巡展，展出70名西泠印社社员用青田石篆刻的以“福”字为主题的朱文、白文印各70方。现场还开展了篆刻教学活动。展览于12月10日结束。

15

12月5日至6日，第三届中国高等书法教育论坛暨陆维钊书学研讨会在浙江平湖陆维钊书画院举行。会议公布了论坛暨研讨会论文获奖名单。同时公布优秀作品作者名单的“书学之路——2019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成果展”于12月5日在陆维钊书画院开幕。展览持续至2020年1月15日。陆维钊先生为西泠印社已故社员，以书法名世，是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先驱者之一。

16

12月7日,由上海中国书法院、一可文化传媒主办,西泠印社为学术指导的“当代篆刻名家·新锐联袂邀请展”在上海中国书法院开幕。作品集同时印行。展览展出84位当代篆刻名家和82位篆刻新锐的作品,作者覆盖全国21个省份及港澳台地区。84位名家代表均为西泠印社社员,包括韩天衡、李刚田、张耕源、黄惇等资深名家。82位新锐皆非西泠印社社员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以艺术发展潜力作为遴选标准。展览于12月18日结束。

17

12月8日,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怀念英才——周昌谷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温州站)”在衍园美术馆开幕。继在浙江美术馆展出后,该系列展回到了周昌谷的家乡温州,展出周昌谷各时期人物、花鸟、山水、书法作品,素描、速写及文献,共计70件。展览持续至2020年2月28日。

18

12月9日,2019年杭州市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点工作交流会在杭州召开。西泠印社作为入选示范访问点派代表出席会议,进行访问点特色资源展示和经验分享,同时作为实地体验示范点,开放孤山社址的篆刻体验。今年10月至11月,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开展了2019年杭州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点设置与服务标准化复评工作,西泠印社再次入选社会资源国际旅游示范访问点。

19

12月9日,由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文联主办的“心画——纪念陆维钊诞辰120周年文献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万山青拥一诗人”“此身端拟蠹书终”“书笔苍茫起鬼神”“树木十年梁栋在”“回春一瞬雪霜融”五个部分,展出陆维钊的珍贵手稿数百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西泠印社理事张耕源、王冬龄、沈浩,社员叶尚青、马其宽、徐家昌、韩天雍、方爱龙,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秦陶出席开幕式。展览于12月20日结束。

20

12月13日,西泠印社在孤山举行2019年新社员入社颁证仪式,为14位2019年新入社社员颁发社员证书。截至目前,西泠印社已有海内外社员和名誉社员500余名,除中国外,还分布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捷克、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21

12月13日,由杭州市文联、上海中国书法院、江苏省书法院、安徽省书法院、杭州书法院、浙江图书馆主办的“大江奔流——长三角三省一市书法院作品联展巡展(杭州站)”在浙江图书馆开幕。展览汇聚了长三角三省一市104位作者的141幅作品。朱关田、童行方等数十位西泠名家的作品参展。西泠印社理事宋涛、郭超英,社员吴新如、杨西湖、沈金加、倪郡阳、夏一鹏、沈颖丽、蔡树农、孟庆星、李砚出席开幕式。展览于12月19日结束。

22

10月17日,西泠印社社员韩天雍携新书《日本篆刻艺术》,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书屋进行了一场关于“日本篆刻艺术——大和古印”的学术讲座。该书于2019年8月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系作者在1995年初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著录印拓416枚,涵盖印人118位。

23

10月28日,由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东莞市大岭山镇人民政府主办的“笔歌墨舞——徐海作品展”在东莞图书馆大岭山分馆开幕,展出西泠印社社员徐海创作的书法、国画、篆刻作品。展览于12月15日结束。

24

11月21日,“天人造化——朱炳仁熔铜艺术展”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出西泠印社社员朱炳仁熔铜作品《青花铜庚彩花瓶》系列、《千浪卷雪》等,及其子朱军岷《木幻生金》等系列作品。展览于11月24日结束。

25

11月23日,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老树新花——顾振乐师生书画篆刻展”在上海市文联展厅开幕。西泠印社社员、105岁高龄的顾振乐亲临现场,并即兴挥毫。这是顾振乐先生时隔30年后再次举办师生展。展览于11月26日结束。

26

11月30日,“祝遂之书法作品藏品展”在杭州湘湖美术馆开幕,展出西泠印社理事祝遂之创作及收藏的书法作品50幅。展览持续至2020年1月7日。

27

11月30日,由杭州西湖美术院主办的“西子清嘉——杭州西湖美术院书画篆刻艺术展”在杭州大剧院开幕,展出书画篆刻作品54幅。《杜高杰中国画小品选集》同时首发。西泠印社社员杜高杰向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文博机构赠送书籍。

28

12月15日,西泠印社篆刻名家费名瑶在上海云间美术馆开展篆刻实践,用时7小时左右,完成了《红楼梦》128位人物人名片的现场篆刻。刻好的印章依次当场钤在一幅手卷上,卷首为西泠印社理事陈佩秋题字“一日之迹”。